



# 恭 秋 炎 春



新凤霞的故事  
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  
京城大厦的白领小姐  
轰动台湾的蒋纬国藏枪案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第3期

11.11  
1991



# 天安门升旗仪式

乔天富 摄影





肖克(前左一)在奠基仪式上讲话,前排左起依次为李德生、荣高棠、乔晓光。

辛未金秋,滚滚黄河畔,苍苍邙山麓,龙旗龙灯腾舞,鸽群彩球凌空,礼炮鼓乐震天,欢声笑语遍地。郑州黄河游览区内,高悬“炎黄子孙不忘始祖”、“炎黄雄姿存天地,凝聚四海赤子心”等横幅。著名的红军将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肖克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德生、委员荣高棠、乔晓光;全国侨联主席庄炎林和著名茭菰生物学家牛满江等海内外名人学者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还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福建、广东和内蒙古等省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或筹委负责人,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贵宾,在河南省、郑州市领导人陪同下,围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周谷城题写,刻着“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奠基”等字的石碑,一齐挥锹破土,宣告了亿万炎黄子孙翘首期盼的这项伟大工程的如期开工。

兴建炎黄二帝巨像,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做的大事之一。肖克在奠基仪式上说,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今年世界各地炎黄子孙深情援助大陆受灾同胞,是这种凝聚力又一次体现。兴建炎黄塑像,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周谷城在书面讲话中也说这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夙愿,有利于增强民族感情和振奋民族精神。各界代表和海外来宾都热情致词,同庆这一伟大工程的胜利开工。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各有关方面也纷纷来电致贺。海峡彼岸年逾90的陈立夫先生特地来信说:“凡此增强民族意识之工作,必收善果,非常钦佩”。

这座以山为体、立足黄土、面对黄河的炎黄巨像,总高度达106米以上,超过四川乐山大佛和苏联、美国等世界著名的巨型雕塑。巨像主要部位以花岗岩砌成,内设呈示中华文化成果的展厅。这是我国800多位专家学者多年的心血结晶,在造型艺术、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上,在我国堪称历史壮举。建成之后,凡经京广线黄河大桥的人,都将看见炎黄始祖雄姿,连专程来瞻仰者预计每天有十万人次。尤为可贵的是,工程所需资金都来自海内外同胞的无私捐献,捐款集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只要举国努力,四海同心,若干年后,将为全球炎黄子孙提供一处壮丽可观的寻根敬祖圣地。举行奠基仪式的1991年9月12日,也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大盛事载入史册。



# 凝深情 振精神 建巨像 念始祖

——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奠基仪式速写  
本刊记者 卢弘



参加仪式的群众欢庆鼓乐队。

肖克等领导人与海内外来宾一起为巨像破土开工。 王 峰/摄影





炎黄文化专稿

## 凝深情 振精神 建巨像 念始祖

——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奠基仪式速写 ..... 卢弘 1

英杰谱

## 毛泽东同“远方” 秘密交往实录

师哲,曾任苏联保卫机关特派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野时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马列著作编译局局长、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长期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多次陪同他们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参加过国际国内许多重要会议,是国际共运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知情者和见证人。“远方”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 师哲 4  
郭沫若和安娜的异国之恋 ..... 桑逢康 23

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 ..... 胡戟 28

神州光

## 贡献卓越的海外青年实业家

——姚美良 ..... 石昌松 34



## 共和国 定都北京初记

..... 舒云 16

古镜台

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 李明 94  
同治初年的一场喋血政变 ..... 周源 96

顾问: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饒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石油物探局制图印刷厂印刷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 5 号

邮编:100037

美术编辑:小 雁

本刊自1992年起，交郑州市邮局向全国发行，请读者从速到当地邮局订阅。请记住本刊邮发代号：36-138

古今谈

人口忧思百年录

..... 唐文权 39

访谈录

无悔的爱——

访农业科学家邓景杨夫妇

..... 姜冰冰 47

春秋笔

轰动台湾的  
蒋纬国别墅藏枪案

..... 于祖范 76

十里洋场的“怪胎”：杜月笙

..... 乔还田 68

末代皇帝寓居天津始末

..... 王文锋 64



溥仪“寓居”天津的七年间，是其思想意识发生巨变的重要阶段。本文以翔实的笔触记述了溥仪如何在封建帝王思想的支配下，不惜卖国求荣，开始自觉从事复辟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昭示人们，这样一个卖国投敌的大汉奸在解放后居然被改造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新人，说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人海浪

京城大厦里的白领小姐

..... 刘昕 84

笑星  
李金斗

..... 李硕儒 42

新风霞：  
短文二题

..... 81



赤子心

东南亚饲料大王吴庆星的中国心

..... 王永志 61

“洋插队”记事

..... 星石 50

哈默和他的华裔助手

陈立家

..... 贾宗谊 37

同根结

团圆交响曲——

海峡两岸海员十年交往纪实

..... 史振中 庚秉堂 55

文荟园

缚龙(又三首)..... 莫文骅 36

在六大古都建都的朝代/李白身世之谜 ..... 83

《儒林外史》主题有什么深意 ..... 83

《离骚》的题义新解/文天祥并不“惶恐” ..... 36

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官服琐谈 ..... 15

“尚方宝剑”小释/中国历史上的娃娃皇帝 ..... 75

古代年岁的别称/明清两代六部的职能 ..... 75

# 毛泽东同“远方”



作者像

师哲，1905年生于陕西韩城。1925年去苏联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曾任苏联保卫机关特派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兼俄文翻译局局长、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等职。1957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59年遭康生诬陷被关押十三年，纠正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等职。他长期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多次陪同他们访问苏联及东欧各国，参加过国际国内许多重要会议，是国际共运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知情者和见证人。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

## 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刚愈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纠缠不过，只答应代替三个月，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速派代表前来。

王明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

人所公认的领袖，尊重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最高利益；嘱王明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对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见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稼祥在离莫斯科回国之前，同任弼时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们重述了以上意见，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1939年11月周恩来来到莫斯科治病时，季米特洛夫不放心地又问到王明的表现。当他听到周恩来反映的情况后，对王明的分裂行为深为不满，并说他曾明确地向王明提出过忠告：“你（王明）虽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并不是中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国内、党内公认的领袖；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毛泽东。”并说这是他和斯大林共同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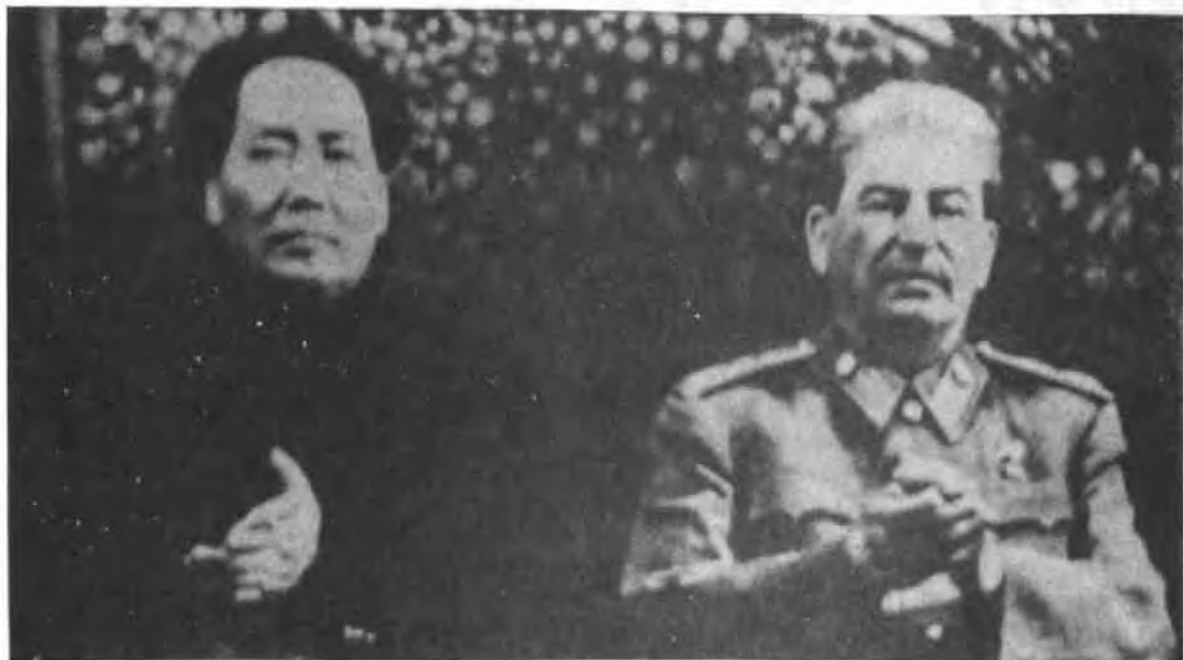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1938年至1940年间，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也像苏联在常说“为了斯大林”那样，经常说“为了毛泽东！”共产国际机关对任弼时，则称他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又称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使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前排右三）和张闻天（前排右四）等人在延安机场迎王明（前排右二）和康天从苏联回来

# 秘密交往实录

师哲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赴苏联访问抵达莫斯科。图为毛泽东、斯大林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招待会上

## 建立直接通信联络

1940年末到1941年初，我党中央同“远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经过多次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之后，便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同“远方”联络的电台不止一个，但工作正常、使用较久的，是代号为“农村工作部”的电台；此外，毛泽东还常常使用苏方情报组（负责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的电台。“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联络；而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

接报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间又是相通的。“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形式上存在到1943年秋季，实际上断断续续工作到1944年。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一直工作到1949年8月底。（自1945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孙平主持。）

我方电台的干部人事、行政事务，是在任弼时领导下，由吴德峰主管的。而使用它，则是毛泽东一人。开始时，毛泽东总是将电文交给任弼时，再由任弼时交我译出，然后我们共同校审后发出；来电也是我译出后先交任弼时，再由他送交毛泽东，用毕存放在任弼时那里。后来渐渐由毛泽东直接将电文交给我，我也将电文直接送毛泽东。自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

任之后，所有来往电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极少数属于十万火急或极端绝密的电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我在事后才知道。除我以外，刘义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译或经管过一部分。

1940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农村工作部”电台时，毛泽东只写了二三百字的短文，简单地介绍了我党、我军及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当他知道“远方”确收无误时，才开始写长篇的、具体详细的电文，有的长达万余字，要分几次发出。

这里只追述其中最为重要和意味深长的数次电讯内容：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之后，毛泽东



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中）、周恩来（右）博古（左）

在会客室。（1938年）

给“远方”写了一份分析因果、教训的长篇电文，内容大致是：一、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口蜜腹剑，使新四军上了圈套；二、项英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上当受骗，结果损兵折将，自身不保；三、皖南事变对党、对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四、我党为挽救危局，弥补损失所采取的方针，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记得在批评项英时有如下的话：在总结和汲取血的教训时，不能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介石而受骗上当，一命身亡；其次，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听中央的话；再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件事教育了全党，今后就更会眼明心亮、提高警惕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双关的，对“远方”那些总是轻信敌人，对敌人抱有幻想的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从中汲取教训。

从1941年4月至6月中旬，毛泽东几乎每周都要给“远方”发一次或两次长篇电文，其内容除了介绍我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军事部署、抗日战争的形势、国共磨擦、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等外，还有我们情报部门

掌握的蒋、日、伪的暗中勾搭及英、美同蒋介石的关系等情况，并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加了分析和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从香港获得一份重大情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情报立即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立即转报中央。当时中央对这一情报感到有些蹊跷，怎么对德国法西斯这一最核心的机密知道这样准确，连几日几时出动都知道？不过，中央仍然迅速电告了斯大林。然而，苏联却迷信那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月22日这一天是星期天，苏联军官们仍然照常放假，从星期六晚上就全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德军正是按情报中的时间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军乱作一团，损失惨重。一两个月后，苏方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来一份感谢电，说中国同志提供的情报帮了他们的大忙。

那以后，中央同苏共的来往大为减少，同共产国际的通信也略有减少。

## 整风运动中的往来

1941年秋冬际，中央领导同志开

始整风学习。这时，毛泽东向“远方”发了一份电报：中共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考虑“七大”代表和推荐七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有两个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中央还是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了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选为中委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国际才来了复电，电文很长，把李立三在莫斯科的表现、所犯错误以及被捕等事实经过作了说明，但对李立三是否可推荐为中委候选人一事，未表态。

1941年秋末，德军直逼莫斯科城郊。苏联出于防备日本出兵西进，夹击苏联的考虑，为牵制和阻挠日寇北进，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能抽调多少兵力，补充或扩充多少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一线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我们的第一次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较为容易，但缺少武器，不能发挥力量，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方接电后不久又来电商量：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部队可以开赴接近外蒙边沿区，从那里领取所提供的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我方复电认为此法行不通，因为部队在蒙古的开闢地带，行动、生活均极困难，无法隐蔽。过了不久，对方又来电商量：如果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相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牵制日军行动，可否？我方回答未作肯定答复，只是说：可以见机行事，尽可能向长城内外一线发展，但同时指出，因缺乏武器，完成不了重大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大兵力，免被敌人一网打尽。虽未达成具体方案，但我方仍加强了长城内外的兵力部署。日寇也很快察觉了，对苏更不敢轻举妄动。

1942年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定期向“远方”去电，作了许多介绍和解释，诸如：什么叫整风？他解释说，就是党内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整什么？他解释了“三风”，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方式方法是，学习文件，集体讨论，各抒己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远方”都不能理解，他们总认为中共是在搞清党运动，或者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尤其是王明病倒了，张闻天到地方上搞调查研究去了等等情况，使“远方”更加疑虑重重。他们对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不理解，对统一战线中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不理解。因此，对我们的整风学习和我们对国民党的反磨擦斗争，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是抗战力量的削弱或抵消。毛泽东除了给“远方”作解释外，还多次同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和解释整风运动。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有着自己一套固定不变的看法和想法，加上王明灌输给苏联同志的种种胡说，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只要看后来出版的孙平（弗拉季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可知道，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全是“对牛弹琴”了。

1942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严重的关头，苏方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有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于是斯大林又试探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方绝对没有一次夸下海口，承担义务，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我对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还是在“七大”期间。一天，我跟毛泽东从枣园出来，到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路上边走边谈。我当时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何所指，总摸不透，便想乘此机会请教毛泽东，所以谈到王明的错误实质是什么？当谈到王明具体的这点、那点错误时，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几点。但是主席从我的话里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而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真是一针见血，使人豁然开朗！

“远方”和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 “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



四九年米高扬到西柏坡，中，师哲

毛泽东和任弼时在神泉堡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这是列会同志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前排，右一—张闻天、右二—莫洛托夫，前排左一—布尔加宁，后排左一—米高扬



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太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策略和信念是明确的、一贯的，那就是要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既要战胜日本，又要在战胜日本之后，继续战胜国内的敌人，使中国彻底解放，并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党的一切方针和措施，都是紧紧围绕这一战略目标的。“远方”和斯大林却不是这样考虑的。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间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尔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

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了）。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国共积怨之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客观现实不容忽视，他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共的各项政策，并从正面说明“远方”的想法和建议不切实际，不合时宜，行不通。他的话倒也没有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友军”（国民党、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阴一套，阳一套；既抗日，又联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积蓄力量，准备内战。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有两手准备，两种斗争策略，那就是：既联蒋抗日，又防蒋反共；一面积极抗战，一面积蓄力量；既联合，又斗争；既合作，又争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当仁不让，寸土必争。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国际执委会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态度与前就大不相同了。在此之前，他们总认为中共不听话，不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办法去行事；现在对周恩来和他的报告则是尊重的。但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斗争艺术，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

周恩来100余页的报告，由波诺马廖夫（当时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后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

1952年8月17日—9月22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抵达莫斯科时，由苏联领导人陪同检阅仪仗队。





这是周总理 9 月 15 日在中苏联合公报上签字。右起：斯大林、李富春、张闻天、尤金、粟裕、莫洛托夫

缩到 20 页送交斯大林等人传阅，等了好多天，在周恩来回国前夕，才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作了对周恩来报告的决议。决议很笼统，基本内容是：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进展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意义；维护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把抗战胜利地坚持下去，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全民族的主要任务和唯一目标，等等。无异于一封劝告书或建议信。实际上，分歧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公开暴露，保持了沉默而已。

1940 年我们回到延安时，康生已经是社会部部长，驻在枣园。苏联军方情报组也驻枣园。这块地方，被康生弄得异常神秘。也许他的用意是为了替苏联情报组保密，但苏联人却认为康生对他们封锁，监管太严，把他们与外界隔绝了，表示不满。由于这些苏联人都是现役军人，人数也不多，所以 1942 年以前，他们基本都是到前方去了解战争情况、搜集情报。他们想问题狭窄而单一，仅仅是了解军情，搜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在华北了解敌情时，常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批评这个，指责那个，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法太原始、落后等等。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了如指掌。这个伊万诺夫于 1942

年春从前方回到延安并回国。回国之前，他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告别。毛泽东利用他辞行的机会，批评了他，大意是：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能胜利地抗击数百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自以为是的伊万诺夫受了批评却仍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此人回国后不久便牺牲在苏德战场上。

1942 年初，苏方为了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来了以基斯连科中将为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到延安。事先是否同中共中央协商并得到同意，我不知道。以基斯连科为首的七八个人到延安后，毛泽东为他们设宴洗尘，但第一次谈话就很不愉快。基斯连科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向毛泽东介绍了他们成员中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也大致介绍了他们的任务。毛泽东开诚布公地提出：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两家（苏共和中共）合作，事情才能办得更好。合作的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两家合作，工作就能较顺利地展开，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的情报，两家分享，共同使用。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那七八个人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谈话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不久，他们正式

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情况，他们的人员也就不得不撤走，只剩下斯柯瓦尔佐夫、西索夫等人作些联络工作。

（这里顺便提一下：时隔 8 年之后，1950 年 1、2 月间，即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一次只有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三个人的交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在情报工作上同我方合作的要求，而合作的条件，正是当年毛泽东提出过的条件，甚至表示十分迫切。中方没说什么，仅仅表示同意，具体方案由专门人员去协商、制订。这里要说明的是：八年前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时，他们不同意，因为认为我们革命前途未卜，而 8 年之后，同样的建议由他们提出，就成了正确的了，因为我们已经胜利了。这又一次说明，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有自己的主意。毛泽东批评王明“对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实在是入木三分，太有教益了。）

孙平是 1942 年 5 月被派来延安的。此人原隐身于苏联驻兰州领事馆里做情报工作。跟他同来的，有一位外科医生阿洛夫（特级外科军医）和报务员尼古拉·葛梅尔。此后，他们的情报来源，完全依赖于我们。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可以同社会部、八路军总部和新华社直接联系，也同各部

委、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许多单位直接联系。因为他有一定的中文水平，所以也到绥德、晋西北等地去活动，直接与群众接触，了解情况。据孙平自己讲，他得到博古的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国内、党外、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较好地掌握了形势动态。此话他讲过多次。但事实上，毛泽东给他介绍得最多、最系统，在苏方人员中，他是听毛泽东谈话最多的一个。在1944—1945年间，毛泽东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

毛泽东同孙平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各个革命阶段党内的意见分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党的路线正确与谬误，而且重点阐述了宗派斗争——总是意思是：小派别活动发生过影响，但未起过决定作用。我正是在替他做翻译的过程中，系统地了解了党史，我很幸运地聆听了毛泽东讲授“党史课”，可是孙平到底学到了什么？不知道。此外，毛泽东也谈了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根本策略、战略和政策，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和斗争策略等等。这种谈话一直持续到党的“七大”召开的前夕。

我感到苏方最关心和最不安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七大”何时召开，如何开法？二是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早就做好了安排，并把“七大”的召开时间和议程等都给孙平作了介绍，并邀请他列席“七大”。孙平也确实列席了“七大”的各次会议，而且每次会后都做日记。至于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美驻延安观察组、与美大使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的往来，以及接待外国记者等），毛泽东每次同他们接触后，都把交谈要点告诉孙平或阿洛夫。但他们二人能接受和理解多少就很难说了。

## 共产国际解散以后

1943年5月，党中央收到了“远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大意是说：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中心——共产国际。当时，国际工人

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他们起过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而时至今日，各国共产党已经锻炼和成长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再无需像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干预各国党内事务，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同时取消它的一切附属机构。

与此同时，“远方”还发来了成立情报局的通知。意思是：由于欧洲形势的特殊需要，欧洲各兄弟党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局，以研究国际形势，互通情报等等。实际上，德苏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机关已经变成了情报机关。

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我们同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动。

孙平这个人，同王明等人有共同语言，而对毛泽东的话，总是格格不入。1942—1944年整风学习——审干——肃反运动，一开始，孙平就从王明和博古那里，听到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他全盘接受了。所以，尽管毛泽东给他和苏方其他人员作过多次介绍和解释，他们仍然疑惑不解。但当康生把肃反扩大化之后，在开始阶段有些担心的王明之流，反倒放宽了心，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苏方人员则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干预和领导下，到“七大”以前，肃反中受冤同志的问题已基本全部得到了解决。

在“七大”期间，凡参加和列席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暂时移住杨家岭，枣园只有我和陈刚二人既要参加大会，又要照顾机关工作，在枣园和杨家岭之间往返穿梭。遵照毛泽东的安排，我还要给孙平做些翻译。

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对大会的评价是：“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话既是如实的评价，也是回答斯大林的。

大会刚一结束，毛泽东便同孙平谈话。一是问他对“七大”的理解和感想；二是向他介绍会议进行的过程和意义（即帮助他理解大会）；三是要孙平把“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发言稿转送苏共中央。孙平以自己的耳闻目

睹和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向苏共传达了消息。毛泽东向他强调的：大会最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望、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孙平可能传达了。不过在谈话过程中，孙平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表态。

“七大”自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49天。在这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首先是苏军5月2日攻克柏林，9日攻下布拉格，并以这天为胜利日。法西斯残余势力也被迅速扫清。这预示着东方的战争也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党的“七大”从历史角度看，是最适时、最从容不迫、最有成效的大会，它为迎接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5月9日欧战结束至8月9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内蒙和朝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我们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然而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对这个时机抓得紧，也利用得十分巧妙。这期间，毛泽东精力十分充沛，日夜操劳，不知疲倦。党、政、军各级干部也表现了极其高昂的斗志。大批大批的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发，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和各种方法，而基本上是用两条腿奔赴前线 and 东北各地区，不仅要赶上接受日寇投降，还要赶上在国民党飞机、车船的前头。我们也确实赶在了他们的前头。

苏联由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签有协定、条约等，又在国际会议上承担了义务，所以极力避免同中共 and 八路军发生任何正式的往来关系，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也保持了这种态度。还根据他们同美、英的协定，对我党施加压力，“劝”我们同蒋介石合作“维持国内和平”“共同建国”。国共和谈之前，尽管苏方发誓在国共谈判时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以及离延、返延，都没有任何一个苏方人员露过面，在延安的情报组人员也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

日本刚一投降，孙平等人就急于回国，但莫斯科要他们坚持到10月底，可能是为了观察重庆谈判的动静。但据我所知，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同他们谈这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知道得既早又详尽之故。

孙平要赶在十月革命节前回到莫斯科。10月25日（或26日）专门向毛泽东辞行，谈话大意是：总部来电要我们结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将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国，我们特向你告别，并感谢你和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和在工作上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自己备用的4支自动步枪，愿全部赠送毛主席，请派人前来提取。语言不多，干巴巴的。第二天他们离去时，有3名女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机场。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前夕，1946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毛泽东问我：同“远方”往来的电稿和密码等保存在哪里？如何管理的？我回答说：“全部保存在我手里。”他令我全部销毁。我问“可否清理一下，把最重要的文件挑出几份，妥善保管，行军时我自己随身携带？”毛泽东立即回答说：“不妥！如果你受伤或被打死了怎么办？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来！”我遵命回到办公室，刚刚把那一包文件清理出来，毛泽东就跟着到了我的办公室门口，并问我是否清理得彻底？当他确信全部文件都在眼前之后，便大致翻看了一遍，要我立即烧毁。我就在门口的火炉里烧起来，而他也守候在一旁，直到文件全部化为灰烬才离去。我一方面为毁掉这些历史资料而惋惜，另一方面又十分钦佩毛泽东严谨、周密、万无一失的工作精神。此后，直到1948年，这方面的文字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且，据我所知，这类来往电文，从未在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原文传达过，毛泽东只拣必要的内容融汇于他的讲话中。

1947年6、7月间，当中央转战陕北到了小河，并正在此召开会议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西方通讯社异口同声地喊叫说：中共的陕北的总部已被国民党军彻底捣毁，共军被击溃，死伤惨重；贺龙、江青等人被俘，解送西安；正在围剿流窜股匪等等。莫斯科对这些消息竟信以为真，立即发电

向我党中央建议：如果形势危殆，难以支持时，他们拟派飞机来接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暂时离开中国，以避锋芒。此时我正在子长县马蹄沟西北局所在地，接到中央电报，要我立刻赶到山西临县中央后勤机关。我接到命令后的第一天赶了140里路，到达黄河边，次日赶到临县三交镇。这时，米大夫已从小河返回三交，讲了他亲眼所见的一切情况，大家笑敌人自欺欺人、说梦话。阿洛夫也给苏共中央报告了真实情况，一场虚惊才算完结。

10月，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中央转移到葭县的神家堡。这时，毛泽东要我陪同阿洛夫到此地来，毛泽东同阿洛夫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把撤出延安至沙家店战役结束这一段做了个总结。对沙家店战役的意义，今后战局如何发展，国内局势的变化等都作了分析和评价，甚至谈了许多细节。共谈了两次。

12月，中央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会议。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其内容与他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致，说明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进入了反攻阶段。

1948年，毛泽东原拟秘密访苏，后接受斯大林的意见，放弃了这一打算。后来到了西柏坡，在9、10月间的一天午饭后，毛泽东把阿洛夫邀到他的住处，坐在院中一棵大树下，向他介绍中国各主要战场的情况，以及今后发展趋势。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讲着，当他讲到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还会有某些难以预料的失误时，阿洛夫想安慰毛泽东，急急忙忙插了话，说：“我们有一句谚语：砍伐树木时，难免有木屑飞溅”。意思是说胜利中也难免会有损失。这样两句话，不知为什么竟堵塞了毛泽东的言路，没有再谈下去。中苏两国接触是，有许多民族性格和思维逻辑的不同而互相不能理解，以致发生不愉快。但就这件事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两句话竟会扫了毛泽东的兴，他再也没有了兴致，由高谈阔论突然变成了冷场，无趣无味地结束了。

##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岁月里

1949年3月，中央机关刚进北平时，住在香山。很快，柯瓦廖夫等人也从东北来到了北平。又过几天，他把当时留驻北平的苏联领导齐赫文带到香山来拜会毛泽东。那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住处接见了他们。坐定后，齐赫文先是祝贺中共、解放军取得的胜利，然后要求毛泽东给他们介绍一下我各战场上的一般情况，诸如我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如许可，还想知道我党的各项基本方针和政策，以及对敌人的分析，即敌人还能支持多久等。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说明了一般形势，但明确指出胜利肯定属于我们。他说：“你们很快就会看见，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接着将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现其它意外变化，或出现什么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不过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它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市郊外，美军也出来几个，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其它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未出现美军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想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我们是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斗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柯瓦廖夫在香山期间，毛泽东批转的一些电报和文件都译给他看，但他不感兴趣。他同毛、刘、周、朱、任都见过面；谈过话，而毛、刘同他谈话较多，主要是启发他的思想，使他能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意义以及重大政策等，能有所了解和比较正确的认识。让他知道中国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但中国不会停留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向前发展的。例如：在刘少奇访问苏联前夕，即7月1日下午（这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中南

海),毛泽东特约柯瓦廖夫来会见,同他谈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话。主要内容是:1.关于解放战争当前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2.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3.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胜利的结局,但发展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历来就没有笔直的道路。革命会分阶段进行,但是一定要进行到底。这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但都是要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力和物力,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要准备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两条。毛泽东这些话给了柯瓦廖夫,实在没引起什么反应。此人正像1950年1月斯大林对毛泽东介绍的那样:柯瓦廖夫是一个铁路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没有政治经验,或者说,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如果钻进政治里,就会像老鼠钻进了风箱。

毛泽东和柯瓦廖夫谈到最后,还表示了对他的关心,他说:这回你陪代表团走远路,会辛苦的,不过你顺便同家人团聚一次,也是个个好机会。又问到他自己还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他没有提出什么。可是后来发现,他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罐子水银,足有三四十公斤,带回苏联去了。

柯瓦廖夫拜会毛泽东之后,同我一起从中南海乘车出来,准备先回香山,再按计划当晚出发去东北,与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会合。车子刚出中南海的西门,柯瓦廖夫就说:“七一(俄罗斯人的旧俗认为凡属1号的日子,都是不吉利的——笔者注)本不应该出远门,因为不吉祥。”话音刚落,就在西四拐弯处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压坏了他的腰、腿和自行车。于是处理事故,耽误了几个小时,不得不把行期推迟到7月2日。

## 新中国成立之时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苏联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杜布罗维娜等为首的工青妇群众团体成员被邀请会见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见中,除了一般的礼节和祝愿外,毛泽东发表了非常精彩的长篇讲话。他那生动活泼、有

声有色的演讲,扣紧了听众的心弦,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讲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中国劳苦大众、中国的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进行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顽强不屈和坚持到底的革命斗争,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曲折的道路。革命的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找到了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汲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有外来侵略者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也有中国的统治者杀害自己同胞的事件。二十世纪以来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重要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除了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就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了。解放了的5亿中国人民和起先锋队作用的2亿苏联人互相结合,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容易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压迫,却未获得民族解放,未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压迫;而国内的封建势力、官僚豪绅、地主恶霸、买办阶层,仍然爬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不喜欢,他们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把革命人民一巴掌打倒在地,把人民浸泡在血泊中。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留在人间的同志从地上爬起来,除去自己身上的泥土和血污,擦干脸上的血和泪,掩埋好牺牲了的同志和亲人,又重整旗鼓,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是上山,建立根据地。前后历时10年的浴血奋战,走了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冲出重重围困,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紧接着就是八年抗日战争。须知,这是在毫无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坚持下来的。外国侵略者被打倒了,但人民还未得到喘息,甚至还未来得及伸腰,蒋介石国民党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打响了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独霸中国。可是这一回,人民已经有了以往数十年中多次的经验教训,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再受人的欺骗、愚

弄和出卖。我们依靠自力更生,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同敌人进行一次最后的较量,作一次你死我活的决战,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意志!我们的决心兑现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这仅仅是我国人民在长征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前面的路程还很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傲,努力前进,中国的发展进步将会是较快的。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有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客人们凝神屏息,全神贯注。他们被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热泪夺眶,这是一个罕见的场面。

毛泽东最后建议他们同我国的劳动群众作些接触,作家们可以随军到前方去看看,了解我们的军队生活、战斗能力、战地实况、军民关系等等。随军南下,还可以看到旧时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也可观察到部分作战过程,但是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作家西蒙诺夫回国后完成了一部不甚成功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

## 对毛泽东首次访苏情况的补充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我在《陪同毛主席访苏》一文中写到的情节,不再重述,这里仅作一些补充: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内容是挑拨苏中、苏蒙关系的。当时苏方提出有关各国都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予以驳斥,给他点颜色看看,有关国家都同意了。但并未明确什么叫“官方的”。结果,苏联和蒙古都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了声明,中国则只是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内容都是驳斥艾奇逊的。苏方对此十分注意,可能还是疑虑重重,1月中下旬的一天,他们郑重其事地派人来说: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来克里姆林宫会面,无须再邀别人,而主人方面也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我们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等候。

先是斯大林说：“今天请你们来，只想在这个范围内谈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

接着他又问：“关于驳斥艾奇逊的造谣，中国政府发了声明否？”

回答：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又问：“胡是什么人？”

回答：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也是用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西方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评论，但他们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也不必对自己的话负责，所以他们的话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各自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本来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的，而你们却用新闻总署名义讲话，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它代表不了政府，而且新闻记者的谈话也决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会减弱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互相合作，相互配合的机会和场合会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吧，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按原定方针做，乱了步伐，削弱了战斗力，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只是信守诺言，步调一致，才能显示出斗争力量。”

毛泽东始终未发一言。周恩来讲了几句，主要是解释，由于这样一种气氛，他显得十分矜持。

会见时间很短。

斯大林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临时安排前往他的别墅，说他组织了一个夜宴，请大家欢聚快乐一番。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到他的车子上，并让他们坐在后排的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空气异常沉闷。我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先同斯大林谈了几句闲话，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斯大林立即说：“我是说过的，而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他的话还未讲完，毛

泽东问我：“你同他说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我立即承认我谈的正是这个。毛泽东又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斯大林似乎也猜到了我们谈的是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气氛又重新变得像铅一样沉重，大家一言不发，一直沉闷了30分钟。

车子接近别墅时，斯大林打亮了信号灯，大门随之洞开。进入会客厅，还是我们4个人。莫洛托夫落得很远。

半小时以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和罗申等人都来参加宴会。人虽不少，主人也不断地敬酒、劝吃，讲了许多趣事、笑话。然而，客人却高兴不起来，无论怎样努力，气氛仍然异常冷落。斯大林为了作些改善，在饮宴间，他拿出他收藏的艺术品请大家欣赏，并亲自作说明；还指着墙上挂的湘绣“鹰”，说是盛世才赠他的礼品，并问那上面绣的字（“飞得最高，看得最远”）是什么意思？给他解释之后，他非常高兴，客人却没有共鸣。他又去开留声机，继而请大家跳舞。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沉闷的空气。开始时，主人起舞，客人旁观。后来，几个人死拉硬拽，把周恩来和我拖下舞池。但他们轮番去拉毛泽东，却没有成功。于是，斯大林听音乐，毛泽东在一旁观看，一言不发。这样一来，更加衬托出了不和谐、不愉快和格格不入的场面。只有周恩来灵活自如，他也吃也喝，也谈也笑，也歌也舞，同时一举一动又都紧跟毛泽东，不失自己的尊严。

半夜三更，我们回到自己的住处。无论在路途中，还是回去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今天的事。

## 赫鲁晓夫时期

斯大林在世时，曾多次关心并过问在我国南方（如海南岛、广东等）可否种植橡胶的问题。周恩来也曾告诉过斯大林，说从南洋回国的华侨带回来一些橡胶树种，在海南岛开始试种，并获得成功，但数量很少，产量低，且都是私人经营，如果由国家经营，情况可能会好些。后来，斯大林数次建议我们同他们合作，在海南岛、广东南部等地试种橡胶，发展橡胶园。他

还称橡胶为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卡他们，正像卡住了咽喉。

1950年末（或1951年初），斯大林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帮助他们购买相当数量的橡胶，并说明这是属于战略物资，苏联受封锁，买不到。周恩来通过他的朋友、锡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很快便购得数千吨橡胶，经黄浦港口转交给了苏联，不仅快捷迅速，而且价格合理。

1954年国庆节后，赫鲁晓夫等到达广东时，专门到橡胶园参观，橡胶树长势很好，已有拳头粗，但管理不善。赫鲁晓夫看得兴致勃勃，正想大发议论，有人说了一句“这回恐怕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橡胶园吧？”这句话像是堵住了赫鲁晓夫嘴，他再也没说什么。

1954年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是毛泽东、刘少奇，苏方是什维尔尼克（或米高扬）。译员：中方是师哲，苏方是费德林。为了表示友好和信赖，师哲担任俄译中，费德林担任中译俄。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有些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谈谈，交流一下意见。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或意见都随时提，随时谈，随时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商谈过程中就已经解决了，没有积累下什么意见。可是今天我们有这个极好的机会，所以还是交换一下看法。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并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着达到什么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高，但他们仍在活动着。

毛泽东又说，十个指头被切去了一二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同过去一样，而是大削弱了，甚至是减去了一半的力量。总之，形势是好的，对我们是有利的。自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现在我们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充分利用它，大力发展生产，进

行经济建设。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險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也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自然也是永远结束战争（世界大战）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而使战争再也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剩下的问题恐怕只是这一点了。

接着双方各自介绍了国内的一般形势，中心工作的进展、成绩和缺点，以及生产和各项建设的情况等等。一般地说，双方都认为发展顺利，虽未达到预期的进度和指标，但在进展中。

赫鲁晓夫又问：“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

毛泽东说：“关于这方面的事，双方专家们天天在接触、交谈，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了解得详尽、具体，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我们对原子能、热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他思想上不曾考虑这个问题，精神上毫无准备。停顿了片刻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生产那东西，费钱、费电、费人力，耗费巨大，而生产出来的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只能贮存起来。一段时间后，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我们的想法：你们目前不要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好。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热核武器，我看把中国现有的全部电力用上去是否能够，还很难说。那么，其它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不过你们要是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个比较切实的办法，利用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部分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

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说，也好，让我们考虑以后再说。

赫鲁晓夫说，我们听说，中国劳动人民在解放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的人口，如果他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恐怕很够应付的。然而，不管怎样，这确实是国家负责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地位来妥善解决，那日子是不好过的，或者是过不去的。

毛泽东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在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对各自的生产建设，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不很好么！

赫鲁晓夫等人听了立即喜形于色，很表满意，兴高采烈地活跃起来了。

临结束时，毛泽东建议赫鲁晓夫到南方去走走看看。赫鲁晓夫表示亦有愿望。毛泽东又说：随你的便，愿意到哪儿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自由在地、随心所欲地去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

赫鲁晓夫一行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旅行之后，准备回国了。回国之前，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举行了答谢宴会，这是经过精心安排规模宏大的一次宴会。

宴会前，我陪周恩来来到赫鲁晓夫下榻之处去拜会他，主要是告诉他毛泽东将出席宴会，并安排赫鲁晓夫一行的第二次出游。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几乎同时到达。他们步入大厅，谈笑风生。

次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旅大、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后回国。关于赫鲁晓夫两次出游的情况，我都给毛泽东写了汇报。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有几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其中有米高扬的来访。

一天午后，我被邀到大会会址政协礼堂的休息室。那里的餐桌尚未收拾，毛泽东和米高扬正坐在桌旁交谈着，马列同志在旁帮助语言交流。我

到场后，稍事休息，毛泽东便要我接着翻译。听起来，在此之前，似乎是毛泽东从历史上谈了各个时期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和各种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错误路线对正确同志的打击等等。我就是接着这个话题翻译下去的。

后来话题全部转到了国际方面，包括苏联在内，时而讲共产国际，时而又指向苏联。米高扬几乎没有插过话，只是倾听。

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幼年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老是“左”右摇摆，尤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左”的错误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其结果是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党组织损失了百分之百。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地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国际共运中的不正之风，出现了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为“兄弟党”，但实际上是一个党竟可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而不管我说的做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坏习气，坏传统，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党的屁股后面跑，这就是一种极端的不正之风！试想：从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所制订出来的政策、方针，怎么可以要求另一情况、另一条件下的党去听从，去照搬、硬套呢？客观实践、血的教训已经证明这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其中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和抛弃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事实教育了我们党内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有益的话，符合事实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把耳朵拉得长长的，只听外国的话，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脑筋，更谈不上倾听同志们的正确意见和劝告了。听不进正确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一味盲从，只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但同时也因为有许多不正



之风，诸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等等。而后者（指经验主义）作了前者的俘虏，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我们党在成长过程中，在曲折的道路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反动派），而且每一步都要与各种机会主义、投机分子和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不断纠正、校正我们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党本身的幼稚和无知，又有些人刚愎自用，不相信群众，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不管对我国革命是否有用，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办，而对后果都是不管的。这种盲从的责任当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应负责的。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面，却不能不说清楚！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那另一方面

就是披虎皮、拉大旗，借以吓人；空吼空叫，虚张声势，讲大话，盛气凌人等等。而这一切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对实际毫无补益，只能是遗害无穷。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

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便走上了正确的康庄大道，显示出他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是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特别感到沉痛，其原因也在这里。只有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总结，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会对革命有益、有助！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

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就会骂人的。我们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就要出气；理不合，就要讲理……如此等等。

毛泽东谈得比较含蓄，米高扬当时理解了多少很难说，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早已筹思好了的。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而对这两论，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说：“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懂得其中的意思。”（师秋朗整理）

（本篇未经本刊同意，不得转载或摘录）

责任编辑：卢弘

## 古代官吏退休制度

官吏年老退休，我国古代称为“致事”或“致仕”，意思是交还官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就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新的流官致仕制度。到了汉代，致仕逐渐形成为一整套人事行政制度。据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记载：（一）官吏年七十，耳目不聪，腿脚不便，就得致仕；（二）告老退休后，朝廷给其原官职俸禄三分之一，以示尊贤。

唐宋时期，对退休官吏的经济待遇有很大提高。唐制规定，凡职事官年七十以上均应退休，或者“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退休以后，五品以上官（唐代官阶分为九品）可得半禄。有功之臣，蒙天子恩典，亦可得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致仕退休，各有永业田可以养老。宋代致仕虽著为令，但官吏贪利者多，知退者少。

明清两代，封建社会进入末期，致

仕制度亦有新的变化：（一）退休年龄由七十岁提前到六十岁。明孝宗弘治四年，进一步规定：自愿告退者，不分年岁，俱令致仕。（二）致仕官俸给。明初规定凡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原俸，四品以下各升一等，给浩敕。清初凡大小官致仕，有世职者，照品给俸，无世职者，年六十致仕，仍给半俸，未至六十因疾辞仕者，不给。（三）特殊优礼。明初官员凡以礼致仕者，与现任同。（彬 辑）

## 官服琐谈

当你看古装戏或戏曲片时，却不知道那些大小官儿身穿各色袍服、绣着各种图案，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有何依据？

官服分别颜色，从唐代开始是：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大红）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须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州的长官刺史，亦不拘品级都穿绯袍。这

种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废除，而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品级。简言之，清代公服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以用绛色，外褂则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清末服饰尤为繁杂，依官位大小不许滥用。仅就其袍、服来说，有蟒袍和补服。蟒袍，是官员穿的上面绣有蟒形的长袍。一品至三品是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是八蟒五爪；七品至九品（及未入流）为五蟒四爪。

补服，是加在蟒袍之外的外褂，正中用金线绣织鸟兽形的五方图案。文官为鸟形：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雪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溪鸟；八品鹤鹑；九品练雀；未入流黄鹇。武官为兽形：一品是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子；四品虎；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是海马。

以上是一般，也有例外，如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却一律穿獬豸补服，因为古人认为“獬豸”是一种神羊，能辨曲直的缘故。

（彬 辑）

北平不战而取，反为其治安带来许多问题；初入京师的毛泽东游览天坛，在祈年殿前肃然而立，道：“在这里，说句真心话，我们应该脱帽向庶民三鞠躬……”本文以白描的手法回顾了共和国建都北京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活动踪迹，从中可以使

我们领略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襟怀与气度……

# 共和国

# 定都北京

## 初记

舒云

### 唐延杰说：“果然辅仁大学里有特务。”

地球上最后一座完整的古城回到了人民手里，故宫博物院院长仰天长叹一声，多少天淤在胸中的担心终于化作了两行兴奋的泪水，一点一滴渗进和平的土地里。

北平无战事，也好也不好。

本来，北平就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种人物中，有下野的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有官僚，有封建把头，有恶霸匪棍，有小偷地痞流氓……而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西北、华北等地的国民党要员，逃亡的县政府以及几万散兵游勇麇集于此。

几方面因素一凑，就使北平的政治垃圾大大多起来，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位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初，北平有这么一个歌谣，“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枪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五多中有四多是与治安有关的，可见当时北平的社会秩序有多混乱。各种案件屡屡发生，仅三月份就发生103起之多。

1949年2月15日，叶剑英签发了一个紧急通知。根据密报，敌伪此次离平，对特务组织曾有周密布置。他们以各种名目混入各部门，进行暗杀、破坏、造谣等活动。叶剑英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并对原有人员严密注意，慎重审查，不经批准不可随意任用。另外，外出也要慎重，以防不测。

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有的警卫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颗手榴弹。而一名家住南苑的市内军管会干部回家看望同学，被同学骗到山洞打死。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安定的因素比比皆是。

进城后，华北军区驻在庆王府。对面是辅仁大学操场。操场上是一个高射炮阵地，有五、六门高射炮。

一天，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找来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交待他独立去完成一个任务。叫他不要走进高炮阵地，只是在墙外步测一下，看看高射炮的位置跟外面的关系。比如，电线杆向南的方位是不是炮位？外角是不是一个炮楼等等。

王文治悄悄去摸了一下。

因为唐延杰反复交待，一定要一个人去，不能派参谋。尽管王文治心里很奇怪，但他没问。

侦察结果很快出来了。操场外面的方位跟操场里面的炮位一致。

唐延杰说：“果然辅仁大学里有特务，他们的报告材料叫我们给截获了。”

# 共和国定都北京初记

40年后，王文治回忆起这件事。他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特务案的前因后果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入城之初，彭真提出首先要完成的四项紧急任务中，当务之急是安定社会秩序。**

安定北平的社会秩序，首先要处理散兵游勇，这是一大批人，又有武器，任其流散四方，势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

北平军管会入城的当天，就贴出了关于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同时颁布了工作方案。

紧接着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也贴出一系列布告，要求流散军人、特务分子限期登记。

1949年在中南海当工友的夏师傅，离休前在总政一个家属院看传达室。他说，那一阵子布告特别多，想了解什么事就去看布告好了。

这一系列布告确实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人民解放军入城之初，三三两两的流散士兵充斥街头，有的不仅公开抢劫，甚至殴打游行的工人，撕烂他们自制的欢迎旗帜，明目张胆地反对2月3日的入城式。为此，公开抓了一批。随即广贴布告。47天中，收容和处理了3万流散官兵，特务除登记自首外逮捕了近千人。但是，据保守的估计，北平的散兵还有4万以上，起码有一万流浪街头。特务估计也有三、四千。这些漏网之鱼对北平的治安仍是一个很大威胁。

叶剑英市长治理北平像他指挥打仗，力争全歼。他对一同进城的公安局领导说：“卫戍、纠察、治安这些机关要集中起来，打开灭战。统一步调，密切配合。”

为此，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以及街道上群众治安员全编在一个组织里，取名叫做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担任主任，副主任是徐冰。

委员会很快拿出一张布告。

要求集中力量肃清流

我接防部队到达朝阳门，傅作义部队官兵列队迎接。



改编的原傅作义部队士兵学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1949年4月12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渡江战役，4月23日，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即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这是毛泽东在看南京解放的报道。

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1949年底，公安局在年终总结时很自豪地宣布：“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首都的警卫工作，保证了各种重要会议的进行，保卫了各级首长、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的安全。”

在进入北平之前就已经组建起来的北平市公安局，在1949年这一年中，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

其中有：张荫梧等军事阴谋暴动案；徐宗晓等潜伏案92起；美国间谍案3起；木剑青等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2起；特务杀人案9起；破坏经济案10起；特务行抢案6起；特务冒充案五起。等等。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到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之际，北平社会治安状况基本良好。

1949年，重大活动很多，每一次，公安局都是全力以赴，动员社会力量，共同警卫大会。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出勤人数12000人次。这些古城卫士没有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姓名，但他们的不朽功绩将永存于世。

## 毛泽东说：“噢？公园里怎么没有人？”

毛泽东进城的第一天，是在颐和园午休的。他前往位于半山腰的益寿堂用午餐时，对工作人员说，找机会一定要游一游颐和园。

毛泽东没有来过这座著名的皇家公园。当他终于走进颐和园时，发现公园里冷冷清清。

“噢？公园里怎么没有人？”毛泽东听着热闹的鸟鸣，奇怪地问。

秘书叶子龙忙说：“今天闭园了，怕不安全。”

“这是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还有什么意思！不游了，不游了。回去，回去！”毛泽东扭头离开了颐和园。

闭园的主意是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出的，他挨了批评，赶紧组织第二次游园。

这次组织了不少大学生，他们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年轻人，其中不少党团员。上级规定，他们在游园中，只

是陪游，不许上前握手，不能“包围”主席等等。

毛泽东对第二次游颐和园表示满意，他对秘书说：“这次不错，园子里有游人，还挺规矩。”还有一次，毛泽东进城，路过平安里的柳泉居，突然想吃一碗家常面条。他忙叫临时停车。毛泽东走进餐厅，马上被群众发现，一传十，十传百，人越围越多。几个小时后，公安局派了一队警察才把他“抢救”出来。

从此，毛泽东接受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不再随便行动了。

北平的风味小吃远近闻名，西单菜市场以及南边的义利门口，都有私人冬卖糖炒栗子，夏卖刨冰。这种刨冰实际上就是用手摇制的冰淇淋。政协开会期间，耿树平专门负责为政协代表买刨冰。为了保险，他布置一个便衣守在冰淇淋的桶边，专门看他做。一桶做好了，放进装有天然冰的大木桶里。大木桶里的天然冰都是撒了盐的，以增加冷却程度。等到摇好一桶冰淇淋后，守候在一边的便衣才开口说，这一桶我全要了。因为盯着他做，他不可能放毒药什么的。就这样买完一桶再跑到另一个摊头等着买另一桶。然后用汽车拉去给政协代表吃。

过去也是这样，大户人家总是预备一只大桶，专门买冰淇淋。所以，小贩也不足为奇。

耿树平因为打扑克算得快老当赢家，搞保卫也是满脑子点子，因此，战友叫他小头脑。40年后，耿树平从人民大学一个研究所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忽然想起为政协代表买刨冰的往事。他想，如果那时我们公开告诉小贩冰淇淋是给毛主席做的，那他一定多加糖。但是，谁敢？在饭店宴会上，毛主席的那一桌，工作人员都要提前半小时去尝一下。

那时，耿树平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的参谋，他参加了政协会议筹备会的工作，具体分工保卫。

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闵步瀛专门分工管便衣，他是毛泽东外出时的流动警卫。他经常带着耿树平等几个机灵的小伙子执行任务。

毛泽东外出的目的地从不告诉任何人，一般他都是坐到汽车里，才交待司机开往何处，甚至也是临出发才知道毛泽东的行动路线。这个高度警惕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毛泽东的秘书知道了他的行动路线后，马上电话通知闵步瀛。闵步瀛才开始布置沿途警卫。

有一次，毛泽东去北京师范大学看他过去的老师汤用彤。闵步瀛接到通知，立即带着耿树平骑三轮摩托追踪而去。然后挨窗子寻找保卫目标。找到后，他们就守住窗户根，防止有人窜上墙头。等到毛泽东聊完了，把他送上车，然后一路护送回中南海。

**周恩来说：“你们布置的便衣我全认出来了。”**

周恩来有个习惯，每当坐车路过北海后门时，他就招呼车子停下放他下去，并嘱咐车子绕到北海前门等他。对于他这一手，卫士很有意见。平时，周恩来去北海散步，都布置好了警卫，卫士不在乎。而现在，保卫工作根本来不及做。

卫士嘟着嘴叫周恩来看见了，他打趣说：“怎么，还怕人民呀？”

幸亏这样的散步不多。

周恩来对自己的安全，不那么在意，而对毛主席的安全，他一丝不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一有空闲就要到新华门转一转。

当时，新华门对面有一面大影壁，便衣顺影壁东西两侧延伸出去，撒了一路。周恩来不放心，总要亲自看一看。

有一回，在毛主席外出的沿途布置好了便衣。周恩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你们布置的便衣我全认出来了。”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便衣可不能偷懒呵。”

侦察员化妆成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分布在小巷和沿线路口，有卖冰棍的，有蹬三轮的，有卖大碗茶的，有擦皮鞋的，有卖水果的，还有打小鼓的。

闵步瀛四面看看，他的这些便衣与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同呵，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应该知道其中的秘密。

“别猜了，你们便衣的鞋，你注意到了吗？”周恩来严肃地说。

！闵步瀛一拍脑袋，所有派出去的便衣都还穿着部队上的黑色胶鞋。这种鞋，老百姓不可能有。北平又没有打仗，老百姓拣不了战利品。穿这种胶鞋的必是便衣无疑。

“一看就是你们的人。”

闵步瀛实在佩服周恩来的观察力。虽然，他也想到了鞋子。只是借衣服裤子还好办，大小都能将就，而鞋子就不行了，一时不好找那么合脚的。也就马虎了一下，没想到让周恩来给抓住了。

闵步瀛赶紧去布置分批换鞋。

**徐肖冰说：“那张照片完全是抓拍的，哪个摄影师敢去摆弄主席？开玩笑！当然，也有例外。”**

毛泽东进城前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时，常在凉亭里看文件。那一天，秘书给他送来当天的印有南京解放消息的报纸，毛泽东立即兴奋起来。

恰巧摄影师徐肖冰在小院里转着找镜头，此刻，跑回去拿小型电影机已经来不及了。他就用随身携带的照像机拍了那张著名的照片：

**毛泽东喜看南京解放。**

不少人以为这张照片是设计出来的，要不然，怎么连报纸上的南京解放这一大字标题都拍得那么清楚？

后来，徐肖冰回忆那一张照片的拍摄经过说：“那张照片完全是抓拍的，哪个摄影师敢去摆弄主席？开玩笑！”

毛泽东个性极强，他在形体动作上从来都是我行我素，他没有习惯听从别人摆布，别人也真不敢去摆布他。但是，那一次天坛合影是个例外。

摄影师徐肖冰给毛泽东拍过那么多张照片，全是顺其自然，只有那一张以天坛祈年殿为背景的集体照，是徐肖冰的建议。

那天，徐肖冰接到了毛泽东要一游天坛的通知，他知道，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天坛，尽管北平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算得上故地了。

徐肖冰和他的妻子侯波提前来到天坛，先实地摸摸情况，选定最佳摄影角度。

当他们远远望见祈年殿时，徐肖冰就看上了这个气势雄壮的大背景，他想，一会儿要争取说服主席在这里来一张。

刚刚转了一圈，他们就看见一辆辆小车从古柏林中鱼贯而出。尽管国民党修临时机场，砍伐了一大片寿数很高的老柏树，天坛四周的柏树依然不少。

小车队直期回音壁驶来。

徐肖冰看见毛泽东先走下小车，又转过身把程潜扶下车来。

“这几天，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指政协一届会议）一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后天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不得了，所以我今天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毛泽东说。

所有在场的人全笑了。

陈毅尽管已是高级指挥员，但仍不失一颗童心，他

凑近回音壁，吼了充满野性的两嗓子：

“欢迎各位光临！”

“欢迎各位光临！”

声音反射回来，很清楚。

陈毅很得意，大叫：“太有意思喽！”

“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陈老总的川味儿。”有人打趣了一句，顿时一片欢笑。

徐肖冰看见周围的人都那么高兴，毛主席也那么高兴，几乎没思考就冒出了一句：“主席，我给你们在祈年殿合个影吧！”

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

摄影师徐肖冰为祈年殿前的他们留下了一张满视野都是欢笑的照片。

前排右起：陈毅，李明扬、程潜、毛泽东、张元济、陈明仁、粟裕。

后排右二是刘伯承。

徐肖冰在冲出来的照片上写下一行数字：1949年9月19日。

政协一届会议在两天后召开。

那张祈年殿前的照片照完后，毛泽东对身边的陈明仁说：“最近外面谣言不少，说共产党惨无人道，把被俘的杜聿明、王耀武等都杀掉了，还说你也被我们杀了。”

陈明仁是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

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群众大会会场





1949年2月10日毛泽东邀请部分民主人士游览北平天坛。这是在祈年殿前合影。左起：粟裕、刘伯承、程星桥、胡宗南、毛泽东、陈明仁、张元济、陈毅、程潜。

陈毅说：“蒋介石才是十足的刽子手呢，你把这张照片寄给你的黄埔故旧看看，请他们不要轻信谣言。”

“也请他们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劝劝他们及早归来。当然，爱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们欢迎；什么时候想走就走，我们欢送。这叫做来去自由。”毛泽东又补充了几句。

陈明仁说：“照片我一定寄回去，还要好好写几封信。”

毛泽东笑了。

众人也都开怀大笑。

## 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那一天，毛泽东去了，看了一会儿，他对傅作义说：“宜生，出去转转如何？”

“行呵，我正坐不住了呢。”傅作义说。

两人一先一后走出来，慢慢散步到回音壁处。

“宜生，你看我们把这一块补得如何？”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喽。”毛泽东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哪里哪里，毛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23年后的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首先向尼克松介绍了傅作义将军。

这时，傅作义想起毛泽东主席要奖给他像天坛一般大的纪念章的往事——

人民解放军围住北平时，傅作义开始征民夫抢修了两个临时机场。

一处在现在的东单公园。

一处在天坛南边的空场地上。

这两条上天之路均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

北平城区除了一片一片稠密的四合院外，还星罗棋布着历代积淀下来的古代建筑。为此，炮兵司令员专门拜访了住在城外清华园的建筑专家梁思成。

“请你把需要保护的古建筑标在图上。”炮兵司令员把地图摊在桌子上。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视古建筑为命根子。后来北京拆除环城城墙以及市内交通干线上的牌楼都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主张在旧北京以西另建一座新北京，保留古城。如果采纳他的意见，北京将是古今对比的风貌。

梁思成圈完后，炮兵司令员面露难色，这北平已经没办法打了，到处是圈出来的保护圈。

开炮的命令很小心谨慎，标尺定了又定，然而，一发炮弹终于没长眼睛，砸在天坛的回音壁上。

自从南苑机场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之后，皇帝祭天的这处地方，就成了傅作义的军事基地。这里有一个储藏

军火和飞机零件的仓库，四周的壕沟里还放了不少炮弹。加上这里又是一处临时机场，炮兵部队很注意这块地方，大炮的标尺都定在天坛附近的小树林里。

这片树林，老百姓叫它大长幅。

天坛附近的老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成立了护联队。那一天，两位老工人巡逻到大长幅附近的回音壁东北角时，亲眼目睹了一颗炮弹把回音壁炸塌了一个小角。

当天，地下党就通过北平城里的秘密电台把情况拍到城外。

据说，那发误伤回音壁的炮弹是算错了标尺，指挥员背了一个处分。

40年后，天坛公园文化处编公园史，很想寻觅当年换防北平的部队问问那是不是真的。

包围北平的炮兵主力是四野的。四野的炮兵不仅有一个独立纵队，每个纵队还配有炮兵团，师里配有山炮营。都加起来有好几千门大炮。打天津时，密如蛛网的炮火曾迫使天津的国民党的广播电台乱喊，别打啦，我们投降。当然，这时候投降已经晚了三秋了。

有着这么强大的炮火的人民解放军，打没什么坚固设防的北平可以说轻而易举。但是，毛泽东反复交待，宁肯让达官贵人跑掉，也不能因此而误伤古建筑。

这样一来，傅作义将军拱手交出一座完整的城市和25万的军队，不该得到那枚天坛一般大的奖章吗？

## 毛泽东说：“在这里，说句真心话，我们应该脱帽向庶民三鞠躬。”

每逢政协会议休息，毛泽东就提议去天坛散步。他每次去，总要叫上一个或几个民主人士。

那一次，往祈年殿走，向导介绍这座已经建成5百年的镏金宝顶三层屋檐的圆形建筑，那么大的大殿仅仅靠28根木头柱子顶着。

“是吗？”毛泽东说。“28根木头柱子……”

马上有人想起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

毛泽东没再说话，走进祈年殿。

扑面而来一片阴阴的青蓝色。

“对于古建筑，我可不敢班门弄斧。”毛泽东说。“看来这个漂亮的殿堂，一是皇上在这里向老天爷讨好；二是用天命来欺负老百姓，后来老百姓觉悟了，王朝也就散了。要不然，我们今天能大摇大摆地进这个大门吗？”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肃穆地说：“在这里，说句真心话，我们应该脱帽向庶民三鞠躬。”……

（选自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的《开国纪事》一书）

（责任编辑：晓波）





## 初识佐藤富子

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在这之前，1914年1月，他从北京出发，经朝鲜到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东京住了一年半。预科毕业后分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继续学习。

他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不久前去世的友人陈龙骧料理后事的。他来到了陈龙骧曾经住过的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在洁白而又宁静的走廊里，他无意之中见到了一位年纪很轻的看护。她的身高约一米六、七，在身材较矮的日本女子中算是佼佼者了。体态丰满，皮肤白嫩，圆圆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灵活的眼睛，脸颊上泛着淡红晕，显示出一股特有的处子风韵。

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22岁。

“你好！”

她主动招呼起他来了，脸上笑微微的，又用双手按着膝盖鞠了一躬。这是日本女子见人时的一种礼节。

在这位年轻的护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竟有些脸红起来了。一种欣喜加艳羡的异样的感觉掠过了心头。他镇定了一下自己，向佐藤富子说明了来意：

“陈龙骧君有张X光线的摄影放在病院里，我今天特地来索取。”

“陈君？是你的友人么？”佐藤富子态度友善地问道。

“嗯。他进了一高之后，得了肺病，从杏云堂转到圣路加，又从圣路加转到了养生院。”

郭沫若伤感地说，佐藤富子是极富同情心的女子，一听说他的友人已逝，眼睛顿时溢出了悲悼的泪花。接着又安慰郭沫若道：

“陈君是到上帝身边去了。我们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天国才是归宿呀！”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眉头皱成“八”字。郭沫若注视着她的眼睛，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圣洁光辉。

与此同时，佐藤富子也在注视着郭沫若：苍白的面孔，紧紧闭着微微翘着的嘴唇，眉间额上如不十分注意

时还不能看出的皱纹，钝郁凝滞的眼光……这一切都表示出这位年轻人正琢磨受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思虑与煎熬。

“看来他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哪！”佐藤富子心里暗暗想着，于是又说道：“X光影片寻出来后，我会给你邮去的。请问寄到哪里呢？”

“请寄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我在那里读书，明天就回去。”

“哦，你是未来的doctor！（医生）”佐藤富子欣喜地说道，黑晶晶的眼仁放出了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一九三三年在日本与安娜合影

郭沫若笑了笑，诙谐地说：“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杀人偿命罢了。”

“啊拉！”佐藤富子惊叫了一声，随即又好像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说：“哪有……哪有那样的事情呢？”

郭沫若脸上微微红，心里漾起了一阵莫名的骚动，比刚才初见时又强烈了几分。

### “他是一个好男子”

郭沫若回冈山不久，佐藤富子把陈龙骧生前的X光照片寄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Resignation（认命）的教训：

# 郭沫若与安娜的异国之恋

桑逢康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校门——郭沫若于一九一四年六月考入该校理科

“作为一名看护，人到属矿（病人临死时的代称）时的惨状我凝视过的回数很多。在那样的时候我总不知不觉地要流眼泪。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总有无上的悲哀潮涌上来，竟至不能不哭。我这样每被小姐们嘲笑。许多的同辈看着人的临终也能漠然不动，我真不了解。我自己也晓得死也并不是生的反对，并且有许多圣者是死以求生的，如象耶稣更是为使他人活而自己就死。……上帝是裁判众生的，容赦众生的。无论是善人，恶人，智者，贤者，君子，愚人，小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上帝是一视同仁的……”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1894年10月3日生于仙台，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佩女校毕业后，就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了看护。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着了一种 bitterish Sweetness。（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利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飒淑的挚友来，补偿我的欠缺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

的圣洁光辉来。他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

“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当富子这么想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未曾经验过的异样的感觉，她的白嫩的脸颊渐渐地潮红了。这是一位少女被爱神敲响心扉时心定会产生的那种惊喜交织的感觉；因此她并不十分认真地又回了信……

## 情义绵绵无尽期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学子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这次，佐藤富子接到的信札，觉得比往常的信要厚一些。赶快回到住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一帧郭沫若新近照的相片，背面上并写着“贤妹惠存”几个字。佐藤富子十分欣喜。——只要是郭沫若的来信，无论写着什么，她都感到幸福与欣慰。“我平常是怎样地怎样地渴望着我哥哥的信的哟！哥哥，我有一个祝愿：请你把一切的心事都直率地说给我听罢，这是我第一项的要求。……”

这样祝愿着，她把郭沫若的相片供在案上，又摘了些迟开的蔷薇花来，插在一个小小的花瓶里。她让蔷薇花儿伴着相片，让相片伴着她。这样静静地守对着，守对着，一种无上的幸福之感便充溢在她的全身心。

夜境森森地深沉下去，月亮显得更美、更皎洁。佐藤富子一个人倚在案上，从窗外吹入的凉风抚着潮红的两颊。她把郭沫若的来信又深深思索了一番，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展开信笺复信道——

“哥哥，你为什么不单称我是妹子呢？世间上有称自己的妹子叫作‘贤妹’的吗？你对于国内的爱妹是这样称呼的吗？我对于我的妹子一次也没有这样称呼过，只有我的哥哥……我真是不爱呢。你为什么不叫着‘我的妹子哟我的妹子哟’呢？哥哥，那样的称呼请你以后再不要用了（谨申严禁）。……”

“我替你缝了一件‘羽织’（和服的袍子），一条‘袴子’（和服的裙子），费了一个月的工夫才缝好了。在外边托人缝原是可以早办到的，但我想要你穿我自己手制的衣裳，所以偷些时间来缝，竟至费了这么久的时间。真是害羞得很，送也不好送得。但已经操了一番心，缝好了又不能不送，我只好给你送去。你怕不喜欢罢。但请宽怀地穿用罢。甚么也不知道，只是凭空做的，怕不一定合身。你能领受我的心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是怎样地幸福哟！……”

第二天，她把这封信连同“羽织”和“袴子”，一并寄往千里之外的冈山。

她寄的是一片深情，他收到的是一片厚意。

冈山，位于内海的西北岸。这里田畴畅茂，风景悠然，清风时来，溪

流有声，完全是一派乡村的景象。六高校园内的操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尤以松林居多，山形的轮廓颇看颇似峨眉山麓。一处名叫“后乐园”的公园更是清丽宜人，清清的池水中鹤鸟戏嬉，其丹冠素羽竟与淡日争鲜。处身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心灵里又为勃发的新生的爱情所涨满，郭沫若“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他先先后后写了好些诗，来抒发对佐藤富子火一样的爱恋。

这种恋情实在是太强烈了，它使得郭沫若心焦难耐。

一把小刀倚在窗边。好像她在向他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窗外，青青的海水不住地叫号。好像她在向他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爱情总是和健旺的生命、蓬蓬勃勃的青春联系在一起。郭沫若不愿意用刀子割破自己的嘴，他也不愿投身于大海的怀抱。他摒弃了这些死的诱惑，转而求助于新月与白云：

“月儿呀！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冰块？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新月弯弯无语，白云悠悠而过。它们都不能满足郭沫若对纯真爱情的渴慕。

这是真正的爱情。既不同于年少时看见堂嫂粉红柔嫩的手掌而萌发了性意识的最初征兆，也不同于成年后被强迫着入洞房完婚，那一幕至今仍给他带来烦恼与痛苦的“木偶戏”。总之，这一次和以往的情况都不同，他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个女人了，这个年青的女人也许不如花工美姬那么艳丽，不如百合幽兰那么清香，但她却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圣洁。

在渴慕中他又不能不同时暗含着焦虑：因为他爱上的是一位异国的女子，又发生在异国的土地上。爱情之树能不能生长？爱情之花能不能结果

呢？

## 情火炽烈溶春魂

转眼到了12月，年假又到了。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而又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到了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这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圣路加病院里的工作十分忙碌，佐藤富子素来尽职尽责，更是忙得几乎没有片刻闲暇，有时竟至于连着三四个晚上不能睡觉。但郭沫若的到来显然给她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她那圆端端的脸庞上洋溢着笑容。

佐藤富子把郭沫若领到下宿处。他的那一帧照片仍立在案上，只是花瓶里的蔷薇花儿早已经枯萎了。待来年春花发时，她要重新摘几朵鲜艳的花儿插在花瓶里。

他们已经在书信中相爱并认作了异国的兄妹了，所以见面之后也就无话不谈。郭沫若首先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对佐藤富子说：

“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

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五所高等学校订有契约，凡考取的中国留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佐藤富子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医科费用又大，买参考书就贵得吓人，所以并不富裕。但他认为爱情的美丽的花园需要两个人共同来建造，替自己所爱的人尽微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对郭沫若的建议很感动，同时也有些犹豫。凝眸想了一想，她对郭沫若说道：

“假如我真能够进去的话，那是太高兴。我将来能够稍微帮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此事假如在我哥哥身上稍微加上些苦痛的话，我都不愿意去。哥哥假如支持不起的时候，我就留在这儿等到哥哥毕业罢。哥哥回国的的时候，假使我一点也不能帮助，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贡献什么，这是最没意思的。只顾自己的私图，不

顾哥哥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佐藤富子说得又诚恳又深情，眉目之间荡漾着圣洁的光辉。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蕴蓄已久的话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三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结束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主啊……”佐藤富子叫了一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又慢慢地垂下了眼帘。两颊上的红晕变得更深了。

郭沫若见此情状，很有些惭愧了。他觉得他的要求未免过于唐突，佐藤富子毕竟是圣洁的处女，而他的童贞



1918年摄于九州大学医学部



1936年摄于日本

早是自行破坏了的呀！

“也许我不应提这样的要求，”他红着脸对佐藤富子说，“我在民国二年时，父母已替我结过一次婚……”

他如实地向佐藤富子讲了他那不如意的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痛苦。

心里祈求着上帝，佐藤富子的脸上重又布满了圣洁的光辉。她用一双黑曜石般的眼睛望着郭沫若，激动地说：

“哥哥，请你不要怀想着过去的一切，请你通通把它忘记，请把我，请把我当作你真正的妹子看待罢——这是我最大祝愿。我们相互协力，相互慰安，无论是乐是忧，你一切都分给我罢！……”

佐藤富子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

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多年来他心中的最大缺憾，终于得到了补偿。几年前他像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似的来到日本的，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赋予了新的生命。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利亚。所以，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这一天，12月25日，是圣诞节。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作着祈祷：

“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污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茏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郭沫若后来把它译成了中文，用作《辛夷集》前的小引。）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

“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啊啦，献给我的？”安娜笑着接了过去，饶有兴趣地读着：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砂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的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装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俗称木兰）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会，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真是优美得很哪！”安娜读完后，由衷地赞美道。

这是一篇象征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匹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巷子里唱起了赞美诗。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

“这一切怕都是上帝安排的罢！”安娜沉思片刻，说道：“以往我或者往乡下去旅行，或者留在城里读书，或者往海边上去，在那儿和许多旧友或者新友一同游戏过，一同用过功，但是我的心里一回也没有起过那样的感触，怎么独只有这回，并且对于不同国度的你，起了这样恋爱的心意呢？在

我自己，无论是怎么想来，也不知道甚么缘故。并且你还是……这我也是晓得的，但我怎么起了这样的心呢？啊，你怨我，请恕你我，把我容纳到你宽大的爱情之下罢！”

耶稣的圣像微笑着，好像在为这一对年青的异国恋人深深祝福。而安娜把郭沫若献给她的这首散文诗，看作是自己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郭沫若把安娜称之为 Venus（爱神），爱极情浓，他紧紧拥抱着安娜，深情地吟道：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那“酒杯”盛满了爱的蜜汁，那“墓”是温暖而富有弹性的。青春的血液沸腾了，两个火热的灵魂于是溶化在了一起……

他又告诉安娜：小时候他爬竹杆玩耍，用两只脚把竹杆紧紧地夹着，竟很怪异地感觉到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以后偷读《西厢》，受了“莺莺不语科”、“红娘云小姐，去来，去来”、“莺莺行且止科”等等富有挑拨性的暗示，尤其是其中“软玉温香抱满怀”、“嫩芷娇香蝶恣探”之类，使得他的指头儿又忙碌起来。往后，又是在花园里想打触三嫂的粉红柔嫩的手掌……末了，他总括似地说了一句：“总之，我是早熟的。”

安娜听了格格笑个不止：“多么有趣啊！你怎么不写出来呢？”

“以后我是要写自传的。安娜，我尤其要把我们的恋爱经过写出来，写成小说作为永恒的纪念。”

次年三月，安娜去东京读书。郭沫若送她回来的路上，走到旭川桥上。旭川系冈山市中的一条小河，水清宜浴，有如故乡沙湾之茶溪。此时一弯残月仍高挂在天上，一轮圆圆的红日早已出自东方。天上日月并存，地上恋人分离。桥下的流水奏着哀音，呜呜咽咽如像一曲送别的骊歌。郭沫若立在桥上浮想联翩。他想要爬上天去，把那同其金梳儿一样的月儿取来，亲自用手插在安娜的头上；他想爬上天

去,把那同月桂冠儿一样的太阳取来,借着安娜的手戴在他自己的头上。可是天这样高,他怎能爬得上?纵使爬得上去,他所爱的人儿已经走了,不知如今又到了哪方?……

这样想呀,想呀,对安娜的思念之情使他倍感惆怅。于是一首《别离》就在他心中孕育出来了: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妹。  
彼妹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泣。”

晓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生离令我情惆怅。”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郭澄均给婴儿取名“和生”,取和气致祥之义,又以生在日本,意在双关。郭沫若则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 被非难的结合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佐藤右卫门——安娜(佐藤富子)的父亲——原来是日本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来由于他对残酷的战争十分憎恶,因而转向了基督教,当上了牧师。佐藤富子是他的爱女,他待她一向极端严格又极端温和。然而这次他的脸上被悲哀锁着了,声音里含着怒意向女儿道:

“你终没有回去的心肠吗?”

富子连头也不敢抬起来看父亲。

父亲生气来了:“为什么不回话呢?你虽然是我的女儿,但我也决不是束缚个人自由的父亲!甚么都好,只把你自己的决心正确地对我说罢!好,快说罢!你到现在还在踌躇着什么呢?一点也不要迷惑,把你已经决定了的心事说出来罢!再不然还是跟着你的父亲回去。”

作为父亲的佐藤,最初的话中虽然有猛烈的怒意,但在最后的话中却十分温婉地充溢着无量的恩情。

“父亲,我无论如何也不回去。”

富子把这一句刚好答完,便埋头哭起来了。这时在她心中只有上帝和郭沫若。

“不孝的女儿!”

佐藤战栗地这样怒骂着女儿。隔了好一会儿,他又用沉浸在悲哀里面的幽暗的声音说道:

“终究无望吗?……”

富子只是哭,只是哭,父亲又说了好些话,她都没有听进耳朵里。她的命运她自己已经造就了,那就是对郭沫若的至死不渝的爱。“我要求上帝的许可使我得以爱我哥哥,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他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除他而外我永远不爱别人!我这样对着上帝发誓。我要求上帝的许可使我得以爱我哥哥,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在对着上帝祈祷。我祈祷我们两人在上帝的祝福中能同得幸福。……”

可是她又觉得非常悲哀:“听父亲的教训这回怕要算是最后一次了吧,从此……”佐藤终于孤寂地一个人回去了,富子目送着父亲的包藏在可怜的悲哀里面的背,竟不由自主地倒下去了……

尽管从此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但安娜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她态度决绝地对郭沫若说道:

“我把父母也弃了,弟妹也弃了,国家也弃了,只来跟着你去。自己想来这决不会是幸福的事情,但虽是不幸,我也不管。我甘愿倒下去跟着你去。”

她的脸上满布着圣洁的光辉,神情坚毅,好像在爱情的道路上要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似的。郭沫若十分感动地望着她,眼泪禁不住滂沱起来了:

“安娜,安娜,你真是我的圣母玛利亚!”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自杀,父母也会因而气病。考

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当时他想:

“纵横我是不愿仰仗家庭,我是不愿分受家庭中丝毫的产业的,我何苦要为这些形式,再去牺牲别人!父母不愿离她,尽可以把她养在家中做个老女;她也乐得做一世的贞姑。照人道上来说,她现在的境遇,只是少一个男子陪伴罢了,我更不能逼她去死,使我自己担负杀戮无辜的罪名。”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出门求死去,孤月流中天。

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

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叹。

画虎今不成,当狗天地间。

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

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

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潺潺。”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责任编辑:晓渡)



1941年留影

# 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

胡  
戟



被誉为“西方伯乐”的马悦然先生，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后三天，以《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为题，发表了一篇表达自己扼腕之痛的悼念文章。马悦然先生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为了使沈从文得到他应有的世界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前些年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甚至努力将沈从文作品译成瑞典文。译著在1988年8月出版，可是沈先生却在5月去世了，上一年文学奖颁布时马悦然曾说：“等着看明年，我对明年最有希望。”然而沈先生等不到下一个十月就走了，中国失去了产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会。

到现在，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

年了，还不时听到“沈从文在国外的名声比国内大”之类议论，这便使我总忘不了“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那句深沉的发问。

沈从文，对于在共和国长大的四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朋友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作为留下近千篇小说和散文的多产作家，那是他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一段历史。自四十年代末封笔以来，他在文坛上沉寂的年头太长了，而后在文物学的领域里，他又埋头工作三十多年，可这是个大多数人熟悉的行业。现在，国外有人称颂：“沈是五四以来最伟大的中国作家……是个纯中国风味的作家。”法国把沈列为学习汉文必修的四位语言大师之一。国内也有人预言：“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将是墨子、庄子……之后，又一个什么子。”无论最终给他的评价是什么，中国人应该知道自己身边又出了这样一位文化伟人。

我有幸在沈先生年届古稀时结识了他，是王弻先生执意要带我去见这位非常值得认识的人。我们便去了东堂子胡同，当时那里还是门可罗雀般冷清。

进了那间好歹剩给他的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屋，我简直无处插足，眼界之内，全是书籍、图片、手稿和纸袋，床上也堆满了书，要挪出一块能睡下去一个人的地方，也得费点劲，因而被称为“小小窄而霉斋”里。沈先生长期就在这里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

见面之后，沈先生便亲切地对我以小弟相称，顺手从桌上拿起一纸淡红的洒金花笺，上面刚写好他游漓江时作的一首小诗：

绿树蒙茸山鸟歌，溪间清润秀色多。

船上花猪睡容美，岸边水牛争过河。

沈先生指着念着，念到他最得意的那句“船上花猪睡容美”，他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天真。诗中所写挤在一条小船上过日子的一家人，还要养一头猪，这情景，城里人见了大凡是要皱眉头的，但在熟悉他们，把无限的温爱给了他们的乡土文学家眼里，那熟睡的猪竟是那样美，激发了诗兴。读到过这首诗的作家荒芜说：像沈先生这样把猪写入诗，“这在中国历代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看来沈先生



# 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

胡戟

比刘禹锡洒脱多了。他的审美观念也比刘的进步多了。”

沈先生又拿起一只通体晶莹的细瓷茶杯，指给我看上部一道一公分宽的翠三色装饰花纹，说是他提供的丝绸纹样，建议景德镇烧造到瓷器上。沈先生有一种见解，认为许多工艺品，在器形、纹饰上都是可以相通的，从来就是彼此借鉴，互相移植的。这种见解指示了我们作考古研究的一条途径，即从纹饰寻找历代文物间的承袭关系。古为今用，这也是今天搞工艺设计的一路门径。细看沈先生手中那只杯子的纹饰，那质感果然仍是锦缎般的柔和，真是很成功的一件艺术品，是我见到过最美的杯子。沈先生笑眯眯地端详良久，眼神中充满着兴奋和欢喜。

我们就这样从无拘无束的话题开始了十几年的交往。而后他在友谊宾馆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本大书定稿时，我们又同住一室，朝夕相处数月。工作之余，陪他休息聊天，交谈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他小时候逃学去游泳的顽皮，报考北大落选但三年后被请进大学（中国公学）讲课的自豪，第一次走上讲台涨红了脸半天讲不出一句话的狼狈，在黑板上写“我有点紧张，请等一会”，对学生尊重地秩序井然感到的欣慰（学生们看过他发表的作品），到他与上层下层各种人的交游，和过去现在的文学、文物工作，无话不谈。这些谈话，不仅使我了解了他的业绩、品德和志趣，更为后辈树立了一代风范。特择要记之，以飨读者。

## 一、关于他的文学和退出文坛

沈先生不时深情地回忆起自己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文学生涯和当年的朋友们。他有些避讳三十年代文艺界的是是非非，所以他后来在美国也特别选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这个题目。但即使鲁迅、郭沫若对他的误解或伤害，他能有一种前嫌俱释的胸怀。只是对丁玲，提起来不免心潮难平。当年胡也频被捕，左翼人士不便活动，希望他公开出面营救，他立即去了南京。随后又掩护丁玲，伴作家属，亲自将丁玲和她的孩子护送回老家。他写《记丁玲》并无恶意。可

是这位革命得很的女强人，由于某些纠葛芥蒂，后来沈先生最困难的时候，竟不肯一言相助。到八十年代，仍那么盛气凌人地待他，难免让人有恩将仇报的感觉。

说到文学创作，他用重重的湘西口音对我讲了一句至理名言：“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这很可以帮助我们将其的人为和艺术统一起来。

当时一些出版社又开始选编他的文集，沈先生问我的意见。我从他带到友谊宾馆的几个集子里点了几篇，特别提出《月下小景》，我喜欢那叙述一对恋人殉情悲剧的优美语言：

横断山下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寨里，保持下来一种源于野蛮初夜权的古老习俗：“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石磨捆到背上，或沉入潭里，或抛到地窟窿里。”面对“只许结婚不许恋爱”的“魔鬼所颁的法律”，这对愿意把自己整个交付给对方的小寨主和他的情人，因为谁也不想照习惯先把贞操给一个人蹂躏后再来结婚，便在野合后一起“很快乐的”咽下毒药，“微笑着”在柔美的月光下同赴黄泉。

这个短篇很好地体现着沈先生文学创作注重人性与命运冲突的主题，和在平静美丽的文字中蕴含对一切不合理旧事物强烈批判和控诉的文风。这主题，这笔法，就是沈先生自己主张的“作品对于人类进步、世界和





10岁摄于故乡湖南凤凰县

和平”要有“真正的贡献”的文学宗旨的实践。

沈先生的创作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对于自己作品的有些人物，他还能列举出生活中的原型。他特别惋惜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嫁给某官长之类，当了太太、贵妇人、名媛之后，终日玩牌消磨生命的女子。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在他看来是最不可取的。唤起这类女性的人生觉悟，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事情，也是沈先生作品经常的主题。

沈先生的文论和美学理论很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数学与音乐之美，又在文学美之上的观点耐人寻味。他从来不穿西装，但却酷爱西方音乐，陶醉于音乐的表现力。他在《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同时又是大型建筑博物馆》一文中，说到“真是够庄严、深厚、沉静和一种不易形容的美丽”的北京时，有这样一段话：

……蓝空下的北京一切，诗人即或想用文字来叙述赞美，不免会感觉到难于措词。即色彩丰富的绘画，也只能画出部分的印象。或许只有某种伟大音乐，综合百十种不同乐器中所具有的豪放和精细、壮美和温柔的声音，融化组织不同的时空下形成的种种旋律和节奏，写成一个乐章，才有希望能作出适当的反映。

沈先生有极高的形象思维能力，

作为一个搞具体形象美的文学家，居然那么样赞赏抽象的音乐以及数学的美，这表现了他美学思想的深度。

苏联一位著名数学家雅科夫列夫教授这样讲过：“数学是美妙的，数学世界美丽、和谐、有秩序，清晰简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数学的长处还在于像音乐一样，不用任何翻译加工，就能为世界上所有人欣赏，接受。

沈先生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和一些高层次的数学家、音乐家想到一起了，他深深向往着数学美和音乐美，在对美的理解和追求上，他超越了同时代的文学界同行，我们读他的文章，不难感受到一种数学的简洁美，他的文字则跳跃着音乐感。记得沈先生在听到姚雪垠先生写《李自成》的计划时，曾建议这个题目做30万字就可以了。现在姚先生的鸿篇巨著完成了，回过头来做书评时，想想沈先生当初的建议是否合理呢？

关于他从文学改行搞历史文物，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依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凭四十年代以前的作品，已处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被看好的地位，可是到五十年代以后，他突然在文坛上消失了。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矢志要学个三五十年把文字完全掌握住的文坛宿将，从文学阵地上落荒而走，走得无影无踪？他给一位朋友留有“（民国）三十七年除夕封笔试纸”的字，那一年早些时候，他被

郭沫若的一篇斥文扣上沉重的政治帽子，随后又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从时间上推论，他随后真的封笔大约是与这些有关的。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适应不了新的要求”，晓得自己不宜再写小说，要另外搞碗没有风险的饭吃，也是因为爱好，便从新文学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显然这是个绝顶聪明的选择，这使他后半生的工作，能够对于个人对于国家都比较有意义，不仅没有浪费时间，而且有了新的成就。巴金在怀念他的文章里写道：“我多么羡慕他！”由衷地佩服他的机智。大概很少人能如他那样，在历史转变关头，一下子就对世情人事看得那么透，以壮士断腕般的决心，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之道。别人30不学艺，他50还改行，毅然作出重新开始自己后半生的重大决定，而且矢志不渝，一直走到生命之路的尽头。

当时我最想问的，是沈先生既然自称作品是“试验”，是“习作”，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试验的结论是什么？我希望沈先生能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个总结。这个问题和所有别的提问不一样，沈先生陷入深深的思索，良久没有回答。过了几天才对我说：“有我的文章在，大家可以看，我不用说什么了。”那是用一种充满自信的口气说的，我赞成马悦然的看法：“他是



沅上的篷船



个骄傲的人，因为他自己深深知道自己的价值。”我理解沈先生想的是，自己的作品被冷落多年，人们不熟悉他，国内研究他的人，屈指可数，现在文学界的评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很难理解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与其作说不明白的解释，还不如留下作品让后人去评说。他着急的是，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是平静点，才能多做些事。”

曾经有30年的时间，他失去了作家的名分他都不在乎，那时他参加代会的身份是不入流的“杂家”，到八十年代他才第一次以作家身份与会，他幽默地说过这件事，好比是出土文物，文学界终于又发现和承认了他。

## 二、关于他的文物学和 研究构想

沈先生解释，他转到文物工作上，也并非偶然和勉强，这方面他是有爱好有根基的。

早年在沅水畔故乡的县城和小镇上，他就熟悉了竹木、油漆、棉麻等加工业，受过“飘乡手艺人”的熏陶。16岁时在旧军队里当文书时起，就喜欢购求碑帖，悉心临写，练就一手好书法。1922年夏到北京前，曾在总统府官身边作小师爷（即文书），他的会议室里有一批书，还有许多古代的铜器、书画和瓷器，他利用这一年，把那里包括四部丛刊在内能够看懂的书都读了。到北京后，前门外几百个古董店好比是“明清两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馆”，“东看看，西看看”，那些当时不上价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铺门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画轴，也就够使我忘却一切，神往心倾而至于流连忘返了。”可以说是在这“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业了，打下又一路学问的底子。

以后他从没有忘怀对文物的留意，即使抗战时执教于西南联大，还在昆明收集了一批驮马漆盒，大大小小，数目不少，后来全部赠送北大新成立的博物馆陈列室。

因此调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还是能接受的，登上午门城楼，在满是灰尘的几具木乃伊和断头器中开始了他的新事业。

沈先生从当讲解员开始。一天，一位从朝鲜归国的年青志愿军走进博物



1980年摄于北京饭店

馆，坐在门口的沈先生起身相迎，带着他看了一整天。最后沈先生问：“看明白了没有？”这位在文工团搞舞台美术的军人说：“不大明白。”于是又相约第二天、第三天再去，沈先生一连陪这位陌生人看了三天。告别时，深受感动的军人请教“先生的大名怎么称呼？”当听到回答是“沈从文”时，真吓了一跳。从此这两人结成忘年之交，这位年青军人就是现在任中国服饰学会名誉会长的王开，五十年代转业后他先后在考古所和历史所工作，30多年中从沈先生那里学了许多，也帮了沈先生许多，成为沈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和学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本大书就是以王开为助理完成的，这是沈先生在平凡的工作中以诚恳的服务精神赢得的无私朋友。

进入历史博物馆，对沈先生也可说是一种幸运，从此他有了接触更多文物的机会。故宫收藏的文物，他几乎件件过手，一一登录，即使是巨大的地毯，也由多人帮助抬进抬出，一张张打开看过。三反五反时参与清理北京市各文物商店的古董，又是80万件之多，经他过目鉴定的，在一半以上。其他如各地博物馆藏的名画，他也曾遍访一过。人们说他有一个计算机式的头脑，看得仔细记得清；别人忽略的东西，他专门你奔我取，一一排列组合贮存在大脑中，做精心的分析研究。李约瑟来问中国马镫的起源。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使用马镫

改善了骑兵的战斗力的后，欧洲的封建堡垒、封建制度被冲垮，而马镫是从中国传去的。问了几位考古专家，一时都没能回答上来。沈先生却侃侃而谈，指出最早的马镫是一只套大脚趾指的环，而后如何逐渐演变，一一举出有关实物和画塑资料。这个事例表明沈先生在学术上的广博深厚。

1980年沈先生访问美国时，在讲演中说到：“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

据我所知，沈先生陆续积累起来研究有素的题目不下30个，除服饰和1957年起陆续发表的《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龙凤艺术》外，还有前期山水画、扇子、灯、屏风、家具、女子坐具的发展、发饰、妆具、歌舞服装、两宋服饰史、百戏、乐器、玉器、彩陶、清初瓷器、陶瓷艺术、漆器、金银错、鼻烟壶、车乘、舆轿、马的装具、马球、狮子在中国、熊经鸟伸等。

比如前期山水画，探讨中国画起源，内容是极有价值的。去年在《中国文化》第二期上发的遗稿《说“熊经”》，所附西汉银错管状车器等文物上的熊经图案，一只只熊都是打太极拳的动作，十分可爱。说明“熊经”是模仿熊的动作而创造的一种健身术，用文物资料证明《庄子》中所说的熊经鸟伸到华佗“五禽戏”是一脉相传



63岁的沈从文和不满一岁的孙女的，填补了文献的不足，对研究眼下热门的气功、导引也是有用的材料。

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有一天沈先生应我请求，给我讲了我国玻璃（即玻璃）发展的历史。他说玻璃的发现应是很早的事情，史前人烧陶的时候，就可能有些矿物质烧熔结晶出来，便是最初的玻璃珠子。后来掌握了各色玻璃的烧造技术，用于装饰。这技术在历史上曾经失传，到隋代何稠又给恢复起来。沈先生很推崇何稠这位有许多发明的少数民族人物，由于他的发现，隋唐时的玻璃器就不都是舶来品，也有内地生产的，按质地是否铅玻璃就可以区别开来。但是还很珍贵，唐代诗人互赠礼品，就有只送一只夜光杯的。为什么后来我们的玻璃工艺长期停留在做装饰品为主的水平，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发展平板玻璃和玻璃器皿呢？沈先生解释，是因为中国的窗户纸、丝绸和瓷器太发达了，用丝绸和纸糊窗户，透光透气，

可以代替平板玻璃，瓷器水平很高，就不往玻璃器皿上发展了。大凡新工艺的产生，都是生活先提出要求，既然已经有了绢、纸和瓷器，玻璃的发展就受到制约。沈先生的解释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扇子》一题早就基本写成了，书中把历代各式各样的扇子都按年代顺序排起队来，说明每种扇子的名称，特点和使用年代。这份资料等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古断代的座标，在墓葬或画型中，只要有扇子出现，一查对就可以判断其年代的上下限，若结合其它文物图象，也这样做多方面考察，来回一卡年代，就可以相当精确地解决断代的困难。用这种方法，往往比用仪器考古简便又准确。扇子题目虽小，按沈先生的方法去做，成了一篇大文章。他在美国的演讲，有一次便是以扇子为题，非常成功。先生真是多识古物，提问越多，越知道他知识的渊博。

我曾建议沈先生，在服饰研究这一本总论脱稿之后，把他准备编10大本服饰图录的计划暂放一放，先总结整理一下他的文学。文物方面，服饰之外的其他题目也照顾一下，哪怕先把梗概的意见记留下来也好。正巧那时他的“洋妹夫”傅汉思先生来中国到友谊宾馆看他，送了一台当时国内还很稀罕的盒式录音机，我们想用录音的办法，先将沈先生的意见记下来。

可是对这些通上电开开关的洋玩意儿，沈先生就是不能接受。录音机一打开，他就紧闭住嘴，死死盯住看，一言不发，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服饰一书脱稿以后，沈先生差不多还有10年时间，但是都粘在这本书和后续的图录上了。书不出来，他总是不停地增补；书出了，他还补。这是没完没了的事，新材料会不断出土，怎么补得完呢？既然已经有了第一本书，可以交给别人和由后人去做了，大可不必由他本人一直做下去。可惜这意见没有被接受，其他题目和文学方面的总结都没有做，永远地扔下了。

在友谊宾馆时，我们还议论过建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中心的事。当时想到，只有这样—个中心才能充分发挥沈先生的作用。

中心要建立诸如纸张、丝绸、陶瓷、火药、服饰、车舆、印刷术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集文物收藏、陈列、研究、复制、培训于一身，展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最好中心就建在圆明园废墟上。

我们热热闹闹地侃了好几天，还写成了一份书面的建议，沈先生看过后，轻轻放在一边，说不会有人支持的。五十年代时，关于博物馆事业他就热心地提过建议，毫无结果。他是老马识途，自动悄悄地收了场。这件事的天折，今天想起来是不无遗憾的。

### 三、沈先生豁达执著的人格力量

雷电的一击，声音光明皆眩目吓人，但随即也就完事了。—盏长明灯或许更能持久些，对人类更合用些。生命人格，如雷如电自然极其美的眩目，但你若想过对于人类有益是一种义务，你得作“灯”。（废邮存底·给某作家）

沈先生这段讲人生哲理的哲言，正是他本人生平的写照。履行着“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的箴言，无比勤奋地笔耕一世，在文学和文物学两条漫漫长路上，为后学留下两盏指路明灯。

沈先生的一生，过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很少谈自己的坎坷，即使说到台湾禁他的书，大陆也批判他，两面都觉得他不行，他反而感到“那是很有趣的”，是“把我抬举得太高



1982年与朱光潜

了”。说到1953年烧掉他的著作纸型，文革中军代表帮他“消毒”，烧了他所有的书信，他的语气竟是那么平和，真是像他自己说的，“凡事不在乎”了。

只是“文革”中批判时，他说，开始是有些紧张，以为自己的文章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于是很用心地听取批判。可是听着听着发现，念发言稿的人，根本没有看懂他的书，连自己的书都没看懂，批判什么！他踏实了，放下心来又不在了。他转而研究起这场运动来，一边拔草，一边观察红卫兵的行动。知道我那时在北大，还问我：“你们那时怎么想的？”在那样凶狂的红色恐怖中，他竟能把自己解脱出来。

实际上沈先生并不是对政治很冷漠的人，他只是主张“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他反对文人从政，认为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在文学上，因为全力去做50年，还不一定能做好。

有一天他同我讲道：“人是没有权利杀人的”。类似的话他在二年后美国演讲时也讲过。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是我恐怕要用毕生的时间去理解其涵意的。大概是他十几岁时在湘西见到的数百人、成千入一起被砍头的悲惨场面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太痛苦了，使他格外爱惜人民的生命，主张人类和平。

沈先生在他那孱弱的身躯里，蕴藏着对自己同类的博大的爱，他以命运和人生的搏斗为主题来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文学追求的正是人类友爱的人性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从爱乡土出发，他的“爱历史文物，爱博物馆事业，亦就是他的爱乡土的忠诚和热忱的深化与扩大。”

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中，沈先生表现出了超凡的独立的人格力量。生活留给他的路，曾是那样窄，可是他走出来的路，竟是那么宽，积累了那么多的磨难和坎坷，他能不断地很快的克服自己脆弱的一面，他能战胜彷徨与绝望，生活得洒脱，生活得执著坚强，在文学之后，又留下了在文物学方面的成功。最后终于能说：“我活得很快乐。”

他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能够忍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反抗性不大。”而这又正是他的坚强之处，“凡事不在乎”，能随时调节自己的心理，去适



1980年在家中与金介甫先生会见



应环境，保持住良好的工作情绪，不受干扰破坏。他“怕写违命文学，也是为了减少是非”，中辍了文学创作，又正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初衷，坚持他自己的文学道路不被扭曲，无论对，无论错，他宁可让后人去评论，也不违心地做事。“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靠对人生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磨炼出一种忍受寂寞、孤独和别人误解的巨大精神力量，一种非凡的超人的力量，一种使他能够不断成就的力量。

这是他留给中国人的一笔很大的精神财富。青年作家古华说：“在我最困苦的岁月里，是他的作品给了我生命的抚慰、人性的滋润。”翻译家杨苡说：“是他们鼓舞的话语支撑了我走过这半个世纪。”对此我深有同感。也许我比他们更幸运的是，我不仅从沈先生的作品里，还从和他十几年的交往中，特别是在友谊宾馆朝夕相处一室的那段经历中，直接感受他那种独特的，或可称之为沈从文式的人格力量。

沈先生生活在20世纪，从本世纪初的1902年出生，一直活到1988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文学和文物学两个领域，可是他的文学长期不被海峡两岸的当局接受。他的文物研究，也被视为不正规而未被考古学界普遍承认。难怪有人说，恐怕要到下一个世纪，中国人才能真正重新认识沈先生。那时搞文学的，搞文物的各方面的人，会在他的书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得到他的帮助。那时候的人们会更加理解他，怀念他。

(责任编辑：卢弘)



1985年沈从文、张兆和与王孖(中立者)摄于社会科学院宿舍

# 贡献卓越 的海外青年 实业家

## 姚美良

· 石昌松



江泽民与姚美良亲切交谈

在庆祝新中国建立40周年盛大国宴上，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都高兴地与一位年轻的海外实业家亲切握手，称赞他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家乡建设做了许多好事，并同他合影留念。

这位年轻的实业家，就是祖籍广东梅州市大埔县，出生于新加坡的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

### 秉承父志

姚美良之父姚永芳是一位客家人，24岁漂洋出海谋生，历尽千辛万苦，在马来西来居奎市创办南源布庄，而后又研制成功“永芳”高级美容霜，这种高级美容霜以特有的魅力，在东南亚占有很大的市场。姚永量由于勤勉经营，事业有成，曾获马来亚最高元首颁赐的P. P. M勋章，被柔佛州苏丹殿下晋封为“太平绅士”。新加坡《星洲日报》称其“秉性豪爽、乐善好施，举凡教育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均给予大力襄助慨解义囊，一掷千金毫

不吝，为各界人士所景仰。”

姚永芳虽身居海外，但一刻也不忘记生养他的故土。姚美良11岁时，姚永芳决定将他13个子女中的4个——姚美良和他的3个姐姐送回中国读书。姚老先生对美良等讲：“你们虽然都出生在国外，入了外国籍，但不要忘记，你们的祖籍是中国，从血统上讲仍然是中国人，你们不能数典忘祖。我决定让你们回中国去念书，返回家乡看看，这对你们今后的事业、前途都会有好处……。”

那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他们在动乱中捱过8年岁月。美良后来对人讲：“临离开大陆时，我想，这个又穷又乱的地方，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回来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陷入了对故乡和乡亲们深深的怀念之中。我想，不管多穷多丑，那是我们祖辈繁衍生息的故土啊！我的父亲生前想要为家乡出点力气，由于当时国内不安定，未能如愿，现在只有我们做子女的来实现了。”

### 造福乡里

1974年，姚美良移居香港，继承父业涉足商界，他一边辛勤工作，一边上夜校补习英语。1977年姚永芳老人辞世时，在遗嘱中引用福州林则徐祠的一副对联告诫子女：“子孙若如我，留钱做甚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甚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姚美良秉承父志，定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的宗旨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姚美良迎来报效桑梓的好时机。1983年，他将他父亲经营了几十年、享有盛誉的“永芳”化妆品引入内地生产。依靠他的辛勤努力和“永芳”化妆品的本身质量，很快引起妇女的青睐，事业发展很迅速。姚美良决定，销售“永芳”产品所得利润，一分钱也不汇出国：一部分继续投资实业，另一部分捐赠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7年多来，他在内地的投资已逾2亿元人民币，捐赠遍及18个省、市、自治区，金额达3千万元人民币。

姚美良的家乡大埔县，位于粤东山区，这里山青水秀，资源丰富，但

姚美良看望冰心老人



因交通不便，生产不发达，群众生活困难。姚美良和家乡的干部及有关专家反覆研究后认为，要迅速改变家乡的面貌，不能靠“输血”，而要靠增强家乡的“造血机能”。

大埔县有6处优质的矿泉水资源，据地方史籍记载，明崇祯年间，当地曾修建一座太极池，素有“神泉”之称。这里的矿泉水，经专家们鉴定，有促进新陈代谢、保持皮肤柔润、生津补脑等作用，可与世界上五大名牌矿泉水相媲美。大埔还有丰富优质的瓷土资源，且当地有7百多年的陶瓷生产历史。姚美良经过多次考察之后，分别投资4千万和2百万人民币建立了南源矿泉水公司和陶瓷公司，又投资5千5百万人民币兴建占地50亩的大埔永芳工业城。目前，南源矿泉水和彩瓷产品已畅销海外，建有罐瓶厂、印刷厂、包装厂、陶瓷厂、日化厂的永芳工业城已初具规模，每年估计使大埔县工农业总产值增加2亿元。

今年3月，姚美良投资一亿元，与梅州市旅游局合作在广州建设的一座建筑面积3万3千平方米、高33层的现代化宾馆竣工并开始试营业。梅州古称嘉应，故这座大饭店即命名为嘉应宾馆，它已成为海内外客家人聚会的场所。

## 捐资兴学

姚美良慷慨捐资办学，在他三千万元的捐赠中，有八成款项是捐助教育事业的。有人曾不以为然地劝他，何不将这两三千万元投资实业，岂不收效更大？

姚美良回答：“从短期看效果确实如此。但邓小平先生讲过，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而未来世界最重要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在世界上只能排倒数几位。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大家都来关心中华民族教育这一千秋万代的大事。”

姚美良在家乡，除先后给大埔华侨中学、梅州市东山中学、嘉应大学等捐资2百多万元外，还在他父亲出生地银江乡，出资50多万无，建起了一条由10多家店铺组成的“永芳街”，

产权属银江中学，每年数万元的租金收入划作学校经费，从而使银江中学的教育经费有了一定保证。1989年“教师节”，姚美良捐赠给大埔山区中小学一千台彩色电视机，仅此一项相当于人民币3百万元。

此外，他在大连、沈阳、长春、重庆、兰州等10多个城市分别捐资10万元以上设立了“永芳教育基金会”；为产生过几名国手的上海市巨鹿路小学，捐资30万元，修建了一座“永芳”乒乓球馆。

## 弘扬中华文化

1990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艰难曲折、悲壮宏伟的中国近代史即由此揭开序幕。

为了不忘国耻，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姚美良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在1990年办了9件事情。

——在广州举办“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图片集、论文集和纪念专刊；

——举办“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史迹展览”；

——主办“纪念黄遵宪先生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览”；

——赞助出版《孙中山年谱专编》和“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协同海内外各方，倡办林则徐基金会；

——与《瞭望》周刊编辑部联合举办“情系中华”征文活动；

——捐资一千万元创办以孙中山纪念馆为主体的“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出资一百万元在浙江美术学院设立“永芳艺术基金”；

——与《体育报》联合举办“李惠堂球王奖”评选活动。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姚美良不仅捐资上千万元，而且风尘仆仆，四方奔走。

北京《美术》杂志副主编夏硕琦先生在回忆筹组纪念黄遵宪书画展览的情况时这样写道：“为发动和筹办此次大规模的展览，姚美良先生和他的顾问梁通先生，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京、沈阳等地与美术家

朋友座谈。黄遵宪先生的忧天热血、‘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的宏愿、‘世间一切人平等’的祈望，与姚美良先生‘纪念先贤，昭启来者’、愿以‘精卫填海’的意志，为振兴中华竭尽绵薄之力的深厚感情，使艺术家们深受感动，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激发了创作灵感。艺术家捧出赤诚之心，自愿不计报酬全力投入艰难的创作历程。”

纪念黄遵宪的书画展览，以黄遵宪一生活活动和其作品为经线，以中国近代史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为纬线，荟萃了海内外书画家130多幅佳作，展出后引起良好反响。这一展览已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新加坡、武汉、南京、杭州、梅州、香港等地展出，并将赴台湾及日本、加拿大、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或地区巡回展览。

## 贡献良多

姚美良年方36岁。这样年轻的实业家，何以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姚美良说，教导他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人，正是他的父亲姚永芳。去年12月，纪念黄遵宪的书画展览在广州嘉应宾馆首次开幕。姚美良在一幅描绘受苦受难而又坚韧不拔的众多华工形象的巨幅国画《生民》前，驻足凝视，久久不忍离去。事后他告诉别人，从这张画中，他似乎看到父亲一辈当年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在蕉风椰雨下胼手胝足、艰难创业的情景。耳畔又响起他父亲的话：“炎黄子孙在海外不管怎样有钱和有地位，如果祖国不富强，也是抬不起头来的，更不要说扬眉吐气了。”

姚美良常对人说：“这些年来有3件事最使海外华侨华人高兴：一件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改革开放后，中国百业腾飞使姚美良由衷高兴；近几年西风东渐，一些人数典忘祖，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潮，也使他忧虑。从父辈的坎坷经历和他目睹的中国现状，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振兴，要从振奋民族精神开始。”这也就是他

近年来倾力投入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一系列活动的初衷。

姚美良先生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做的事情受到社会主义的关注和好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说过：“姚先生多年来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倾注满腔热情，鼎力奔波，贡献良多。”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也说：“姚先生做了许多我们想做而现在还来不及做的事情，难能可贵。”1990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世界有成就的领先人物名人录》第2版、《国际有成就的勇士》第15版和美国出版的《国际名人录》第3版都将姚美良列入，称他为“在发展实业与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海外华人杰出青年实业家。”

### 缚龙 莫文骅

中央红军八万五，  
数十万敌追且堵。  
空中狂炸太凶残，  
湘江损失诚凄苦！  
遵义会议扭危机，  
进退灵活如猛虎。  
雪山草地脚下过，  
红旗飞扬长城曙。

神州封建数千载，  
强盗侵略已百年。  
革命反复遇挫折，  
同胞厄运实悲酸！  
万民高举农奴戟，  
遍地墩台冒烽烟。  
世上恶魔齐发抖，  
群雄激愤震三山。

马列指导七十春，  
风刀霜剑敢缚龙。  
三座大山被推倒，  
人民当家作主人。  
太阳亦有小黑点，  
安能一普掩大功。  
烈士英雄均伟绩，  
难忘领袖毛泽东！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黄浪华先生烦转萧克执行会长：

非常荣幸地收到邀请，成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为宏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尽绵薄之力，此次有幸加入贵会，得到机会向许多前辈讨教学习，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衷心希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能集中全国各届人士力量，齐心协力，共同携手，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努力。

致

礼！

姚美良 谨启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

### 《离骚》的题义新解

上海师大历史系王廷洽在《〈离骚〉题义新解》中说，通过对楚辞中“离”与“骚”用法的统计分析，“骚”不含“忧愁”、“悲恸”之意。王廷洽又研究了《哀郢》、《卜居》两篇与《离骚》间的有机联系，认为《哀郢》是诗人遭放逐，离开楚王、离开郢都时悲哀心情的表述；《卜居》是屈原为离别家乡用占卜的方法，决定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离骚》则是诗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告别可爱的故乡，故《离骚》即“离别故乡”。王廷洽还对诗人的故乡进行了考释，肯定“骚”即诗人的故乡蒲骚的省称。因此他认为，《离骚》的题解应是：告别了，蒲骚！

(彬 辑)

### 文天祥并不“惶恐”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肚骨睛

这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的几句。这首诗，表达了他以身许国，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气概，一向为世人所传诵。诗中“零丁洋”句，为即景而作；“惶恐滩”句是回忆自己在江西南部起兵的事。惶恐滩在赣南，是赣江上游十八滩之一。由于水急滩险，舟船经过时，

使人提心吊胆，所以叫惶恐滩。但句中“说惶恐”中的“惶恐”，却不作恐惧解，而是惭愧之意。这点要弄清的。

把“惶恐”（皇恐）作惭愧解，这是宋元人的口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有一个教官据错误的版本《易》出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考生觉得可疑，拿官本《易》本查对，原来是“坤为釜”，就拿给教官看。教官皇恐，乃谢曰：“某当罚！”《竹叶舟·子》：“自谓功名唾手可得，凯知累科下第，惶恐难归！”《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白拿这利物，惶恐！”这些都是例子。文诗中“说惶恐”，正同此意。

文天祥这句诗的意思是：回忆当年在赣南起兵勤王，志图恢复，而现在却兵败被俘，报国之志未遂，感到很惭愧。如果把“说惶恐”作恐惧解，那就与诗意大相径庭了。

作为名留青史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并不惶恐的！

(彬 辑)



## 陈立家

## 哈默和他的华裔助手

贾宗谊

1959年，陈立家从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1961年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电机硕士学位。从1962年起，他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供职5年，担任过设备系统工程师、电子计算机系统协调会主席等职务。在此期间，他还到纽约工艺学院继续攻读激光应用方面的电子物理等博士学位，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1967年，他转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工作。1979年到西方石油公司任职，是陈立家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应用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和实际工作部门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立家不单单埋头于科学加工业，他还十分关心政治，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

70年代初，陈立家联络了台湾、香港的一些留美学生，成立了纽约中

代表团，以及中国的石油、化工、纺织等行业的贸易代表团和考察团担任过翻译和陪同。他还曾帮助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同中国谈判石油业务。这是中国石油界同外国石油界开展勘探合作的开端。

陈立家找机会同哈默交谈，向他提供了中国希望同美国合作开发石油的信息，并讲述了自己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正在物色开拓中国市场的人才的这位董事长，喜出望外，当即表示：“陈先生，到我这儿来，帮我到中国去开拓事业吧。”陈立家回答说：“可以考虑。”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1979年5月中旬，哈默带领石油、煤气、煤炭、化工、采矿、农业、研究和工种等部门的经理共16人，首次来到北京，其中自然包括陈立家。当陈立家乘坐哈默的私人专机通过浩瀚的太平洋上空时，他不禁回顾了自己以往的经历。他已进入不惑之年，该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了。

陈立家1938年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他的父亲陈克非是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军队师长、军长和兵团司令等职。1949年，陈克非在四川成都率部起义。在此之前，陈立家兄弟姐妹5人跟随祖母和母亲经海南岛到了台湾。由于父亲在大陆起义，陈立家一家在台湾的生活颇为清苦。这种清贫的生活，促使陈立家兄妹更加发愤地学习。



哈默助手陈立家，1988年4月在钓鱼台会见记者

1979年初，当邓小平作为副总理访问美国时，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见见这位中国领导人。当德克萨斯的石油巨头们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竞技场表演时，他便偕夫人驱车赶去，几经周折，终于挤到客厅里，站进50多位总经理排队欢迎中国代表团的队伍里。微笑着的邓小平同经理们一一握手，当走到哈默跟前时，他对翻译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哈默博士了。”邓小平握着哈默的手，笑起来：“我们都晓得你。当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帮助了列宁。现在，你可要到中国帮助我们呀。”

“我非常愿意，”哈默说，“但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可我年纪太大了，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噢，”邓小平把手一挥，“这好办嘛。你啥子时候去，拍封电报给我，我给你安排。”

在晚餐会上，邓小平通过翻译同哈默谈话，了解他同列宁会见的种种情况，以及哈默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感受。临别时，哈默对邓小平说，一俟搭起一个经理班子和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就到北京见他。

这一切，被美方翻译陈立家看在眼里。这位在美国接受了高等理工科教育、通晓中美两国文化的华裔，预感到一种难得的机遇正在敲他的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陈立家先后为出访美国的中国国际贸促会



哈默来京度 90 大寿时，杨尚昆主席同他亲切交谈，左为陈立家。

国同学会，并担任会长。他同一些志同道合者捐款创办了一份以沟通思想、交流文化、架设人际心灵之桥为宗旨的综合性月刊——《桥刊》。《桥刊》曾出过一期倡议国共和谈的专刊。由陈立家等 13 人联合署名的题为《国共谈判是时候了》的文章写道：“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已经受够了分裂和动乱之苦，也尝尽了落后、贫穷和帝国主义的折磨，现在该是携手合作、自立图强的时候了。我们的政府，在大陆的或在台湾的，都已为中国未来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现在应该是和平解决内争，团结建国的时候了。”

陈立家像许许多多美籍华人一样，对中国大陆拨乱反正以后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渴望能在促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合作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怎能不兴奋呢。

哈默一行在北京，不管是同高级领导人的会见，还是同业务部门的商务谈判，都离不开陈立家熟练而又内行的媒介作用。双方谈判很顺利，仅在一周内就在北京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 4 项初步协议。

从此，陈立家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西方石油公司同中国的合作上，每年都要到中国来七八趟。他的工作很出

色，受到了哈默的赏识，在他到西方石油公司工作的第 5 年，即被提升为总公司的副总裁。除了主管在中国的项目外，还负责公司在东亚各国的业务以及整个国际贸易。

1988 年 4 月，哈默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来北京度 90 大寿。

4 月 26 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暮春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秀美静谧。嫩草青青，流水潺潺，一只孔雀在铁丝网围着的树荫下悠然漫步，偶而发出一声鸣叫。我作为《瞭望》周刊的记者，到国宾馆对哈默进行采访。

陈立家匆匆走来，把我们让进会客室。“实在对不起。中国科学院院长请哈默博士吃饭，我们很晚才回来，哈默刚休息不久，让他老人家多睡一会儿吧。”陈立家对我们七八个中国记者说：“各位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代表哈默博士回答。你们发表时，可以用哈默的名字。”大家笑了。陈立家补充说：“当然，有些问题，我可能也不知道哈默怎么想的。那就谈谈我的看法，作为陈立家的回答。”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很热烈。哪里像记者招待会，倒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聊天。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哈默来了。”一个服务员对陈立

家说，我们一下子走到前厅，只见西方石油公司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扶着哈默缓步走来。哈默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1988 年春，我根据哈默自传摘译五万字，以《哈默博士机遇》为题，在报上连载发表。我把这份剪报集送给了哈默。陈立家握着我的手：“晚间宴会上再见。”

宴会是在长城饭店二楼举行。宴会厅入口处摆着中国各有关单位赠送的寿礼。陈立家陪着哈默浏览一遍。哈默指着桌上一个近半米高的瓷寿星，问杨主席：“他多大年纪了？”杨主席微笑着回答说：“这，我可道不上来，反正很老、很老了。”哈默说：“看来，今晚我算不上是最老的了。”

祝寿宴会有许多助兴的文艺节目。报幕人竟是陈立家。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陈立家的随和作风。那些充满世俗之见的人大概会认为，以总公司副总裁之尊，担任报幕工作，有失身份吧？陈立家在报节目时，用流畅的英语对节目的背景作一些扼要的介绍，更增加了晚会的欢乐气氛。

陈立家忙得不可开交，但仍然抽出两个上午，单独会见了我和他，谈了他的身世、经历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他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多才、平易近人、豪放坦率。“根据你的经历，用中国的术语来说，算是一位技工贸结合的企业家了。”我试图给陈先生戴顶“帽子”。他大笑起来：“算不上企业家，只能说是打杂的，我刚刚接触国际贸易时，心无点墨。我这个人倒是什么都爱学。”

1990 年 12 月 10 日，92 岁高龄的哈默博士病故，中国领导人深表哀悼，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在联名唁电中说：“哈默博士是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他生前曾多次访华，为推动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这方面，长期帮助哈默开展对华业务的陈立家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哈默博士虽然离开我们，但他播种的友谊和合作的种子，一定会在他的继承人和陈立家先生等人的努力下，继续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晓渡）



· 古今谈 ·

今日中国，人口大爆炸！但是，当我们追念具有远见卓识的马寅初教授时，倘把目光穿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尘埃，则不难发现，尚有先哲足为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先驱先导。虽然他们的观点理论也只是我国人口思想荒漠上的几声孤鸣，他们的论述一直罕为人知，就立言而无闻来说，他们的遭际实为一种大不幸。无论于他们个人，抑或于亿万国人……

# 人口忧思百年录

唐文权



1

马尔萨斯 (1766—1834) 在其 18 世纪末发表的《人口论》中, 揭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存在不协调的情况, 并提出了减少人口使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种种办法。这就是问世之后褒贬不一聚讼纷纭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事实上, 出生在他前后的几位中国思想家, 根据中国国情, 也分别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清代思想家洪亮吉 (1746—1809) 继承并发展了明末徐光启关于人口在 20 至 30 年中可增加一倍, 而耕地和粮食等的增长却没有那样快的观点。这一观点, 较之马尔萨斯提出的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长而人口按等比数列增长的著名论断, 还要早 5 年。洪亮吉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人民贫困失业、社会动乱不安和人口质量下降等严重后果。而减轻人口压力的办法则有二: 一曰“天地调剂法”, 即因水旱灾害和疾疫流行来减少人口; 二曰“君相调剂法”, 即因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赋税、抑制兼并和反对奢靡等来增加生活资料。上述办法, 既有部分内容与马尔萨斯所见略同, 而注重人道关心民胞之意淳淳于言表, 又非马尔萨斯所能及。

随后, 继承并发展洪氏人口思想的是汪士铎 (1814—1899)。汪氏在 19 世纪 50 年代所写的《乙丙日记》中, 留有较多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 是近代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问题上, 在人口增长过快的严重后果问题上, 该书一秉洪氏所言。而在控制人口问题上, 该书又多有发展。汪氏主张大量减少人口, “使减其民十之七、八”, 其办法则有: 采用严刑峻法, “大量消灭有害现行社会秩序者; 加重多子女的赋税, 一对夫妇只准生两男一女, 有超生者则倍其赋”; 主张推广溺女婴溺男婴, 因“女多, 故生人多”, 而眉目不清秀体形不端庄的劣婴则有害于人口素质; 提倡独身主义, 严格限制婚配, 主张广设童贞女院、清节堂, 奖励出家为僧尼, 严控嫖夫、寡妇再婚; 推行晚婚, 主张女子 25 岁而

嫁, 男子 30 岁而娶, 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主张采用药品避孕, “广施不生育之方药”, 以及各种断胎冷药。

汪士铎相当完整的人口思想理论, 以及他那苛近严酷的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 与马尔萨斯有更多接近之处, 多有偏颇, 使他足以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2

进入 20 世纪后, 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具有独到见解的是一代奇才梁启超 (1873—1929)。

他发表于 1902 年的《禁早婚议》, 突破了戊戌思想界较为空泛的“强种”宣传, 反对早婚, 力主提高人口质量, 可视为本世纪开幕第一篇优秀的人口问题专论。文章认为, 人口质量的高低与人们婚姻的迟早有密切联系。“凡愈野蛮之人, 其婚姻愈早, 愈文明之人, 其婚姻愈迟”。文章力陈早婚之害有五:

一曰有害于养生。少年男女, 身心皆未成熟, 自制能力差, 感情容易冲动。早婚之后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 而给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危害。故早婚犹如一柄“自杀之利刃”, 戕害人生, “一人如是, 则为废国”。

二曰有害于传种。稚弱的父母难以诞育宁馨佳儿, “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钝者、犯罪者, 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大多数”。如不变更早婚陋习, 必将出现“子弱于父”和“孙又弱于子”的逐代退化状况, 祸种亡国之害, 莫此为大。

三曰有害于养蒙。早婚者通常缺乏教养子女的能力。他们无论在学识上阅历上, 都不足为后辈之模范。而幼儿时期父母的启蒙教养, 对于子女今后的成长关系极大。所以, 为提高国民素质, 就必须严禁早婚, “不禁早婚, 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曰有害于修学。人生最佳的修学年龄, 在一、二十岁时。早婚则将浪费人生的黄金时代, “投诸春花秋月, 缠绵歌泣”, 消磨“风云进取之气”, 徒然造成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劣于他人的严重后果。

五曰有害于国计。早婚者通常未具治生能力, 其本身方仰食于父母, 不但无力养妻, 还会增添许多孩子, 从

而加重社会负担, 平添许多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非生产者, 给国计民生带来不利。

梁氏所言, 多为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 已经很具有现代意识。他所阐述的基本精神, 即在今天的晚婚宣传中, 也并未过时, 尚有可资采取之处。

3

因主张严控人口而被扣上“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帽子者, 人们通常唯马 (寅初) 首是瞻。其实, 在此之前, 与马寅初先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早在 30 年代便因倡导人口统制论, 而有幸先行戴上这顶由荆棘编成的冠冕了。

1931 年春, 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篇论文, 旗帜鲜明地把“少生小孩子”和“教人少生小孩子”, 分别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的三大出路之首位。

文章尖锐揭露多生之害, 批评中国农民同时崇拜送子观音和土地菩萨的传统观念。他们一方面希望多生儿子, 一方面又要保存固有的土地不被分散。结果却因子女越多, 土地越加分散, 他们的命运不能不受制于其子女和土地的数目。在人口重负下, 加上各种灾害, 土豪劣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 中国农村的沉沦崩溃便如江河日下, 格外进行得快。

文章根据中国总耕地、总人口以及由人均耕地数所规定了生活状况, 依次为中国教育划分五个台阶: 一、创造线, 二、教育线 (普及初等教育), 三、缺衣线, 四、缺食线, 五、大乱线。文章认为, 国人唯有厉行少生主义, 才能从当前的大乱线退回到教育线和创造线, 求得中国教育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文章鼓吹中国“人口总退却”, 为达此目标, 他为教育制定了七项任务:

一, 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 发一人口总退却之紧急命令, 教男子满 25, 女子满 20 岁始结婚, 结婚后服务 5 年, 可生第一子, 俟第一子入小学, 可生第二子。以二子为限。子为男子女子之通称。一胎生二子或三子者, 以一胎为是。

二, 中央研究院在开创时期之内

第一重要工作是，设避孕研究所，要发明一个铜子的避孕法，使全民族都能够得上实行。三，避孕之普遍的宣传，应成为民众教育最大之职责。医院及注册的医生，对于国民避孕之询问，应免费指导。

四，宣传结婚前配偶之科学的选择，以为改良人种之准备。

五，女子常以多生为苦，必赞成这种合理之主张，那最大之阻碍，便是男子之性欲。故一方面由教育劝导，一方面用法律限制。生孩多于二人，宜处男子以危害民国之罪。

六，宣传科学上男女有同等之遗传力，故有女即有后。

七，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组织一永久人口升降委员会，随时调查耕种土地面积之消长，生产技术之进退，生活程度之高下，容纳人口出路之多少，以改定人口升降之比例，公布全国，共同遵守。

视野开阔的陶行知还认为，控制人口不只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急问题。他强烈呼吁当时还未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国际社会，对经济失控和人口失控并加深刻检讨，努力纠正物品和小孩的无政府过剩生产，使物品和小孩的增长共同归纳在一个“和谐的系统”之中，由此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世界。他把经济和人口的失控列为导致战争的两大祸源，是非常有见地的。既然解决经济和人口失控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梦魂萦迴百计探求乞无最佳方案的课题，并且在今后漫长世代中人类仍将继续寻找反复论辩，那么，陶行知在30年代即把教育、人口、经济等问题同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疑表现了一位关心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大教育家的忧患深思，反映了他合国情与世情于一体的圆融开广。

#### 4

以上几位思想家的人口理论，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有关控制人口的一条基本链节。

洪、汪之俦，当属封建营垒中人，梁启超则为冲击这一旧垒的新兴阶层的思想代表，而30年代初的陶行知已开始迎受与梁氏所属阶级相对立更先

进的思想理论了。尽管他们阶级不同，地位不同，经历不同，学养不同，却又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呼号国人严控人口，不消说，他们的理论并非完美无缺，科学与非科学并存，合理与非合理合体。但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良传统，本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清醒的目光洞及当前察及未来，为子孙后代祛灾禱福，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行进过程中，他们的呼号实在太微弱了。在救亡御侮和阶级斗争两大主题之下，各种主义，各种口号，各种运动，各种事变，纷沓汹涌而来，震耳如雷。夺权，固位，革故，鼎新，安内，攘外，整军，经武，临民，治吏，征赋，救灾……它们无一不是军国大事，无一不待紧急优先处理。与之相较，百姓万民的男婚女嫁和添丁进口，在经天纬地的袞袞诸公眼中，那真是微不足道的民间芥末之事。他们或无意为之，或无暇为之，或罔屑为之。如此日积月累，司其“大”而不司其“小”，顾其“首”而不顾其“尾”，百年因循，蓦然回首，终于发现“小”事不小，竟然“尾”大不掉。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行进过程中，他们的呼号与当政者所思格格难入。且不说他们的意见与主张“广土众民”的君相相悖，就与辛亥以后革命领袖的权威言论也大相径庭。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奇功伟助已有定论，但在人口问题上，他却坚决反对减少人口的。在逝世前所作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这一重要论著中他强调列强所以一时未能吞并中国，就在于他们人口较少，中国为避免亡国灭种，就必须增加人口与之抗衡。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人多好办事”、“人多热情高”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他们共同把国力国势的强弱同人口的多寡等比起来了。

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道。当世人忧念前程之时，重聆上述诸多被长期掩盖了的有关控制人口的智者的呼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异于一颗酸涩却又利津的刺莓吧？

（责任编辑：晓渡）

（上接96页）后与肃顺集团的争权斗争时起时伏。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她不甘心大权旁落充当傀儡。另外，有材料说，肃顺曾建议咸丰帝将那拉氏除掉，仅留其子继信，慈禧听说后对肃顺恨之入骨。慈安虽性情温和无意揽权，但对肃顺等人目中无人，行为跋扈的举措也颇为不满，在慈禧策动下，同意撤倒肃顺，两人常“俯缸而语，计议甚密”。这样在打倒肃顺集团的问题上，两太后与奕訢集团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互通信息，密谋策划。

9月5日，奕訢以“叩谒梓宫”名义来到热河。当日，两太后召见奕訢。肃顺本欲阻止他们见面，但见奕訢神态自若，并主张邀请顾命大臣一道入宫，遂放松了警惕，笑曰“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奕訢正好单独进宫，低声密语，与两太后商定了在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9月中旬，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听政，并派亲王辅政，正中两太后下怀。但廷议时，肃顺等坚决反对，声称“臣等系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气得太后“手战不已”。随后，肃顺等拟旨痛斥董折。旨稿呈进后，两太后拒绝钤印。八大臣遂以“擱车”（停止办公）相威胁。两太后无奈，只好妥协。肃顺等见如此轻易地制服了两太后，十分得意，开情大笑。从此，他们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对政变阴谋毫无觉察，以致将禁军兵权拱手交出。

10月26日，两太后目送咸丰帝梓宫上路后，即偕载淳间道而行，于11月1日赶赴北京。他们见奕訢在京已布置妥贴，即于次日发动政变，将随同来京的载垣、端华逮交宗人府圈押。当晚，肃顺扈从梓宫至密云。半夜，捕者破门而入，肃顺束手被擒，他虽“咆哮骂詈”不止，已无济于事。

11月8日，肃顺身着白袍布靴被“反接置牛车上”押赴刑场，其昔日仇人拍手称快，“纷纷载酒驰车赴西市观之”，并向肃顺投掷砖瓦泥块，至其面目模糊不可辨认。肃顺对遭那拉氏、奕訢等暗算又恨又悔，临刑时破口大骂，拒绝下跪，刽子手乃以“大铁柄”猛敲，肃顺的两胫被砸断，始倒地受刑。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副主任）



一位鼻梁挺耸得有些高傲、眼睛深凹得有些忧伤、浓密的黑发卷曲得使人心醉的男士；一位经常是妙语如珠、幽默得令人忍俊不禁、曲终人散仍使人百般思索的艺术明星，他总是步履匆匆，从北京到长白山，到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东南亚……他又常常来到我们中间——在各大体育场、在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光屏上……

从外在形象看，他献给我们的似乎应是意大利歌剧、欧洲芭蕾或北美摇滚；待到他一张口，却是纯正的京腔京白、源远流长的中国相声——植根于几千年东方热土的东方文化。外在与内在的反差，典型的西方人长相却酿造着迷人的东方艺术，这就是著名笑星李金斗。他自1979年初在首都舞台上爆红之后，曾连续摘取1986、1987年全国曲艺大奖赛第一名、1988年全国相声邀请赛第一名的桂冠，接着，又获取1989年禹王亭杯笑星金奖和1990年铜陵杯奖。1987年底，李金斗应邀去新加坡旅演，又引起轰动。《联合早报》等新加坡七、八家报纸连篇累牍评介李金斗的相声艺术；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部长握着他的手说：“非常高兴你给我们送来了精湛的中国相声艺术。从这儿，我们寻到了东方文化的源，找到了相声艺术的根。”

## 家世——扑朔迷离

1947年10月，尽管时序已经轮回到萧瑟清秋，可在北京，这却仍是个最繁盛最迷人的季节。金风送爽，无遮无拦，一直吹进崇文门苏州胡同下

笑

星

李

金

斗

李  
硕  
儒

坡12号这座肃穆典雅的四合院里。不知是金风伴着那个男婴的啼哭，还是男婴的哭声催动了秋风缕缕，在这个四合院里，一位高鼻大眼的男婴出世了。或许因为他出世前外婆就曾想到夺他出生的权利，或许他有意用他洪亮的哭声倾诉他的不平宣告他的胜利，反正他一坠地就总是哭啼不止。

“……不哭不哭，妈的小乖乖……妈这就喂你……”母亲亲他哄他，眼睛汪出了泪，因为他的声音、相貌、脾气都酷似父亲，要是父亲也在身边，他会多高兴……母亲想象着叹息着。可惜……

母亲长长地叹息一声，这或许能叹出她的悔恨她的疼痛她的思念……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生的，她不记得自己的生身父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她只知道这个典雅阔绰的四合院就是自己的家，这个家的主人叫李宝臣。她的父母很富有，待她如掌上明珠，他们给她最好的吃穿最好的教育，所以她能读完大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风度好相貌好学问好的富家小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那如花的季节，不知有多少风雅少年向她求婚献媚，可她一

一谢绝，却选择了那位潇洒风趣的异国青年。他们情深意笃，婚后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老大金生，生于1945年；老二金斗，还没出世，父亲就衔命返国了……

母亲又是一声长叹：“哎，悔不该……”

……行前，他曾苦苦哀求，希望她带着老大和尚未出生的老二与他同往他的祖国。可从未同意从未认可过这个女婿的外婆，当初女儿嫁时她已经悔之莫及，如今怎么会放她漂洋过海流落异邦？她殚思竭虑，最后还是送送到塘沽港，与丈夫相期尽快返回后洒泪而别……

从1947年到1952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闪，可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出现了一个真正划时代的变化。五年中，父亲按月给他们母子寄钱，信上一再说“归期在即”，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父亲不能再回来，母亲也再不敢接受父亲的汇款了。先时，母亲做翻译，当管家，维持家计；后因耐不住对丈夫的苦苦思念，又因大儿子金生突然亡故，她悲苦交加染上肺病……

## 从艺——阴错阳差

那是1955年旧历腊月23日。

“……金生，妈……来了……妈……就……来……”奄奄一息的母亲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往日的雅丽往日的挺耸，已变成一具佝偻的干柴……她断续地吃力地说着胡话，声音干涸得像一片荒原。

“妈妈，妈，您别睡了，看看我……”6岁的小金斗蜷缩在母亲的床边，他没见死亡，他不知道死是什么，他只知道哭喊着要母亲醒醒，他渴望母亲温柔的手再摸摸他，他渴望母亲温存的臂再拥他，他渴望……

许是他的哭喊，许是母子间最后留恋，母亲的眼帘不再沉重，它亮了一下：“……斗儿……你哥……叫我……来……了，我要去了……妈最……不放心的……是你……因为姥姥……不是你……亲……姥姥……你要爱……护自……己，要……争……气……”

少年丧母本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何况金斗这个特定的身世！他一来

这个世界就瞪着那双注满了疑问而多思的大眼，他注意到周围的小朋友们都有温柔的妈妈，也都有慈爱的爸爸，唯独他从没见过爸爸。他问过妈妈，妈妈给了他一个满意的回答。久了，他从妈妈身上感到了双倍的温柔与慈爱，他稚嫩的心灵也就得到了平衡。如今妈妈去了他才意识到，他没有了妈妈也没有了爸爸……不知是因为他心里注入了太多的悲哀和酸苦，还是因为他幼小的心智已经学会了思考人生，他那双幽深的大眼睛爬上了荫翳，他那刚硬的嘴角绷得更紧了。他经常独坐一个角落整天不说一句话……

……光阴荏苒，金斗已经上小学了。他所在的苏州小学历来以文体活动见长，孩子们放学后就把狭窄的苏州胡同变成他们的足球场。

小男孩是最不安份的。一天，小足球队的队长孙殿华神秘兮兮地把金斗叫到一边：

“哎，我写了一段相声。”

“你还能写相声？”金斗有些不屑。

“不信？你看！”

“看就看！”金斗倏地抓过来，他一边看一边抓脑袋，“嘿，孙殿华，你写得还真不赖呢！”

“甭夸，你要说好咱就演，我甲你乙，怎么样？”

“演就演！”金斗才不愿服输。

这年的“六·一”儿童节，13岁的李金斗与孙殿华在大华电影院第一次登台，也第一次获得演出成功。孙殿华被燃起的热情愈发高涨，一天，他拉住了金斗：

“喂，听说北京曲艺团要招考少年班，咱们去试试怎么样？”

“去考少年班？不上学了？”

“搞艺术嘛，那儿也要学习。”

“……我没想过……”金斗困惑地眨着大眼睛，“再说，也没跟姥爷姥姥商量……”

“嗨，先试试去，还兴考不上呢！”

反正是陪同学，无所谓，精神自然不紧张，对姥爷姥姥也不必去说。发榜了，孙殿华一看，大名赫赫，上写李金斗，却没孙殿华。孙殿华风风火火找到李金斗：“我甲你乙，怎么会有你没我呢？”

“你去看榜了？”金斗也愣了。

“我看了三遍，就是有你没我……”孙殿华确信自己的眼睛却不信

这是事实，“会不会弄错了？……你陪我去团里看看，帮我说说，行吗？”

两个小伙伴如风如火到曲艺团，回答是“没错儿。”于是两个人只好轮番陈述情况轮番提出请求……团里最后答应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准许参加复试。没想到，发最后录取通知书时，还是只有李金斗，没有孙殿华！

怎么办？小金斗急急回家，去向姥爷姥姥说明情况。

姥爷尚未说话，姥姥已经用鄙夷的目光鄙夷的声音发了话：“这还用问，你不想想我是什么样的门第，什么样的教育？！”

“别人考还考不取呢……”话说出口，金斗自己也觉得缺少说服力。

“考不取又怎么样？想一辈子去说相声，亏你想得出！你想想，要是我答应了，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吗？”

“我妈要活着也不一定不同意……”姥姥的反对反而激起他的决心。不知是因决心的被阻还是对生母的怀恋，说到这儿，金斗竟少有地流下了伤心的泪。

“那好啊，”看着他哭，姥姥的心疼了一下，可口气却更加鄙薄而冷漠，“问你妈去！死了没法问，就去问你干妈。”

金斗的确有一位干妈。她天生丽质，性情温柔，是母亲的同窗好友。可惜一生无子，常常为此垂泪。为安慰她，金斗刚刚落地，母亲即许金斗为她的义子。十多年来，干妈对金斗从来温存呵护视做己出，母亲咽气前也就哀哀向义姊托孤；义姊拥紧母亲让她放心：“我把斗子带走，把他带走……”后来，是因为干妈怕姥爷姥姥不舍，才一直把金斗留在姥爷家，但每个周末她是一定要接金斗来家，直到下个星期一从她家上学时金斗才离开干妈家。

金斗真的跑到干妈家，两眼喷着求助的火企求干妈答应。可一位老大学毕业生怎么肯答应自己的义子去说相声？平生第一次，金斗启动了自己幽默的智慧，回到姥爷家就维妙维肖地说干妈如何高兴如何同意，姥爷姥姥无话可说，只好默许了他的要求，于60年8月29日，金斗最后一个去北京市曲艺团学员班报到入学。

## 第一次成功与第一次危机

曲艺，作为明末清初的宫廷艺术是有其丰饶的东方文化底蕴的。北京曲艺团做为集各方各派曲艺大师传人之萃的专业团体更有一种独特的东方艺术氛围。李金斗这位具有西方血统又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家庭中长大的少年，进入这个东方大观园内，有时感觉很不习惯，有时又被这种浓郁的艺术氛围人情氛围熏染得沉沉欲醉。他得天独厚，一进团就遇到两位艺术与学问俱佳的好老师。他们一位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友，一位是相声教育家谭伯儒。

谭伯儒在教传统相声《八扇屏》时谆谆教导他说：“幼儿倒有浮球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这里，谭先生讲了这个段子的题旨要义，又何尝不是讲的从艺之诀做人之道？

### 王长友先生则勉励他要刻苦钻研。

自母亲去世到进入曲艺团，金斗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奋斗，替妈妈争气。听着两位先生的讲授，他一下子茅塞顿开，也一下子走进驰骋抱负实现决心的广袤天地，短短三个月中，他学了不少说、学、逗、唱的基本功，学了好几个精彩扎实的相声段子。这年的12月26日，曲艺团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演出时，他同王文友的一段《打灯迷》首战告捷，轰动了首都舆论界。第二天，《北京日报》就以《童声博众彩》为题，评介了十二岁童星李金斗的精彩表演，31日晚，他又被邀参加了人大大会堂的春节联欢会。演出结束时，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特意来到桌前同他碰杯，金斗惊呆了迷醉了懵懂了，过早的成功超出了他的心理准备与阅历准备。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半以后，正当这颗艺术新星冉冉升起的时候，却遭到了意外的噩运——一天晚上，依旧是轰鸣的掌声迎他出场，依旧是羡慕的目光听他说艺，他却越说嗓子越哑，越哑心缩得越紧，最后把要说的词儿也忘了。尽管观众的宽容并没喝倒彩，可待他退到后台时还是几乎急出了眼泪。

王先生把他叫到面前，沉吟很久才说：“别急，你这是到了青春期，嗓子在变声，脸长壮疙瘩，小人出现了大架子。以后要少演多练，早晨早起，夜里睡觉侧着身……”

谭先生又讲了一遍“幼儿倒有浮球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的道理。

他珍惜王、谭两先生的教诲，更珍惜他刚刚走进又时时都可能关闭了的艺术天地，他思考了一夜规划了一夜，一夜的苦思苦想似乎使他一下子长大了。刚入曲艺团的学员当时每月只发16元的生活费，又逢三年自然灾害，他哪里有钱买票乘公共汽车！为了艺术生命不致夭折，他从第二天起，每天早五点即起床上路，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北京曲艺团原址）徒步走到故宫护城河边，对着故宫后墙喊嗓子。许是因为它的高墙古木，许是因为它的森严肃穆，更许是因为那绕城而流的幽深清澈的护城河水及其古城河水结构出的古雅空阔，不期然地，这原先的宫闱禁地竟约定俗成地成了演艺界每天凌晨练功练声的场所。第一天，金斗就遇到了武功老师于世澄，接着，又遇到了当年风华正茂如今成为京剧著名老生的冯至孝。金斗笑了，原来这护城河边竟是人才聚集、汇集八方“诸侯”的文武“校场”。于是，他练完自己的功课，就限于先生练武功，练完武功，又向冯至孝学京剧。于先生素爱京剧，每晚都去看戏。金斗既因倒嗓辍演，也就每晚紧跟其后步入剧场。就这样，“晨练晚看”直至三冬两夏，金斗倒嗓的危机日渐缓解，对京剧艺术的唱、做、念、打也深谙其道。艺术是相通的，金斗的相声艺术所以底蕴独具，焉知不是这两年修炼的结果！

### 师傅就是师父，何况师爷……

三年困难时期。高薪阶层的王长友先生注意到每天早晨金斗练功回来，捧着食堂规定给他的那二两稀粥喝汤丝丝响，他从来不用筷子，总是用舌尖把粥碗舔个精光锃亮……看着他这样子，老先生叹息了一声：“唉，人是铁，饭是钢，这孩子要是天天吃不饱，甭说练功学艺，怕是连个子也

长不起来呢……”

一天早饭后，王先生把金斗叫到他面前，桌子上摆着刚出锅的三个焦圈一个油饼两杯沏好的茉莉花茶。看着那焦黄松脆的焦圈油饼，金斗扭开自己的眼睛，尽量视而不见，可那一股股沁人心脾的香气还是诱惑得他暗暗咽了口唾液。

“扭过脸去干吗？吃。”王先生似乎在发布命令。

“我刚吃饱，师爷。您吃您的……”

“我一个老头子能吃那么多！就是算着你那份，才买了这么多。”

“……我，”金斗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您老了，我不能从您嘴里夺食啊……”

“可你还小，正长身体，还要学习，不吃饱行吗？”

十分普通的大实话，可在那特定的年代里竟使一向倔犟能忍的小金斗擦起了眼泪。

“……要是你父母还在，掏牙缝也要让你吃饱……”老人也说不下去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沉吟着：“师傅师父何况师爷……饭，我要让你吃饱；艺，你可不能偷懒……”

此后，金斗每天早晨喝光那二两稀粥，师徒俩就再吃一次那固定份额的焦圈和油饼，每隔一段时间，王先生还把金斗请到家里有鱼有肉地让他饱餐一顿。“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金斗能够吃饱，师爷教起来认真，徒弟学起来刻苦，这期间，王先生不但一丝不苟地教他说、学、逗、唱等一整套基本功，还教会他《文章会》、《卖布头》、《扒马褂》、《新药方》、《戏迷药方》、《汾河湾》、《黄鹤楼》等几十个传统名段。

转眼到了谁也不会忘记的那个年代。

王先生悄悄对金斗说：“都闹你别闹，”话说了半截又打住了。老先生沉吟着，似乎心情十分沉重，又似乎是已经看破了一切，他微眯着眼说，“反正是不上班了，以后每天到我家，每天我给你说三个段子。”

当时，阅历不深的金斗并不了解师爷心底里那些深邃的活动，不了解师爷是要以他为传人为载体，决心要在乱世之中抢救我们的相声文化以献民族以献后人。他只在潜意识中坚信

师爷的话不会错，师爷是要给他吃偏食，师爷的话他要不折不扣地去听去做。他衷心执行着师爷的嘱咐，师爷也无私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在那个疯狂的以破坏一切为荣的年代，这师徒俩竟构筑了一座宁和的传授与吸吮相声文化的艺术大厦，在那个砸烂一切油煎权威艺术的旷野，师徒俩竟修建了一块师爱徒、徒尊师的绿色田园。王先生日夜搜寻记忆，日日悉心传授，决不允许一字一句的差错。一次，老先生给金斗录制了一段《牛头教》，叫他回去先复习，金斗刚刚回到宿舍，老先生发觉自己录音时丢了一句，他踉踉跄跄跑到金斗宿舍说：“唉，真是人老了，这录音竟丢了一句……”脸上颇有愧色。

“瞎，我明天就去您家，您还跑这么远干吗……”金斗不忍老人的辛苦。

“不不，这可不能马虎。万一你背熟了，我再加一句，以后你会说到这儿就打奔儿……”

正当师徒俩在相声艺术的园地里苦苦耕耘时，王老先生的老伴突然离世，金斗跑前跑后，总算替师爷办完了后事，他怕师爷老境孤独，每天接老先生来自家。老先生最爱吃炒肝儿，金斗总是端着炒肝轻轻地送到师爷面前。直到半年后老先生又续了弦，金斗才放下心来。

然而好景不长，老先生突然大出血，金斗立即把他送到301医院，经检查，老人的癌瘤已呈菜花状。这突

然的噩耗使金斗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伤痛，他着实流了一番泪后才来到师爷面前，他想用轻松的微笑开解师爷倒悬的心，然而，他真诚得有些愚钝，善良得有些笨拙，对师爷的爱心使他做不出半点表演，一切幽默智慧演技都被心底的悲痛打个七零八落……

“……大夫怎么说？”师爷盯着看他。

“……大夫说……没什么大病……”金斗躲闪着师爷的目光。

“哈……”师爷倒朗声笑起来，“斗子，你还是不了解师爷，师爷不怕死。”老先生又盯着着他。

“……既然您什么都知道了，我就直说吧，可您得挺住。”金斗浑身颤栗，一双大眼定定地看着师爷。

“人生不过是一次旅行，路走完了，旅行也就该结束了……说吧，师爷挺得住。”老先生出奇的恬淡也使金斗平静了些。

“大夫问动不动手术？说如果动手术可能活五年；要是不动，也就三年……”

“你说呢？……”老先生看似平静，内心也不免掀起阵阵狂澜，他征询着徒弟的意见。

金斗一阵旋迷，他多希望师爷能够长命百岁，伴他始终；可这生死大事他能做主吗？

“还是您自己拿主意……”

“那，咱们回家。”老先生从椅子

上站起来，步履依旧那样轻捷，“我情愿活三年。”

1984年10月2月晚上，举国欢庆共和国35岁生日，重登舞台的金斗也以焕发了的艺术青春投入这喜庆的狂潮。他正在前台演出，后台的电话铃却嘶声嚎叫起来，待他赶到师爷家里，老先生已经命若游丝了。金斗死死拉着师爷的手，那手上的微温还在传递着老人对他的深情眷恋深挚关切和最后的嘱托……半晌，老先生艰难地睁开眼，他想笑笑，但已不可能了，他翕动着干裂的唇，喃喃着：

“……我……对不起……你……段子……还没……教……完……”

“……不，师爷……您……教我太多太多了……”金斗泣泣着。

“……我更……对不起……你后……奶奶……什么也……没……给她……留……只给她……录了……三十……段……相声……”老人说得十分费力，干涸的眼睛浸着些许潮湿。

“师爷，您，还有什么话要说？”金斗急叫着。

老人又抬起沉重的眼睑，“……我死……后……你挑……一只活……蝻蝻……放在我……棺材……旁……”

金斗突然从悲痛中清醒过来，他不能眼睁睁让师爷离世，他要尽全力留住这慈祥的老人，哪管是一分钟一秒种。他霍地跑到院子里，从邻居家借了一辆平板三轮，把师爷抬到车上就蹬起来疯跑！他边蹬车边回过头来恳求：“师爷，您挺住啊——”他眼睛冒火，脚下紧蹬，直奔友谊医院直奔急救室，可到了那里，他慈祥的师爷、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已经溘然长逝，时间是1984年10月3日凌晨一点钟。

金斗深知师爷的嗜好——一生爱养蝻蝻。他说，蝻蝻最勤奋，有耐力，富于战斗性，且不平则鸣，叫起来悦耳而有警策力，直到离世，他还留下了经过无数次的争战筛选出的最有生命力的几十只大蝻蝻。金斗选了一只师爷生前不止赞美过一次的大蝻蝻，叩头长跪后，把它埋进师爷的墓地。

## 悠长的小夜曲

任何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男人，任何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可爱的女人。金斗从学





艺到成功，无论他失意还是得意，坎坷还是通达，逆境还是顺境，都有一双眼睛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观注着他。

他们是曲艺团学员班的同学，他学相声，她学单弦。

“你为什么学单弦？”

“我们家是旗人。”

“旗人怎么了？”那双深湛的大眼睛十分困惑。

“……”那双细长的凤眼笑成一弯眉月。

“说呀。”他有些急迫。

“这都不懂？”她觑了他一眼，眼神又倏地张开，“我问你，我们演唱的时候，用什么伴奏？”

“三弦和八角鼓呗。”

“八角鼓代表什么？”

“……”金斗眨着眼，摇摇头。

“八角鼓的八个角代表八旗，鼓上的红穗和蓝穗代表黄旗和蓝旗。爸爸说，古时候祖宗打了胜仗回来，就敲起八角鼓弹起三弦琴载歌载舞地慰问祝贺……”

“噢，原来你是为纪念祖宗。”他大惑初解。

“……也不是，”她沉吟着，“可能因为我生父一生喜欢单弦，街坊胡宝钧又弹了一手好三弦，所以我一懂事就爱上了单弦……”

他点点头。她以为说明白了自己的初衷，他也以为听懂了她选择专业的考虑，到底说明多少明白多少谁也不去管它，反正金斗在相声艺术精进的同时，这女孩张蕴华也成了单弦演唱的佼佼者。他们成年累月地学习在一起演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可能因

为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风气，可能因为彼此性格素质的障碍，也可能因为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羞涩与暧昧，自那次谈话之后，两个人却很少对话很少对视，有时甚至走到一起也会交臂而过……不管如何封闭如何禁欲，这所曲艺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也难免互相吸引互相追逐，像是心有灵犀，像是山盟犹在，两个人的心里谁也没为别人留出空位。1966年仲春，他们去山东潍坊旅演。革命化的年代打破一切分工，装台卸台也是大家一起上。金斗年轻体壮，蹦蹦跳跳率先登上剧场屋顶，他拉起电线正要组结，一个闪失就从屋顶摔到剧场的折叠椅上，他脊骨骨折，当即被送往医院。消息传来，性情内向的蕴华迷乱了晕旋了，脑子里翻江倒海波起浪涌，现在她才确认她其实早已把自己和他紧紧捆在一起了……人那么多，嘴那么杂，她不能为他喂一口水，她不能为他拭拭伤口，她也不能单独去医院看看他陪陪他，她五内俱焚，只好躲在宿舍里想了一夜哭了一夜……历时一周的演出结束了，蕴华将随大队人马奔赴别的城市，想想住在医院里的孤独伤残的金斗，她再也顾不得其他，趁别人午休的时候，她悄悄来到病床前：

他脸色苍白，笑望着她，让她坐在床边。

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一串串清泪一声声泣饮，什么也说不出口。

他拉起她的手，把自己的手表和钢笔交她保存。

她把小说《艳阳天》留给他，说：“别急，听医生的……”

他更紧地握着她的手说：“就要好

了，别惦记……”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更亲近更浪漫的举动和言语，两颗心已经跳在一起……

或许是爱神的无形魔力，或许是金斗肌体中健康的因子，倍大倍重的摔伤没用两个月的治疗休养就痊愈回京了。久别重聚，情人间有多少话要说多少情要叙，然而回到曲艺团大院后，他们的恋爱又回到了那个特定的轨道，总是漠然地，你看我，我看看你，很少单独相会，更没有缱绻私语，表面上形同陌路，私下里却是情往书回……正当这绵绵的小夜曲动情吟唱的时候，一个恣肆疯狂的交响冲入他们爱的田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金斗的血统与形象，由于王老先生的提示，他只能表面逍遥暗里学艺；由于种种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却站在了另一派，派性的隔膜社会的偏见家庭的心态，都不能不使他们中断那爱的变奏，书信往还中断了，两人走在一起也往往掉头而去。男性的自尊自爱折磨着他，不甘受辱不甘歧视的心态激怒着他，他先引“最高指示”，后写自己不愿高攀的隐衷，通知她自愿中止彼此的情恋。蕴华读着这理智而冷静的绝情书，抑不住自己的哀声恸哭，她找到了金斗的老师赵振铎，哭诉了他们间的前前后后，赵先生叫来了金斗弄清原委，当即以金斗家长（此时金斗已无家长）的身份去张家求婚。看着女儿的决心，看着金斗的执著，看着赵先生的盛情，蕴华的父母屏弃了对金斗出身与专业的偏见，慨然答应了这桩婚事。如今，他们那位聪颖懂事的独子已经十七岁，金斗在相声园地里开拓，蕴华则在单弦沃野里耕耘……

古人说：艺无定法。人世间的的人和事又岂有定则定法？谁能想到，李金斗这位有着西方血统西方相貌的笑星，其事业其修养其师长其家庭却到处弥漫着典型淳厚的东方氛围东方文化东方气息？俄罗斯的一位伟大作家说：“幽默是自信的表现。”中国当代青年说：“有了幽默就能走遍天下。”但愿金斗带着他的智慧与自信，带着丰厚的东方文化走遍天下。

（责任编辑：晓渡）



# 无悔的爱

——农业科学家邓景扬的人生与爱情

姜冰冰

1990年7月27日在科技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瑞士劳力士雄才伟略金奖国际评审委员会、劳力士钟表集团的特派代表亨利·卡什先生风尘仆仆地从日内瓦湖畔来到北京，面带微笑地将那个沉甸甸的麂皮盒子递给邓景扬并将奖状授予他的时候，授奖大厅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项在声誉上堪与诺贝尔奖匹敌的劳力士雄才伟略大奖，创立于劳力士蚝式表发明50周年的1976年，1978年首次颁奖，每3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奖励世界上为人类做出贡献、具有雄才伟略的进取精神和坚强毅力的杰出人物。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给他和夫人黄泳沂的贺信中写道：“我为你们在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重大学成就和由此而获得的国际性殊荣表示衷心祝贺和感谢，你们是当之无愧的。我承认，前几年，在‘转韵’开始阶段，人们对基础研究有所薄待，故有曲折辛酸。然而，你们坚持不懈，不为时风所动，终于做出了划时代贡献，是为中国科技界之光荣。”

读着这封信，他们不禁想起创业的艰辛、人生的沧桑，同时更感到责任和使命。

## 同根情深

远在18世纪，邓景扬和夫人黄泳沂的先辈就迁居在越南西贡谋生。景扬的父亲经营了一片丝绸店。16岁那年，父亲去世，他独自挑起了养家的重负。景扬生性勤勉，几年之后，那月仅为谋生的小店已欣欣向荣，甚至在国外开设了分店。母亲也为他娶了一位贤淑的妻子。



一切都似乎呈现出幸福美满的景象，然而景扬怎么也不曾料到，一场更大的灾难会突然降临。

1945年，盟军与占据西贡的日本人开始交火。2月的一天，邓景扬的一家在躲避战乱途中，一枚炮弹击中了他们的小船，他的母亲、妻子、4个子女及妹妹全部罹难。只剩下邓景扬一人，幸遇好心的渔民搭救得以生还。

一个美好温馨的家一瞬间破碎了，战争，无情地摧毁了他所有的一切。一刹间，他迷惑以至恍然，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下去，他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想去追随亲人的亡灵。

当时东亚银行西贡分行行长的一家与景扬家都是基督教徒，行长夫人更是心肠慈悲。邓、黄两家本是同乡，如今同在异地，邓景扬孤身无依、痛失亲眷，激起了黄老先生一家的深切同情。黄夫人经常将自己烤制的美味可口的点心、糕饼差女儿黄泳沂给景扬送去，景扬也常来黄家作客。

泳沂是黄家的独生女儿，她娇美迷人，才华出众。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泳沂兼作中、英文翻译，她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跃分子，心地纯良，许多巨贾富商的公子都将热切的目光投向她。泳沂对这些人很友好、很友善，但却不曾将这种友谊与爱情一同联想。她年方二十有四，仍是云英未嫁。

景扬的出现，使泳沂的心思起了微妙的变化。他的深沉持重、坚韧自强和他痛失亲人的遭遇都深深打动了她。开始，两个人仅仅是凭着“上帝使大家互爱”的信条彼此关心照应，不久，另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便悄然滋生了。黄夫人也非常喜爱景扬，这位心肠慈悲的妇人曾在抗战期间救护伤员、抚恤孤儿闻名当地。那时候，每年的“七·七”，他们一家都吃素食，并通过教会捐献大量财物。对于景扬和泳沂的婚事，她几乎认为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这门亲事遇到了黄家众多亲友的反对，于是两个年轻人商定：为了不使亲友麻烦，举行婚礼后即赴国外。

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第6天，这对新人别了亲友，双双飞往异国去度蜜月，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此一去竟是永别。

在异国，两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

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尽情领略着欧洲文明的魅力。最后，他们来到瑞士。

## “中国龙”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景扬和泳沂幻想着能早日回国加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身为炎黄子孙，他们还不曾领略那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壮美的风姿。此时，景扬正在一家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为的是日后生意上的经营。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比起商业贸易，两人觉得新中国更需要一大批基础科学人才，战乱年代同胞们因饥饿而死的悲惨情景使他们毅然决定弃商学农。

但是，瑞士政府规定，农科学必须是30岁以下的未婚青年，而那时景扬早过了而立之年，这可难坏了这对年轻的夫妻。不过，没多久，景扬就有了一个好主意：转而学习遗传生理，这样将来也一样可以搞农业。

于是，1950年，景扬放弃了政治经济学业，考入著名的日内瓦大学学习植物专业。

泳沂这时候除了协助景扬做试验，还要去各处照顾生意和产业，过度的劳累奔波使她的身体变得虚弱，怀孕不久便不慎流产，而且永远失去了生育子女的机会。泳沂非常喜欢孩子，她曾经专门学习过儿童心理学，梦想过当一名幼儿教师；而景扬自从战乱时失去了4个子女后，也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慰藉失子之痛。这件事曾经使他们很是伤心，但是紧张的学业使他们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他们就自我安慰：即使有了孩子也没有精力养育。他们也随之放弃了许多爱好：摄影、登山、滑雪，他们舍不得把时间用于闲情逸志。

这对夫妇刻苦得如同上满了发条的钟，在校园里，他们引起了许多人注目，每天从实验大楼里最后走出的总是这对东方青年，于是大楼的管理人员索性把钥匙交给他们保管。

景扬的聪明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久就得到了导师F·绍达教授的赏识器重，他极其钟爱这个异国弟子，并常向同事夸赞：“中国人真聪明！”景扬和泳沂心里真是又激动又沉重，他们真怕自己不争气辜负了“中国人”这

个值得骄傲的名称。

1952年，刚刚入学两年的景扬便受聘为日内瓦大学助教，开了这座古老学府的先例，在校园里，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东方人还有另一个别具意义的称呼：中国龙。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景扬和泳沂得知消息欣喜若狂。在一个暖风徐徐的晚上，他们开车来到总理居住的地方，静坐在汽车里，深情地仰望着土坡上总理房间透出的灯光。那柔和的光辉照到他们心里是那样明亮温暖，两颗赤诚的心憧憬着日后为祖国服务的美好生活。

1959年，景扬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比正常的学制提前了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第二天正是日内瓦大学建校400周年庆典的日子，F·绍达先生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骄傲地说：“你是日内瓦大学400年里结出的最优秀的果实。”

当景扬告诉F·绍达先生准备回国的打算时，这位一向以严谨、刚正、不易动情著称的导师却禁不住老泪纵横，慈爱地说：“虽然我舍不得你们，但你们的祖国更需要你们。你们回去吧，瑞士太小了，在中国你们会有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

1960年2月，他们终于办好了一切手续准备启程。临行前，他们把房子、汽车、心爱的家俱和产业都变卖了，购买了大量仪器、资料和作物良种。

离别的那天，春寒料峭，师生在机场洒泪相别……

## 捧着一颗心来

那时，年轻的共和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严峻的考验：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外国专家撤走。景扬对泳沂说：“我们得做好吃苦的准备。”他们把国外带回的瑞士法朗以等量的人民币数额存入中国银行。不久，他们被安排到中国农业科学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工作。

十年动乱开始，他们不得不放下研究工作，与农科院的同志们一起务农。每天他们喝野菜汤吃荞麦饼，有整整8个月没见过一只鸡蛋。

1969年，他们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在远离北京的东北兴城山区，开始了地道的农民生活。

他们住在一座偏远荒凉的山上，吃水要下山去挑，清早起来便下地干农活。没有别的粮食，只有地瓜、地瓜干、地瓜加工制成的粗粉条和高粱米饭，只有病号才能吃到玉米面饼。

第二年，他们得到一些菜种，在果园里种了萝卜、大豆和小白菜。偶尔，他们也能吃到自己种的豆子磨出的豆腐。

最令他们忧心如焚的是：回国已经10年，他们还不曾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为祖国做出贡献，如果再不开始正常的研究工作，他们的一腔热望与几十年的苦苦追求就要付诸东流。此时，夫妇俩都已年过半百。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他们几乎被遗忘了，在国外的亲友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F·绍达先生的信件都被退回。

这场旷日持久的考验中，他们在默默地寻找机会。

1972年，山西省太谷县水秀公社女技术员高忠丽在麦田偶然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小麦。按通常规范，她力图为这株小麦找到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种植杂交小麦。多次试验失败使她决意寻访有识之士解开谜团。她先后走访了14个研究机构，请教了20几位专家，还是没有筛选出有完全保持能力或有完全恢复能力的品种。

1976年，这株奇特的小麦种子转到了邓景扬手中。经过3年的潜心钻研，他终于确定：这种属“无花粉型”的不育小麦其不育性受控于一个显性雄性不育基因，具有这种特性的天然突变体在小麦作物中还是第一次被发现，因而它被命名为太谷核不育小麦，显性核不育基因符号为Tail。1979年，邓景扬博士在山西及全国会议上公开宣布了鉴定结果。

60年代末，世界著名小麦专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N·E·Borlaug(波洛克)博士和大麦权威Weibe(韦伯)博士曾断言：“在现在和将来的育种计划中，利用核不育基因就可以用最廉价的代价建立起具有任何预期基因的杂交群体。”由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材料用以实现这个伟大的构想，十年

过去，这番远见卓识只能是一个理想的预言。而由高忠丽发现、邓景扬博士鉴定的世界上第一例雄性核不育小麦恰恰为这个构想提供了实现的契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世界小麦育种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

1981年，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中南海听取了邓景扬夫妇关于太谷核不育小麦鉴定结果和应用前景的汇报，欣喜地说：“这是个好东西！”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全国科研协作组。

十年磨一剑，历尽艰苦磨难的夫妇俩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们终于熬过了这段最压抑的岁月。

## 莫道桑榆晚

1980年2月至5月，邓景扬夫妇应邀赴法国、瑞士、墨西哥讲学。

阔别20年、风景如画的日内瓦依然幽静宜人，故地重游的昔日学子却已是鬓发微霜的花甲老人。在日内瓦大学，他们意外地受到了许多年青学者的热情欢迎。他们都像老相识一样与他们攀谈。在参观实验室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实验室里的许多标本、模型都是当年由邓景扬亲手制作的，这些教具为后来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提供了帮助。

讲学归来，他们继续致力于农作物基因雄性不育的研究。1984年，邓景扬和他的研究生对Tail基因进行定位，进一步确证了1979年的鉴定结论，从此，他们决定以太谷核不育小麦为起点，进一步探知生命科学的奥秘。

1984年秋，邓景扬又鉴定出中国独有的另一个珍贵核不育种质资源——光敏感核不育水稻，为新兴的边沿学科——生理遗传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这些成就不久便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短短几年中，有十几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团体要求协作。法国多次派专人找到邓景扬博士商谈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协作问题。

1988年7月，第七届国际小麦遗传学讨论会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在这五年一度的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遗传学专家交流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邓景扬夫妇的论文在会上引起了轰动，得到高度评价。会议的最后一

天，讨论商定下届会议会址。经过数番投票，中国以97对46票的绝对优势取得了举办权，会议定于1993年在北京召开。

1988年底，邓景扬当选为法国农科院外籍院士。1989年春，由法国总理签署认可，法国政府公报《宪报》发布了这一消息。

迄今为止，“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与利用”项目已由全国攻关协作组先后培育出40个优良品系，在140万亩麦田示范推广，获得近5亿元经济效益。国际小麦权威专家称赞这项研究打破了世界小麦育种近20年的徘徊局面。

1991年春，邓景扬博士又获得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的1991年“国际名人录”荣誉证书。

面对这些荣誉，他们信奉的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准则。两位老人依然是每天上午去实验室，下午在家中那间因摆放书籍过多而显得狭小的书房里分析结果。每逢播种和收割季节，他们还要去试验田验收、解决疑难，看他们旺盛的热情，全然不象古稀之年的老人。

不久前的一天，记者应邀前去拜访，谈及华东地区遭遇的特大洪灾，两位老人忧心忡忡。邓先生说，现在国家每年需用上亿元外汇进口1500万吨小麦，今年受灾，日后的情况令人担忧。他望着花瓶里插着的几颗素净的麦穗，缓缓说道：“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为小麦自给自足尽力，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在他们的卧室里，我惊奇地发现，窗台上、柜子里、沙发上、床上摆着许多绒制的动物玩具、粗粗算来，足有20余个。邓夫人指着床上四个整整齐齐排成一排的熊猫、小狗、浣熊、小猴子对我说：“他们每个都有名字，两个是我的，两个是老邓的。老邓总告诉我：‘今天熊猫盼盼又跟我聊天了’。”这时候我忽然想到：在国内，他们没有一个人。亲戚都在海外，膝下又无儿女承欢。

看着这两位乐观质朴的老人，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晓渡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纷纷涌向国外，去考察、访问和工作、学习，其中有许多青年学生。由于其势头有如当年“上山下乡”热潮，被人们称为“洋插队”。这些年轻人在“洋插队”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新鲜事情和麻烦问题呢？他们又是怎样对待和解决的呢？请看本文——

# 「洋插队」记事

(留美学生) 星 石

参加独木舟野营活动



## 出国学习遇到的第一难关

出国前，我不过是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学了6年的英语，口语只会照着课本念，写文章只会跟着语法句型走，“真刀真枪的实战”还真没有经历过。但学校的报到日期已越来越远，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飞机。于是出国后我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是过语言关。

到了学校，我先把发给我的活动日程表译成了中文，这才弄清楚每天应做些什么事情，活动地点在哪里。可是在参加活动时，只是像块木头似的坐在同学中间，听他们叽哩呱啦地说英语，听得自己一头雾水，什么也不明白。那时我顶害怕别人找我聊天了。美国学生英语说得像打机关枪，别国同学的英语又带有很重的口音，我都听不懂，只有和老师说话稍稍好些。他们知道中国学生的英语不很好，和我说话时总把速度放得很慢，而且说几句，就停下来问你有没有听明白，耐心得很。

中国学生的英语差，日本学生口语也不好，但是笔头子很厉害，几乎每个日本学生都选修历史这门要求很强记忆力与阅读能力的课程，而中国学生听、说、写都不太行。

英语说不好，我自己也着急得很。有一次，我和我同屋的美国同学谈心，一句话她说了好几遍我也没听懂，她就把那句话写了下来，我一看，居然有六、七个单词我不认识！当时我真着急，羞愧加委屈，眼圈一红，鼻子一酸，眼泪忽地掉了下来。急得她光着脚就往外跑，过了好半天，才见她气喘吁吁地捧了一本英汉字典跑回来，原来她去了学校的图书馆。翻开字典，她把那句话里我不认识的单词一个一个查出来给我看，念给我听。念完一个问我一句：“你明白了吗？”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认真地望着我，乌黑卷曲的长睫毛忽闪忽闪的，蓝色的瞳仁美得像一湾湖水。



与来访乐团合影



在一年级新生典礼上



参加友人的毕业典礼



为春节赶排节目



圣诞节聚餐



校长接见一年级新生



课余制作中国菜肴

从那天起，我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一本袖珍英汉字典，听到我不会的字或词，抓住身边的同学，就要他们等我查出来并指给我看。在学校里，我又有了很多的“小老师”，我说话用词不当，或是语法用错了，音读得不准，不管当着多少人的面，他们都会大声地纠正我。开头我在众目睽睽下，很不好意思，但是不好意思的结果，反倒都记住了。

学期开始的时候，有一项“红十字第一急救”的活动是专门为新生开设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考试，获得证明。教课的人都是经过训练的同学，他们教我们在各种危急的情况下抢救病人，什么人工呼吸啦，包扎伤口啦，我们都得学。课目一开始是看录像，学习各种手法和姿势，看完之后就进行练习和考试。然后进行第二项考试，发给每人一本急救理论方面的书，让我们阅读一小时后，进行笔答。我勉强地通过了第一项考试，第二项考试时，我捧着那厚厚一本书心里直发怵。一个小时过去了。同学中很多人都交了卷，我却连半本书还没啃完，圆珠笔的笔杆都快让我咬烂了。眼睛看着书本，脑袋里却一片空白。

旁边同学是我的好朋友，见我皱着眉头发呆，知道我这个“困难户”又遇到困难了，连忙走过来把书中一节一节的重点划出来，指点着我记住。花了三个小时我才把一本书看懂。再去参加考试，50多道题我居然只错了四道，高兴得我心花怒放，跑出考场就去告诉辅导我的同学。

他那双灰褐色的眼睛睁得好大，一把抱住我的腿把我举了起来，站在草坪上一边欢叫一边开始转圈。那时正是黄昏，太阳渐渐沉落，晚霞在天际燃烧，我被旋转着，眼前飞快地闪过嫣红如醉、绚烂耀眼的彩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洋溢着欢乐。我抓着他的肩膀，尖声地笑着叫他停下来，他放下我，快活地大声对我说：“你是我辅导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我也大声对他讲：“嗨！你真棒！”友谊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帮了我。这以前，参加这种考试的中国学生没有一次就通过的，我是头一个！这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以后，每当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我的好朋友总要对我提起这件事，“你能行！”他总是这样

说我。

正式上课之后，英语不好的困难更多了，上课听不懂，只好下课来补。国外课本一本就有中国的辞典那么厚，别人一个小时至少能看完五、六页，我用一天时间来看懂就不错。所以在时间上，我比别人紧张很多。我常常不停地看表，后来手表坏了，又舍不得去买一块新的，口袋里就一天到晚装着闹钟。

时间不够用就只有熬夜。熬夜前总要喝很多的咖啡，好心的巴西同学送了我一些很浓烈的巴西咖啡，我经常喝得一跑起步来，肚子里咣咣当当像热水瓶。熬夜也不能呆在自己房间里，一来怕灯太亮打扰同屋睡觉，二来屋里太温暖、太舒服了，看着书就会忍不住睡着。我就去教室读书，那里冷，而且到处都是硬邦邦的桌椅，困得受不了，躺在地板上休息一下，地板很凉，一会儿就冻醒了。多少个深夜，我自己坐在空无一人的大教室里抖抖索索地读书，总不由地想起那篇著名的短文——《渴睡》。而我，别无选择，必须坚持学习下去。实在困得厉害，我就强迫自己绕着校园跑上几圈，或用冷水冲冲脑袋，再不就抹清凉油抹得到处都是，像在熏蚊子。就这样，我曾创下了连续一个星期不上床睡觉的纪录，弄得自己像行尸走肉一般，脑袋发木，身体瘫软，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应当载入吉尼斯世界大全。

学校建在山里，中午热得很，早晚气温极低。很多个夜晚，我从宿舍去教室读书，总是置身于那种峭峭的寒冷之中。身边的宿舍楼只有稀疏的几盏灯在闪亮，惨白的月光静静地洒下来，映照得树丛与草地青幽幽冷森森的。白天充满喧哗与笑闹声的小路，



此刻音影全无，我孤独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沉重，以至有些可怕，我心跳得厉害地拼命快走。直到清晨，我才迈着疲惫的步伐，从教室走向宿舍。天边现出了淡淡的白色，树木在曙光里渐渐清晰了，我在寒风中，望着依旧寂静无声的校园，有一种战胜了自己之后的喜悦与得意。

来自保加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的同学，在出国前英语早已过关，大部分的课程也已学过，再学一遍自然是驾轻就熟。我很羡慕他们不为学习操心，又觉得自己正在接受一个极大的挑战，所有的知识和课程都是我不会不懂的，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学起来才更有意义。

## 独立生活迫使我更加能干

我总是相信，任何事情，别人能做，我也就一定行，不是为了逞能，是为了争这口气。一切艰难的事情，只要咬紧牙关，总能挺下来，就要有这个信心。

所有在校的学生，都是远离家乡亲人的十七、八岁的孩子。生活中最快乐的事就是接到邮件。邮车来的时候，信箱前总是挤满了人。接到邮件的，高兴得眉飞色舞，没接到邮件的，心里总有些遗憾。邮件中又以包裹最受欢迎。包裹里从漂亮的衣服、皮鞋到巧克力，什么都有。与我同屋的同学过生日那一天，就接到了她男朋友寄来的一大盒新鲜草莓与一束红玫瑰。我心里真羡慕，可是我的家里和朋友，不能这样常常寄东西给我，只要能接到大洋彼岸的一封来信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知道还有人在惦记着我！远离祖国与亲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学习，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使我与人很难沟通，开始时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天天只是学习、学习、学习，偶尔接到亲人的一封信，几句简单普通的问候都能让我激动得大哭一场，信成了我在那里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

我剪了自己的枕头套，上面绣上些花呀草呀的，缝成了一个大大的信袋挂在床边墙上，把来信全部装进去，临睡觉前总要拿出来看看翻翻，心里就会感到安慰。

在国内时，我虽然不爱打扮，但

穿着上注意雅致合体，到美国一看，我在学校里简直成了个时髦的人物。同学们都穿着朴素，式样简单的T恤衫，加一条又肥又大的花短裤。有很多学生把牛仔褲的膝头、大腿、臀部剪出一个个的洞，拽出里面的白线，这在学校里也是很风行的。至于穿鞋不穿袜子的习惯，不管老师还是学生都有，在校园里，常有同学光着脚在地上走，手里提着鞋。

大家生活随便，衣服脏了就往洗衣机里一丢，从丝绸衬衫到脏球鞋和牛仔褲，都能洗得干干净净，还不会损坏。球鞋在洗衣机叮哩咣啷地乱响，我们反而觉得挺有趣的。

很多同学都会抽烟。学校教室及宿舍的火警设备极为灵敏，如果有一点火星，吵人的火警信号就会响起来，即使还在睡觉也得跑出宿舍去。因而学校严禁学生在室内抽烟。冬天，看着烟瘾大的同学站在宿舍外抽烟，冻得直发抖，我觉得他们既可悲又可怜。

有一名黑人同学，长得一头浓密的长卷发，大家总拿他开玩笑，说是大概因为他的家乡着过火，把他的头发都给烫卷了。每逢火警的时候，就有人装着埋怨他把火给引来了，气得他有口难辩。

毕竟是在美国，男女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乱。在他们的心目中，交个异性朋友就像是买一件新衣服，开始会很喜欢，一旦穿腻了就随手丢掉，再换一件。一年里，总有五、六个女孩子怀孕。校方无法阻止，只好在新生到达之后就给他们上避孕课，教给他们避孕的方法，学校还免费提供药片，我是一个保守旧式女孩子，在国内我就属于落伍的那一类，何况是在美国？也正因为我的文化传统与他们的格格不入，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们之间难于苟同。我更深知我去那里的主要目的，虽然寂寞与孤独时时围绕着我，有时甚至难以忍受，但我知道，用这种方式来排忧实在是愚蠢之极，我不屑一顾。遇到谈论这些敏感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是因为中国的风俗习惯不同，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我能够理解，却不能接受。

外国同学的宿舍与国内大学里男生宿舍类似，臭哄哄的鞋子、袜子和脏衣服丢得到处都是，被子与枕头永远是乱七八糟地窝成一团。外国孩子

有些古怪主意来布置房间，把四壁贴上黑纸，灯泡涂上令人毛骨悚然的颜色，四周加上许多怪诞离奇的画片，甚至摆一具骷髅在房中央，无论给他们多大的地盘，他们都能摆得满满当当。走进房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他们还大方地请我随便坐呢！

学校里不仅男孩子的房间杂乱无章，女孩子的房间也一样。有一个日本女同学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互相拜访。有一次我去看她时，她正在睡大觉。被子却颠倒着蒙住了脑袋，露出一双小胖脚。脚上的袜子还穿拧了，后跟跑到了脚面上，我推她起床，她哼哼唧唧地翻个身，又接着睡着了。噱，她身体下面压着的东西真不少，课本、笔、脏袜子、手套、毛巾，还有一只闹钟！脑袋底下枕的竟是她的书包，亏她还能睡得着。我无可奈何，把东西一件一件从她身体下面抽出来。她睡得像死过去了似的，根本不理我这通忙乎。我知道，她这一觉，不睡到肚子饿是不会醒过来的，只得放弃弄醒她的希望了。

我不喜欢有事没事都和别人聊天消磨时间，有空时我宁愿去整理我的房间。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我会早起去山上采一束野花来插在瓶里，摆在我的小窝带来一些生机。我很喜欢我的“家”。做着功课时，偶尔抬头望一眼我温暖的“家”，我就情不自禁吟起一句英语，“My sweet thsmie!”（我的小屋，甜蜜的家！）这便是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唯一可以用来遮蔽自己的地方呀！

离我们学校最近的小镇，几个大型的超级市场和无处不在的“麦克唐纳”，并且还有一个叫金龙的中国餐馆。曾有人请我去那里吃过一次饭，炸春卷、蛋花汤、葱爆羊肉、辣子鸡丁，不过是些很简单的家常菜。可在异国他乡，又品尝到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店主人出来结账时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越南人，着实让我扫兴。

超级市场的商品非常丰富，甚至有动物出售。从商品的来源来看，玩具大多来自南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艺品大多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各种鞋类则大部分来自中国。第一次在超级市场里发现了一把中国的扇子，我尖叫着拿了去给我的朋友们

看。不过是一把普通的白纸摺扇，连个像样的扇面都没有，可是我却感到无比的亲切。中国的筷子、调味品、粉丝也有出售的，一小瓶五香粉可以卖到三、四个美元呢！只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中国人居住，外国人又不会中国煎、炸、炒、炖的做饭方式。他们会把酱油、醋放进汤里，但对于用来炖古老肉用的酸酸甜甜的酱，就只得用面包蘸着吃了。

去商店买东西，我只是找急需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父母以1:6甚至1:7的比率用人民币替我换来的美元，我捏在手里总觉得沉甸甸的，哪敢轻易就花出去？我在家中是独女，不算骄生惯养，但也是在零食堆里长大的。到了美国却从来没有花钱为自己买过任何小吃。美国的衣服价格高得令人咋舌，我更不敢问津。我习惯了这种清贫生活，真的知道什么叫过“紧日子”了。不可以随意买，我就自己琢磨着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废弃物。孤独的生活的确让我能干了很多。如果现在再有人问我，能不能够独立生活，我会自豪的对他说：“行！”

学校里为我们安排的活动好多。开学前的野营，学期开始后的校长邀请和“美国西南部学习”，第二年还有“社会考察”。平时每天下午都有课外活动，每星期有舞会，各宿舍里每月都有生日晚会，各种安排为我们学习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 野营活动中的苦楚与乐事

到校后的三天野营最令我难忘。临行前，队长带我们去领东西，谁知道在第一项领登山靴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我的脚在那里型号偏小，挑剩下的鞋中又偏偏找不到适合我的型号了。原本我的英语就不好，很难和别人交流思想，这时见队长站在一边对我发愁，我不由又触动了爱哭的神经，忍不住抽抽嗒嗒起来，而且越哭越带劲，急坏了我的队长，他两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搁，急匆匆地跑去和几个美国女孩子商量。不一会儿，那几个女孩子都跑了过来，一面搂着我讲一些安慰的话，一面放下手中已挑好的鞋让我试穿，不管我怎样推让也不行。我终于得到一双合适的登山鞋。

发的东西真不少，睡袋、雨衣、水

瓶、照明灯等等，统统塞进一只硕大的背包里，立起来有四尺多高！一米六二的我背起它简直觉得寸步难行，队长悄悄对我讲，我的背包是最轻的了，别人还要背上煤油炉、锅碗瓢盆和食物呢！

早晨，校车把我们送进了山区，在一片我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树林里下了车，我们的野外训练开始了。

我们置身于这茂密的丛林中，一切都是那样安静，只有风吹树叶的簌簌声，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林缝隙照下来，象千万片金箔交错闪亮，地上的松叶像柔软的地毯。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队伍静悄悄地出发了，队长怕我落队，让我走在队伍中段，还特意嘱咐我，爬山时只要觉得吃力，就大声的喊“停”。亚洲人的体质差在那里也是出名的。

刚刚走出去八百米吧，我的腿就开始不给劲儿了。背包仿佛加重了很多，压得我几乎直不起腰来。抓着背包带的两只手勒得麻麻酥酥的，却又不肯放开，脸上热得发烫，汗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淌，鬓边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一绺一绺地粘在颊上，热热的真难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背着沉重硬壳的乌龟，每走一步，大背包总好像是要掉下来似的左右晃荡，还不如乌龟走得稳当。见别人都在大声地说笑着，我当然不能停下，仍然坚持前进。

面前又是一段上坡路。我的腿就那样酸疼酸疼的迈上去，一步，又一步。强迫自己坚持，用意志支配自己，身体做机械运动。只是步子一点一点的慢下来，小下来……和前面同学的距离越拉越大。

终于听到队长喊“停”了，背包还没有卸下来，我就四仰八叉地倒下了。我躺在铺满松针的地上，连眼睛都累得闭上了。空气中弥漫着那种若有若无的泥土与树叶、松针混合的芳香，让我觉得昏昏欲睡，清爽的风拂过面颊，一种透人心脾的凉意。躺在这里真好，这地方睡觉一定不错。

脑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刚刚闪过，我听到有人坐在了我身边，用一片草叶挠着我的鼻孔，使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强打精神睁开眼，哦，是队长给我送水来了。我不客气，接过水瓶，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了半瓶，

看得队长在一旁瞪眼发呆。我自己心里偷偷笑，这要是在国内，好朋友们又该骂我像“牛饮水”了，是呀，在国内的那些玩笑话，快乐事，怎么能忘呢？

出发前，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在水瓶里装上自来水，而在自助餐厅的饮料吧前，灌了满满两瓶葡萄汁。现在被同学拿去摆在野炊的食品中，硬生生给“充了公”。我对自己的别出心裁很得意。

野餐极简单，有大量的乳酪、大饼、米和罐头，大家把青椒块、蘑菇块、香肠、乳酪夹在大饼中间，放在加了油的锅里煎一下，等乳酪加热成粘稠的流质，一个简化了的意大利比萨饼就做好了。关键的问题是乳酪，第一次吃的人很难习惯。可在美国的食谱中是不能缺少的。有一个同学吃不了，结果几乎三天没吃什么东西。

第一天，我们提前完成了行进路程，赶到了另一座山的山脚下。那时阳光明媚，温暖异常，我们便一个个卧倒，享受这美妙的太阳浴。

旁边的同学一个个都脱了衣服，只剩下内衣内裤，有几个甚至连内衣内裤都不留，痛快地晒太阳浴。在外国人的心中，裸露身体与大自然接触，是崇高与纯洁的，而晒一身小麦色的美丽肌肤，则代表着健康，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但我有我自己的审美观，不想跟着时尚跑，不看他们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地享受。

许是一天的跋涉太累了，篝火刚刚点燃，我的阿欠已是一个接一个打个不停，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粘着，总睁不开，不得不第一个钻进了帐篷。

半夜醒来，周围是黑漆漆的一片，寂静无声，朝天空望去，也是墨黑的一团。我心中害怕，却不敢哭出声来。突然想起自己是睡在帐篷的最边上，裹着睡袋就从帐篷里滚了出去。我看到月亮了，还有闪亮的星星，刚才的那种慌乱与焦急也无影无踪了。夜色好美，黑天鹅绒一般的天空上云淡星稀，深邃而辽远，近在眼前却是远不可及。上弦的月亮辉煌地挂在天上，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成了银白色，我在如水月色笼罩中似梦似幻的躺看。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地里露营，身边的二年级学生一个个都把脑袋藏进睡袋里躲避寒冷。我胆小，看到头顶上有星

星、月亮在闪烁，心里才能踏实些，尽管峭峻的山风把我的脸吹得生疼，我还是不肯把头缩回睡袋里。周围是多么的安静，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还有不知名的虫儿在草丛中低吟。我迷迷糊糊地睡去又醒来，醒来又睡去。

鸟啼声迎来了破晓，也唤醒了，可是那冰冷刺骨的晨风却让我死活不肯爬出睡袋。队长到处搜罗，帮我找来了一条男式迷彩裤，好长的裤子，我一穿上，大家都笑我，不过，我总可以“起床”了。哆哆嗦索地站在风中收拾我的背包，只觉得腰酸背痛，一动就疼。只是有了第一天的经历，也就慢慢适应了。我和队长一起看地图，学着使用指南针，学着做美国式的快餐，得到了很大的乐趣。第二天，我们爬到了另一座山的山顶，还赶上了一场大雪。

这雪下得稀奇，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一阵狂风刮起来，一忽儿的功夫，就下起了雪。这大朵大朵的雪花悠悠哉哉与懒懒散散飘落着，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描述，只觉得它们像飞舞的天使，洁白的精灵，轻柔娇俏如秋日的落叶，宽容丰润地覆满天空，不一会儿便积雪盈尺。真不敢相信刚才那样的狂风之后，会有这样悄然的雪。雪后的空气清凉如水，带着无尽寒意和沁人心脾的清新。雪中的树木，一棵棵银装素裹，愈发的巨大挺拔，宛如接着天一般。

## 世界上最美的还是我们家乡

在学习生活还没有开始之前，经历了这样一次野营，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同学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与关心加强了，自此之后，我们就要在一起学习生活两年。

学期开始后不久，所有一年级的新生都接到了校长邀请参加晚宴的卡片。宿舍里忙乱成一团。尤其是卫生间，比任何时候光顾的人都多，忙着沐浴梳洗的，忙着描眉画眼的。穿衣镜前更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好几个女孩子一连换了三、四身衣服都不满意，索性拎了她们的皮箱摆在卫生间，光着身子一件一件的挑。卫生间里沐浴时哗啦啦的水声，嗡嗡的吹风机声，高跟鞋进进出出时的清脆敲击声，和着时起时伏的说笑声，几乎

要把房顶冲破了。

我却坐在屋里发愁，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衣服挑不过来，而是我没有很合式的衣服穿。出国前，父母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正式活动要参加，所以不曾为我准备礼服，这一下可麻烦了。

不管怎样，宴会总是要去的，我套上一件白色长袖衬衫，腰间系了一条绿色长裙，头发用发圈箍住，披在肩上，腕上是我从不离身的玉镯，朴朴素素地去了宴会厅。

我确实太普通了，普通得我在那一大群珠光宝气、衣着华丽的人群中反倒显得更突出。记得我操着不流利的英语，笨拙地和别人聊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我的座位被特意安排在校长旁边，我记着父母从小对我的教导，非常优雅地与校长合影，碰杯，谈话，深感自己正代表着中国。

10月3日是中国的旧历8月15。夜晚，我一个人坐在礼堂前的长凳上赏月。一轮明镜高悬，果然是“月到中秋分外明”。月光的清澄，更衬得我的心情十分忧郁凄凉。手里的一支红玫瑰，是昨日别人赠的，艳得令人心跳，却已盛极而衰，不胜憔悴，血泪斑斑似的。去年的今天，我与家人同坐在融融的月光里，桌上摆着娇黄的鸭梨与各式的糕点，我挑食，再可口的月饼也不肯尝一尝，现在，我多想再坐到家那小桌前呀。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你们是否也在想念我，一如我深深地思念你们？

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的一首中秋送月词，《木兰花慢》：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际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那一夜，我呆了很久，空荡荡的、悲哀的感觉似潮水拥住了我，我如同沉浸在飘摇的恍惚的大海中，分不清东南西北，什么也不想，任由那股酸楚的潮流带着我东游西荡。

我一个人的中秋节就这样过去了。

生活仍然继续，甩不开的，是心头隐隐的忧郁。每逢周末，学校里总有舞会，我便逼自己去那里消遣。

学校里的舞会，永远放着震破人耳膜的强节奏音乐，没有人跳浪漫的交际舞，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跳下疯狂的舞池大跳迪斯科，刺耳的音乐象野兽的嚎叫，压不住我心中的烦恼，但我却得到了发泄。时常在跳舞时，眼泪就悄悄地滑下来，我就痛痛快快地由着自己落泪，哭完之后，心情会好一些。不能诉说的心事，是丢不掉的，可我除了以这种方式来倾吐，又能讲给谁听呢？

北京现在离我太遥远了。我忘不了初春的日子里，中南海外那一棵棵玉兰树，那样洁白的一丛丛，那样娇艳的一簇簇，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雪白的玉兰花与红墙相映衬，热烈浓重如印象派派的油画，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美丽。

没有比深夜在北京的街道上骑车更舒畅了。夏日深夜的长安街又亮又直，东西望不到头，齐刷刷的荷花灯直线延伸，宽阔、畅达、凉爽，红绿灯不管用了。灯光搅着风呼呼地往后掠着，那种自在与洒脱，几乎让我觉得不能呼吸。

香山的秋天更是有名的。耀眼的红叶，有如只只凝神的红蝴蝶，伫立枝头，轻轻翻动着翅膀。而我，曾漫步于这蝴蝶丛中，欣赏这绚烂夺目的红叶。它们很美，美得欢欣鼓舞，又有些迫不及待，似乎惊惧于秋天的迅即降临，生命必须做最后的冲刺，即使烧熔为烬也在所不惜。

冬天最热闹的去处是庙会。叫卖声、欢笑声与油锅里滋滋啦啦的爆响声，混合了那食物的香气，大老远就能听见闻到，尤其是那糖葫芦，红澄澄、酸甜甜的一大串是多么诱人，我这样大的孩子了还喜欢手里举一串，一路张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一路吃呢！那种喧哗，那种喜气洋洋，明摆着在告诉你，瞧，过节了！

呆在北京城里，置身于这一切之中，从未留恋过什么。待走得远远的了才忽然发现，北京在我心中，祖国在我心中。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猛地跳了出来，暖得我心里热烘烘的，

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还是家乡和祖国啊！

责任编辑：卢弘



史振中 庚乘堂

# 团圆交响曲

——海峡两岸海员十年交往纪实



## 序曲：骨肉情深

1975年初夏的一天，碧波万顷的南中国海上，风平浪静，渔帆点点。一艘台湾渔船正在这里张网捕鱼。突然，一名船员抱着肚子蹲在甲板上，随后喊叫着打起滚来。船上没有船医，也没有相应的药品，全船人都呆了，不知如何是好。一个船员忽然脱下自己的白背心，信号旗似的向过往的大小船舶拼命挥舞着求救。但一艘艘船擦肩而过，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呼吸渐弱，一步步向死神迈进，大家眼噙着泪水，一齐跑到甲板上，向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妈祖祷告，乞求神灵保佑。

妈祖没来，悬挂五星红旗的一艘大陆远洋货轮W号来了！望着货轮烟囱上的五星、波浪码克，台湾船员一面挥舞白背心求救，一面不顾一切地开足马力，全速向W轮靠拢。

大陆船医拎着药箱急急忙忙来到船上，果断而又熟练地对病人检查、诊断、打针、服药，病人很快脱离了危险。面对大陆船医，船员们泪如雨下。

细心的船长发现台湾渔船上的淡水不多了，食品也不多了，就把本船的淡水灌了过去，把食品送了过去。

W号就要离开了，台湾船员哭声一片，深深鞠躬致敬。

一个月后，在北纬150度赤道附近，这艘台湾渔船又发现了这家远洋公司的另一艘货轮L号。他们激动得又喊又叫，然后开足马力围着L号整整转了三圈。S号渔船的举动让大陆船员吓了一跳。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月前的那段故事。全船30多名船员全副武装进入战位。

S号终于在距离L号左舷前100米的地方停车漂航，紧接着6名台湾船员从渔船上放下一个竹排，又从渔船上搬下几个圆柱状的东西，随后6人纵身跳进大海，拥着竹排游了上来。

L号船长命令停车放梯，把6名台湾船员接到船上，台湾二副一面喝着大陆的青岛啤酒，一边诉说一个月前在南中国海域上发生的那催人泪下的一幕。随后他们又从竹排上搬上了几条鲨鱼和几条台湾“老寿星”牌烟送给大陆船员以示感激。大陆船长和管事也向台湾船员赠送了青岛啤酒、中华牌香烟、浴巾等。台湾船员回到船上，组织全体船员在甲板上列队，鸣笛向L号轮致意。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然而，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深深地埋在了当事人的记忆深层里。

1979年元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饱含深情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亲人团聚的宏大构想。

一语落地，石破天惊，环球震撼。从此，两岸但见月圆吹箫，不闻炮声。

进入80年代了，海峡两岸兄弟开始共同谱写一曲曲优美乐章。



大陆海员在国外



八小时之外，两岸海员在一起打扑克  
人放火的事也报道，用于教育人民。



年三十，两岸海员同包团圆饺子

## 第一乐章 异国相逢

我们且放几组闪回镜头：

镜头一：

1981年6月22日，晚7时。

日本佐世保港。

大陆某远洋公司的油轮C号停在这里卸货，附近还有一艘台湾油轮D号。

两名台湾船员走到C轮舷下，高声问道：“我们是台湾船员，想拜访贵船政委先生，可以吗？”

值班水手马上用报话机报告政委。政委说，欢迎他们前来。

台湾船员在大台间坐定，服务员摆上香烟、饮料、糖果。

C轮政委和大副来了。

台湾船员说，我们两个都姓张。

D轮政委：我也姓张，咱们是一家人，欢迎来访。

——大陆有台湾商品吗？商品上有台湾制造的字样吗？出售时有人干涉吗？

——台湾商品不仅在大陆有销售，有的还很受用户青睐。至于台湾商标，无人干涉。

——你们经常讲新社会，这个社会新在什么地方？

——这是同解放前比较而言的。同旧社会比，这个社会有许多新东西，最主要的是所有制变了，实行按劳分配。

——你们那里杀人放火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不登报？

——杀人放火的事有，并不那么多，现在很安定。这种事情台湾有、美国有、日本也有，而且更厉害。我们政府对杀人放火是坚决反对，并采取制裁措施，保证人民的安全。有些杀

……

一个半小时后，台湾船员高兴而归。

镜头二：

1982年5月13日13点。

国外某港口。

港内停泊着大陆某远洋公司的H轮，附近停着挂方便旗的台湾I轮。H轮船长通知当班水手，台湾船员有可能登轮参观座谈，做好热情接待准备。

果然，台湾船员来了12个人！

大陆船长、政委、管事等迎上前去，互相握手，致意，然后到大台间落座。

台湾船员分别是轮机长、大管轮、两名轮机实习生、三副、实习驾驶员还有两名妇女（轮机长和大副的太太）、一名女孩（轮机长的女儿）及两名水手。

服务员端上茶水、烟、糖果和花生。

一开始，气氛融洽，一片笑语欢声，台轮机长的女儿接受了大陆船员送的两件礼物，他们表示感谢。

双方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交谈。

——大陆妇女穿衣服是否受到限制？是否可以自由恋爱？

——妇女可以穿自己爱穿的衣服，可以烫任何一种自己喜爱的发型。她们有恋爱的自由。

——大陆有没有人身自由？走路要不要路条？

——你讲的是抗日战争时的事情。那时为了防汉奸，要路条，现在，大陆享受充分的人身自由，只有在反映抗战的电影里能看到要路条的场面。百闻不如一见，你们可以回去看看。

……

14时20分，台湾船员和他们的家属离船，走出很远，还频频挥手告别。

坚冰打破了，感情的航道开辟出来了，两岸海员在国外的接触日益增多，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在渐渐淡化，血缘关系一天比一天突出。大家共同为灿烂的五千年文化而自豪。不管走到哪里，心田发出一样的声音：赞长城，颂长江，唱黄山，歌黄河。中医、中药；武术、气功；国画、书法；唐诗、宋词。就是讲到眼下，也突然发现了那么多相通之处。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进行自卫还击时，台湾船员在航行时还关心战况，为大陆的每一个胜利而举杯庆祝；当中国女排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时，台湾船员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们指着女排的运动服说，那上面写的是中国！当大陆的卫星上天时，台湾船员情不自禁地伸出了大拇指；更叫人惊讶的是周恩来去世时，不少台湾船员悄悄地流下了眼泪，他们亲手制作了小白花戴在胸前，在小白花的下摆上写着“周总理，我们敬慕你！”他们也叫“周总理”！……

当然，差异也是有的，而且也很明显：两种社会制度造就的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心态，甚至习惯性用语；对中国现代史上是是非非的不同理解和立场；对祖国未来大趋势的不同预测，等等。但是，既然各抒己见，那就暂时束之高阁，让未来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让时间老人去详说吧。再说，假设两岸今天就举杯共庆团圆，那还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大家尽可以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

血浓于水，骨肉情深，我们毕竟都是龙的传人！



### 为祖国早日统一，干杯！

那是一个中秋节，某远洋公司P轮在日本一个港口靠泊。入夜时分，但见海上星光点点，月色溶溶。船员们三三两两来到码头上，沾沾地气，舒展一下筋骨。不知是谁，提醒了一句：今天是中秋节！大家不约而同向天空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悬挂中天，几朵浮云飘飘而过，月中似显嫦娥婀娜身影，更增妩媚。

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七八个一样皮肤、一样高矮的海员。不用询问，职业的特征使大陆船员一眼就看出：是台湾船员。

不错，他们是Q轮上的台湾船员。

没有什么客套的过程，大家就这么不约而同走到了一起，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交谈着。从中秋月圆谈到北京故宫，台湾的日月潭；从海员的职业谈到家乡的亲人，柴米油盐。然后，又回到明月上来。仰望皎洁的银盘，不知是谁吟起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来。立刻，会的与不会的，都跟着咏诵。一位大陆海员感叹地说：“咱们兄弟同聚，要是有酒多好！”

一语中的。P轮和Q轮的船员分头跑回各自的船上，捧来大陆和台湾的啤酒、香烟、水果、罐头，然后围成一圈，席地而坐。

随着啤酒的逐渐减少，两岸兄弟的话却是越说越投机。P轮的船员感慨地谈起，他们的家乡在浙江、福建、山东、辽宁……那里还有他们的叔叔、姑姑、姐姐、哥哥，想不到一道海峡居然让骨肉同胞30多年不曾谋面！

大陆船员问：“听说台湾有人在搞台独，你们对此怎么看？”台湾船员拍地而起，愤怒地说：“这是做梦！”一位台湾船员说：“台湾有个民进党，就是主张台独的，在台湾很不得民心！……”

### 两岸海员合影留念

两岸船员把酒瓶子举了起来。啤酒光了，罐头光了，水果也光了。两岸船员还余兴未尽，最后，他们干脆拎来收录机，跳起了热烈奔放的迪斯科，直到午夜时分，两岸海员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了。

第二天凌晨，P轮船员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一声笛鸣，醒来时，Q轮已经开航了。但大陆船员却永远地记住了这个花好月圆的日子：1984年9月10日。甲子中秋。

## 第二乐章 踏上宝岛

一位海员曾讲了这样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1983年，我被公司派往美国一家船公司的船上工作。船上除了船长、轮机长、大副、大管轮等七八个高级船员，其余都是中国大陆船员。

7月里的一天，我们听说这个航次去台湾花莲港，乐得蹦高直跳。台湾，我从小学的课本上知道了她，也从电视里看到了她，多么盼望有一天能亲自踏上她的土地，看看那里的一切，哪怕是远远望上一眼也好，我有个表哥，曾在福建的空军雷达兵服役。他曾经得意地告诉过我，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福建平潭岛的山尖上，能隐隐约约望见台湾岛，像一条线似的，非常壮观。我听了心里很嫉妒，心想，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天我一定踏上台湾岛，那可比你强多了。想是这么想，但我也知道，这是做梦。即使当了海员，走了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我也觉得，到台湾去是非份之想。这次，真的要去了，我们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船在驶往台湾途中，我们的心咚咚直跳，生怕船东突然改变主意，不去了。直到临近台湾，我们

### 分手的两岸海员互赠纪念品

心里的石头才落地。刚刚看到台湾岛的轮廓，我们就来到甲板上，兴奋地说呀，笑呀，商量着买点什么最有意义的纪念品回去，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朋友。那时，我们的高兴劲儿真像个孩子。

然而，船在花莲港一靠泊，兜头就是一瓢凉水，浇我们个透心凉。他们了解到我们是大陆人，立刻宣布不准我们下地。我们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同他们抗议、争辩：我们有国际海员护照，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港口都可以下地观光、购物，为什么到了自己家门口却不准下地，这是什么道理！港口官员理屈辞穷，就说是上面的意思，他们只是履行公务。再争吵下去，他们干脆来个不理不睬，反正就是不让你下。还有更令人生气的。我们不但不能到市去观光，就来到码头上散步也要受到限制，不能超过船的长度。也就是说，散步的范围只有一百多米，超出这个范围，武装警察就堵你。到了晚上，他们加派了警察值班。我们对此表示抗议。

台湾当局似乎也感到他们这样做太不人道、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来了个折衷的办法。一天，当地海员工会的一个官员上船，邀请我们下地观光，由他们统一组织，我们不能携带相机，不能随意行动。就这样，我们总算真切地踏上了台湾的土地。那天是阴天，我们乘巴士前往台湾东北部太鲁阁自然风景区观光旅游。从车窗向外望去，台湾真的美极了，花莲地区东部就是太平洋，气候十分温暖，湿润，四季如春。但远处的山顶上，却积着皑皑白雪，你说多壮观。一路上，看到稻田、扶桑花、葡萄，都使我们心醉。回来以后，我们议论，两岸要是早点统一该多好，我们就可以带着妻子、儿女、恋人到这里旅游了。

下一个航次去台中港，却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

同船一位姓苏的朋友的舅舅，1949年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30多年不通音信了。后来，他舅舅通过香港寄回一封信，说他想家想的快疯了，就是回不去。全家人读了这封信都哭了。小苏这次外派，就把舅舅的信带了回来，那上面有地址和电话号码，他原先也没想到能到台湾来。现在真的来了，他乐得手舞足蹈。茶饭不香，就盼和舅舅见面。在花莲港碰了个大钉子，他心凉了大半，把一线希望系到台中港。

船到台中港后，他设法给舅舅打了电话去，家住台北的舅舅一听，都乐傻了，30多年没见到家乡的亲人了，现在近在眼前！苏的舅舅放下电话，立即驾车从台北赶到台中港，可是到了港口，警察却不许相见，理由是事先没有申请。没有办法，舅甥二人只好隔着码头的高墙，一个港里，一个港外，在公用电话亭里倾诉思念之情……

宇宙生生不息，地球在不停地旋转。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是历史铁的定律，近几年，台湾当局的决策者们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对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

1984年，大陆某远洋公司外派到联邦德国的18名船员，居然获得了四进宝岛的机会。

人人都是血肉之躯。第一次来到梦魂萦绕的台湾，18名海员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也遇到了麻烦，警察把他们堵在船上，不准下地，他们愤怒，但没有失去理智，而是通过船舶代理交涉；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准观光，这是什么道理？代理富于同情心，对当局的行径十分反感。真的，恐共症患的这么严重，来了十几名海员就如临大敌？太过份了。他积极地奔走、呼吁。有了结果，松动了。也是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充当了导游。

第二次到台中港，一提出申请就同意下地了。但有条件，由他们带领参观，不能单个行动。导游显然是经过训练的，而且嗅觉是灵敏的。在前往台中汽水厂的路上，他听一位大陆船员谈起他姑姑在台湾，就凑了过去，关切地问：“你姑姑在台湾？”那位海员点点头。导游问：“她住什么地方？”

海员答：“台北。”导游忙说：“台北好啊，很繁华，首都嘛！”海员答：“中国只有一个首都，在北京。台北是很繁华，电视上见过。”导游沉默了一会，压低了声音问：“你需要我帮忙吗？”海员问：“你想帮我什么忙？”导游悄声说：“台湾生活好啊，洋房、汽车、家用电器都有，你就留下来吧，到你姑姑那儿去。”海员笑了，提高声音说：“等两岸统一了，我就到台北来定居。”导游知趣地再没说什么。

第三次，18名船员感受到一种变化，人家采取主动姿态了，邀请他们下地观光。当然，还是集体行动。回船后，可以在码头上散步，范围也不再是船的长度了。正是深秋季节，在大陆的北方，早已落叶满地，冷风拂面，这里却仍是一派春意，绿山碧水，鸟语花香。大台服务员见不远处有一个老工人向这里观望，就走过去想说几句话。那老工人倒主动开口了：“你们是大陆来的？”大台点点头：“是。”老人问：“你是哪里人？”大台说：“青岛。”老工人一下子呆住了，紧接着，竟扑过来抱住大台，呜咽着说：“我也是青岛人啊！”大台也激动万分，真是意料不到的奇遇，在这里遇见了乡亲，他也紧紧抱住老人，眼里滚着泪水。两人拥抱了好一会儿，才松开，互相对视，哭着、笑着。大台问：“大伯，您离开青岛多长时间了？”老人叹口气说：“从四九年过来，就再没回去。我在这里儿女成群了，可我还是想青岛，想山东，我还有个老母亲和一个姐姐，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大台说：“大伯，我回去后帮你打听打听。”老人表示了谢意，问道：“山东还那么穷？饿得逃荒要饭吗？”大台说：“山东现在可好了，特别是青岛、烟台一带，可富了，农民都住上了小洋楼。”老人似乎有点不信，但也没说什么。大台说：“您回去看看就知道我说的一点不错。”老人说：“我做梦都想回去，不知道我这辈子还有没有这个指望。”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大台说：“能，一定能。”老人感叹地说：“一想到青岛，我就想起了青岛的苹果，真脆，真甜呢。”大台兴奋地说：“大伯，你等着。”说罢，一溜烟跑回船，拿来一袋苹果，说：“大伯，这就是青岛苹果，你吃吧，吃吧。”老人捧着苹果，大滴大滴的眼泪落了下来。

第四次到台湾，连在船边巡视的警察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显然友善多了。一位警察十分动情地谈起了他从未见过的长江、黄河、兵马俑、桂林山水，感叹地说，要是能像海里的鱼儿一样自由地游来游去就好了。

蒋经国先生在临终前看到了两岸人民交往的大趋势，顺应潮流，做了一件有利于民族的好事。1987年11月2日，在台湾，一项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政策终于出台了：开放一般民众到大陆探亲。紧接着，则一系列的开放……。台湾人沸腾了！欢呼了！潮水般涌向大陆；寻根、探亲、观光、旅游、采访、做生意。令人深为遗憾的是，这种开放是单向的……

但愿有一天，台湾当局也能允许大陆同胞能自由踏上宝岛的大地。

## 第三乐章 大陆之行

1987年10月3日上午，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台湾货轮徐徐驶入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大连港。船长站在驾驶台上，望着远处的高楼、电视塔、山顶上的凉亭，近处穿梭出入的船舶，繁忙的码头作业区，进出的人流，心里说不出是喜是忧是惧是疑，或许兼而有之吧。他50多岁了，脑门上刻着饱经风霜和皱纹。作为船长，虽走遍世界，却也还是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在国外，他曾留心过关于大陆的新闻报道，虽和在台湾听到的完全不同。但他也想，那也许是装门面。

靠上大连的码头了，他心头一震，毕竟是来到了家乡。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还是一个人先下去看看吧。

他一走出码头，立刻感到精神一爽，宽阔、整洁、美丽，这几个字眼一起蹦到脑子里来。碧空如洗，风和日丽，干脆走一走吧。他信步朝市内走去，来到了一个堆满了鲜花的广场，广场中央，喷泉正在怒射，弧形的水浇灌到一盆盆正争妍斗艳的鲜花上。广场周围，是俄罗斯式、日本式的古老建筑，风格各异。稍远一点，是已经竣工的高层大厦。他简直以为置身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某个城市。他问一个老者，这是什么地方？老者告诉他，

这是中山广场。他不由一惊，问为什么叫中山广场。老者告诉他，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他确实没想到，大陆是尊敬孙中山先生的。

沿中山广场走下去，他来到了商业区——天津街。这里的情景更令他惊叹不已。商店一家挨一家，商品琳琅满目，人群如潮，平静、安详、幸福，穿戴打扮有如百花齐放。街上饭店比比皆是，服务员在热情地同过往顾客打招呼。这是大陆么？他走下去，走进几家大型百货公司，有日本、南韩、美国的商品，还有来自台湾的产品。看到那些精美的工艺品：唐三彩、贝雕、国画、玻璃瓷器，他喜欢得看了又看。

3个小时后，他回到了船上。躺在床上感慨了半天……

第二天，他在码头门口叫了一辆“的士”，进星海公园，逛老虎滩，游滨海路。一路饱餐秀色，领略了祖国北方粗犷之美，不禁心醉了。转了一大圈，5个小时过去了，他下车向出租车司机付款，没想到司机还给他一些，指了指计程器说，多了。他说，那就作为小费吧。司机笑了，谢绝了。这使他很不解，也很感动。怎么，现实同传说的完全不一样？！他马上找到船舶代理，请代理帮他往台北挂个长途给他太太。原先，你知道要来大陆，居然没敢写信告诉太太，怕她担惊受怕。现在，他在亲自打电话告诉太太，我在大陆，我在大连，大连很美，大陆很好，很好！……

当天晚饭后，船长突然通知全体船员到大台间开会。他亲自宣布全体船员放假三天，下地观光，好好看看大陆！

台湾海员到大陆，动机各异。

动机之一：祖籍在大陆的，要寻亲。

多少年了，他们就饱尝相思之苦。美丽的宝岛上的相思树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他们却只能在梦里回故土。是啊，世界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就是亲人的长别离。儿子离开了父母，丈夫抛下了妻子，父亲吻别了儿女，一去不归，就是铁石人也要落泪。海员真是幸运儿，他们捷足先登，来找亲人了。一位台湾海洋学院的教授发现了这个通道，竟迫不及待地辞去了工作条件良好、待遇优厚的教授职务，义

无反顾地登轮当了一名普通船员，因此实现了他30多年的寻亲梦。

寻亲寻亲！在这股潮流中，发生了多少动人而又发人深思的故事啊！

这是个大厨。已到花甲之年，山东莱阳人，出莱阳梨的地方。16岁那年，他刚刚踏上人生的道路，开始和父亲一起挑上家庭生活的担子，就被抓了壮丁。可怜他，来不及和养育他的父母告一声别，就稀里糊涂地到了台湾。开始，他还相信蒋先生的话，要不了两年就回去。可是一年复一年，头发都白了，还是没回去。44年了，一点家乡的音讯也没有，他绝望得想一死了之。谁想到，时来运转，喜鹊登枝，船到大陆了！他哪里也不去，长城、故宫、天下第一关都吸引不了他。他只有一个要求，找到亲人。代理被他的不幸感动了，马上找，电报、电话，一个个飞向莱阳县政府。效率真够快的，他所在的船还没返航，消息传来了，他的哥哥、弟弟、妹妹还在，马上来和他相见。亲人第二天能到，他乐得睡不着了。早上5点钟起床，在房间里又是唱又是笑。看见他这举动的人都说，大厨得精神病了。他说，你们年轻，懂得什么。

这是个舵工，原籍长春。1946年随军去台湾，一别家乡40年，他早就在挖空心思设计探亲的途径了，但都没有成功。这个航次，他听说先去香港，尔后去大连，不禁喜上眉梢，马上打个电话给太太，让太太把礼物准备好，捎到香港，他要回大陆了！船一到大连港锚地，他迫不及待地同代理联系上，请代理无论如何尽快帮他找到在长春的胞兄弟。代理立即将他提供的情况反映给长春。那边马上出动，相当顺利，找到了！他的胞兄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奶同胞的弟弟还在人世，虽已79岁，却像陡然间年轻了一半，马上率领子孙8人南下。兄弟相见，老泪纵横，哭倒在地。

这是个三副，30岁上下，出生在台湾，祖籍河北唐山。船靠天津新港。伙伴们拎着相机兴致勃勃地去了北京，游故宫、去十三陵，登八达岭极目远眺。他虽然动心，却没去，而是直奔唐山。他身上负有重任啊。1945年从大陆去台时还是壮年的父亲，尔今垂垂老矣，卧病在床，今生今世怕是不能再回故土了。老人思乡心切，再

三嘱咐儿子如去大陆，无论如何带回唐山的一把土。他带着父亲一颗滚烫的心，来到他父亲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十年前发生过空前的大地震，转瞬之间，成为瓦砾。尔今，重新布局，高楼林立，树木成荫，花园点点，马路宽阔。他小心翼翼的用手帕包上一包土，一块瓦，放进随身的旅行包，似乎比金元宝更珍贵。黄金有价情无价。见了这把土，这块瓦，父亲的那份快乐和幸福，黄金是买不来的。

动机之二：年轻一辈人要观察。

他们是那样一批海员：即使祖籍为大陆的，也是台湾本土生、本土长。从小接受台湾的教育，渗透了台湾的意识。大陆，对他们遥远而陌生。无缘踏上大陆的土地。

远远地望着大陆庞大的身影，他们有时也好奇、困惑乃至向往，一点也不奇怪，血缘在起作用。70年代以后中日建交了！中美建交了！大陆远程洲际导弹试验成功了！大陆人造卫星上天了！大陆在洛杉矶奥运会拿到15块金牌啦！等等，他们惊奇而震惊。他们没有老一辈人的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尽可以思索一番。可是，没有实地观察，比较，坐井观天，那种思索是多么苍白啊！

突然有一天，历史一下子把他们推向大陆了。而且具有两重身份：主人兼客人。很复杂的身份，又确实如此。回大陆，那是回到家里，为什么不是主人？可到底还是客人，环境、语言，生活上的差别是明显的，他们寻亲人那种迫不及待的神态，也没有老兵的那种恐惧心理，他们带着几分戒备几分好奇下船。来的多了，戒备消除了，好奇心也消除了，剩下的是观察。于是各种各样的心态都出来了。

1985年12月15日，著名的旅顺口接待了第一批来此参观的台湾海员。他们一行13人，都很年轻。

那天，入冬的大连地区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坐在大巴士车上，海员们谈兴极浓，不时插科打诨，没有人感到不适。

到了，他们对这小城发出由衷的赞叹声：美丽、干净。

在旅顺博物馆，室内因停电没有暖气，冷若冰窖，一看展品，他们忘了寒冷，一样一样地品头评足。见到

古人发明的双龙洗，他们赞叹不绝：“我们的祖先真聪明。”见到1300年前的木乃伊，他们说：“老祖宗真不简单，从木乃伊身上的丝绸看出，中国古代的纺织业有多发达。在国外看到的木乃伊，都没有这个保存的好。”

在白玉山塔前，见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屠杀中国人民的象征，他们气愤异常，说：“咱们中国要强大起来，再也不能遭受外国人的侵略了。拳头硬才能不受欺侮，中国没有军事后盾不行。大陆的军事力量还不错”。

在鸡冠山北堡垒，那正是个风口，冷风吹得人浑身颤抖，直起鸡皮疙瘩。陪同人员说，在车上听完介绍再下去看看吧。他们一拍胸膛，来了就是为了看的，冷点怕什么！看着这个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他们一个个心潮难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家门口打仗，争夺

中国的领土，欺人太甚！

回去的路上，议论不止。都说：来看看真好，总算知道外国人怎么欺负中国人了。中国人再也不会让他们欺负了。

1988年2月15日，正是中国农历腊月29，次日便是大年30了。这天，某国际海员俱乐部里，灯火辉煌。海员工会正在举行宴会，为台湾海员洗尘，共庆龙年快乐，中华巨龙腾飞。

几杯酒下肚，燃起一股热情。台湾船长，一个刚接近不惑之年，显得颇健壮的中年人对身边的一位大陆人发出感叹：“我是台湾本土人，我们这一代人跟大陆没有怨仇，等老一辈都去世了，就好办了。”轮机长也是个中年人，说道：“我们也和你们一样，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台湾就那么大的地

方，没有出路，没有大陆做靠山怎么行，统一是肯定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旁边坐着一位更年轻的电机师说：“统一的事情不能急，需要慢慢来。等大陆的生活水平达到台湾的水平了，那时候就可以统一了。”大陆陪同人员说：“现在统一不是更好。台湾维持现状，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谁也不吃掉谁。这多好。”台湾船长一笑：“大陆政策多变，要是变了，台湾就亏了。台湾又没有那么强的军事实力抵挡大陆。”

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要再同室操戈？但愿从今以后，海峡两岸，月圆吹箫，不闻炮声，骨肉团聚，把酒论情……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责任编辑：(慧君 晓渡)



## 东南亚饲料大王

吴庆星  
的  
中国心

王永志

五口通商港口之一的厦门，在它郊外的集美村，是一个偏僻荒凉的渔村，男孩子偶尔有上私塾就学，女孩子则不得入学，教育十分落后。可今天它已成为闻名中外、接纳四方莘莘学子的著名学村！

曾是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它东郊的马甲乡山边村，四、五年前，还是个贫困封闭的小山村，谁能想象一幢幢气派恢宏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一座引人瞩目的高等学府从天而降！

前者，是一面飘扬在神州上空猎猎作响的爱国华侨的旗帜——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后者，则是一位被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现代陈嘉庚”的海外乡亲——吴庆星先生捐建的。

吴庆星先生1935年出生在缅甸。而他则喜欢称自己根在华夏，根在仙公山下的山边村。

“说我一下子就想办大学，就要搞这么大的规模，那是吹牛。”在仰恩别墅后楼的客厅里，吴庆星先生坐在藤椅上，曾同笔者推心置腹地叙说他捐资办学的缘起：“我是来还愿的！”

吴先生祖祖辈辈休养生息在泉州府，父母为了生存，背乡离井到了缅甸。四十年代日本鬼子把战火烧遍了东南亚。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他随父母历尽艰险，回到祖籍地山边村。但这次长途跋涉却把吴庆星幼小的心灵同故乡连结起来，从此再也扯不开揪不断。1956年，他刚刚迈入缅甸仰光南洋中学的校门，就兴冲冲地来到中国参加全国篮球第一期指导员训练班。长城、故宫、天安门等名胜古迹，让他眼界大开，流连忘返，但他依然没有忘记风尘仆仆地回到遥远的山边村，去寻根谒祖。

1968年，吴庆星携带妻子、儿女从缅甸迁居香港。他赤手空拳在商业之都搏得一席之地。他亲手缔造的和昌集团业务现在已遍布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被人誉为东南亚的“饲料大王”。

80年代初，吴庆星年迈的双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他们看山边村还那么穷，祖屋破旧不堪，村里的孩子失学严重。回到香港，就把儿子叫到身边，老人要他做两件事：一是建祖屋，一是办学堂。二老不久就辞世



吴庆星先生（左三）同作家作者合影了，这两点要求等于留给儿子的遗嘱。

吴庆星牢记了双亲的嘱托，1986年就回大陆探望故土。秃秃的石头山，曲曲的红泥小路。他的故乡山边村被时代甩到后边去了，竟然是泉州市为数不多的重点扶贫对象。400多口人的穷山村，人可耕地不足半亩，人均年收入200元左右。这里甚至没有电……

这一切，同他那正兴旺发达的事业形成巨大的反差。吴庆星的心隐隐作痛，“饲料大王”的故乡却是一个“扶贫对象”。一向坚毅的他的双眼竟有些湿润。他一下子理解双亲深沉的寄语……

他从报上了解到：1985年世界各国人均教育经费，美国为968美元，加拿大为947美元，甚至非洲的坦桑尼亚也有13美元。印度为10美元，而中国只有8美元，属最低的，而他的故乡山边村又是中国最低的，连学校都没有，适龄儿童到邻村就学的也为数不多，考上中学、大学的更是寥若晨星。21世纪的竞争是科学教育的竞争。吴庆星感到改变家乡面貌的一副重担落到自己的肩膀上。

一次又一次地回乡考察，一次又一次与专家、学者论证，吴庆星先生首先推翻了捐建小学的计划，继而打



消兴办中专的设想，一幅新的蓝图，在他的心中逐渐铺开、形成。

故乡的子弟确实需要一所小学，但更需要一所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迅速治穷治愚的高等学府，这里种植、养殖资源十分丰富，可偌大的福建省却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吴先生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发展当地急需而又薄弱的动物科学、养殖科学和生物工程等学科，在创办学校的同时，还兴建与教学相关联的企业、实验室、研究室等，为学校补充养分。

他从双亲吴善仰、杜恩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成立了旨在兴建学校，培养人才，开发家乡，从事公益事业的仰恩基金会。他的标准是不但要把仰恩学校办成国内一所优秀的模范学校，还要争取与国际上的有名学府相媲美。

吴庆星先生要在山沟沟里办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

山边人真诚，他们用泥黑的手接过吴先生的洋烟，牵拉着脑袋只是闷闷地抽。

“说呀，你们心里有什么话都说呀！”吴先生望着他们。

他们张了张嘴，就把心里话掏出来了：“吴老板，您捐几个钱给乡里就算了，何必自己折腾？您那边也忙得很，说走就得走，您能下半辈子就拴在咱这里？”

于是，他们讲了很多，哪村的番客捐钱给村子里修了路，哪村的番客

捐钱盖一所医院，哪儿的番客捐钱建一个公园，哪儿的番客给学校盖一个礼堂，还给乡里的远亲近戚几千几百……人家人都不用回来，找个知根知底的人代办就行啦！

见吴老板不吭声，只是笑，他们又放胆地把难听的端了出来：“人都在说，这么大的学校，建在北京、福州、厦门，建在大都市里还差不多，您把宅建在咱这山兜里，草都长不旺，树都长不高，您这可是好花插在牛屎上啊！”

“好琵琶挂在墙上，有什么用？”吴庆星用这里的民谚俚语同乡亲驳难，“乐器不管好歹，关键在于奏出美妙的曲子。”

山边人似乎明白了一些。他们看到吴老板眼睛亮亮的，仿佛说，草不旺就让它长旺，树不高就让它长高，仿佛他要点土成金。

于是，山边人发现，吴先生常常天蒙蒙亮就从20多公里外的泉州宾馆赶到工地，他坐不住，成天拿着那根山藤拐杖，在方圆10多里的校区转来转去，一天总得跑上几个来回。他要的是“效率、质量、美观”。有一次，豪雨如注，山洪暴发，吴先生踩进没膝深的水中，亲赴现场去排洪……

于是，山边人发现，吴老板的好几个生日是在仰恩工程工地上度过的。即使平时离开仰恩，人在海外，每天也要通上电话心里才踏实。用熟悉吴先生的人的话来讲，吴老板办学入迷了。

几乎与捐建仰恩学校的同时，吴庆星的爱子因病长年住在北京协和医院，生活不能自理，与病榻、医务人员为伴。吴先生如同常人，也有膝轭之心，一到北京必定选到院看望望独生子，每每相对垂泪；平时却只能通过电话向太太询问了解孩子的病情……

仅仅一年半的时间，一座六七万平米雄伟壮观好似布达拉宫的大学城就在仙公山旁拔地而起。

人们原以为，吴老板这样的人出门坐汽车，在家住洋楼，吃穿不用愁，到了80岁也不会老。可是，盖一个学堂竟要他花这么大的心力？连头发都变花白了，回头一想倒也是：他宁愿冷落遍布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业务，他对自己的心头肉也不能兼顾，为的是不愿在“仰恩工程”上稍有分心，为的是千百个“儿子”站到他的身边来，为的是民族教育的振兴。这怎么能不老得快呢？！

1988年，由国家教委和华侨大学共同管理的仰恩学院正式招生，招收了四个专业的200名学生。香港泉州同乡会会长陈守仁先生参观后，连声赞叹“仰恩工程的速度和效率，不仅在内地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在香港和国外，也是一流的！”

吴先生的事业是感天动地的事业。他确实感动了天地。在吴先生第10次回乡时，当时的福建省省长、现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为他举杯表示敬意，第50次，原福建省省长、现对台办主任王兆国代表2000多万八闽乡亲向他道谢。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批示有关“仰恩工程”事宜。李铁映、叶飞、费孝通、王汉斌、王任重、陈俊生等中央领导人也充分肯定他热心捐资办学的善举。

饶有趣味的是，在仰恩大学不远处，有一座为纪念匡扶唐室的将军而建的康济庙，庙前有副对联这样写道：

**康国康家康安四境  
济时济世济民千秋**

吴先生戮力于仰恩工程，不也是一件“济时济世济民千秋”的壮举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林兰英教授在仰恩工程开工不久后说，吴先生很有眼光，办学选取的地点非常好，大有发展前途。以畜牧饲养为主的专业搞好了，可以推动国内教育和科研的进步，





像吴先生这样的海外乡亲再多几个，对我们国家将有很大的帮助。

小山村办起大学城，吴庆星父母的遗愿实现了。按理说，他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吧！

不！从仰恩学院正式创办起，他一直构想着仰恩工程的未来，他思索着中国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20世纪以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实验师范学校、梁漱溟先生从事的乡村建设活动，晏阳初搞的定县教育实验，都表明了一种对农村改造的关注和努力，也表明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至为艰巨的任务。特别是陶行知先生不仅要把晓庄办成一所传统的书本学习中心，而且要使之成为乡村管理、防止盗匪、农业研究、文化更新、经济计划等等的中心的设想，更给吴庆星先生以启迪。

吴先生讲起这样一件事：他在香港曾经接触一位从大陆出去的大学生，谈起理论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而做起事来则捉襟见肘，无所适从。从那时起，他就感到，中国的大学理论知识并不差，缺乏的是理论没有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缺乏的是动手能力、实干精神。因此，他希望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之初，按照新的模式、新的办法，在全国大学林立的情况下，创办出一所独树一帜的大学，并作为一个“突破口”，带动规模宏大的“仰恩工程”向前发展，走出一条港胞、侨胞独资办高等教育的新路子，力争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有所示范。

于是，大学生一入学，他就破天荒地组织他们去军训，可军训完了之后，他又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不许他们同军人通信。

他还在学校里天天早晨升旗，唱国歌，学生睡懒觉，他就用山藤拐杖去敲学生宿舍的门，把他们统统轰起来，让他们去向国旗敬礼。

他的一招一式都怪得叫学生对他又敬又怕：在我的大学上学不许谈恋爱。老头急了会举起拐杖，用它指着学生的鼻子尖：不会说英语，不会开车，我就不允许你们离开校门。

有一回，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跟学生一块儿排队吃饭。管理员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吴老板吗？原来大学生反映饭菜不好，老头一看果然属实，老头又发火了，山藤拐杖笃笃

地敲着食堂的地板。老头有高招儿，他办两个食堂，让他们两边搞竞争，闹得两边都不敢怠慢。

……

汤恩比曾提出，教育的本质不应以谋实利为动机，而是要寻求与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心灵交流，因此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吴老板办仰恩大学，人们说他也是几近宗教性质，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

目前，仰恩学校已由原来华侨大学所属的仰恩学院转为福建省高教局主管。为了使仰恩大学能够长期办下去，吴庆星先生在办学之初就确定要有企业来支撑它。因此，建立了一个又办学又办企业的仰恩基金会。其资金来源注明：

以吴氏家族中所有成员为会员的仰恩基金会会员，均有义务捐助支持基金会的基金；

凡属吴庆星名下在福建省投资兴办之各项企业，每年必须从各企业之盈利余额中拨出15%~25%存入基金会指定之银行账户储存；

凡属吴庆星名下在福建省与他人合资兴办之企业，每年必须由吴庆星股份之盈利余额中拨出15%~25%存入基金会指定之银行账户储存；

若以上三项之来款不敷支出学院（即仰恩大学）所需时，则由吴庆星另外拨款给学院。

几年来，吴庆星先生斑斓而大胆的构想，在这片落后的土地上正逐步成为现实，昔日贫困的泉州市郊马甲乡，已成为福建省和泉州市日益增多的成片开发区的样板。

于是，山边村人看到大学城盖起来了，学校办得非同凡响，甚至连中央首长江泽民总书记也看到他们山边村了。

于是，山边村人看到秃秃的山戴了果树，里边还有含汁水最多的芦柑。

于是，山边村人看到村子里办起了养鸭场，一年里养了几十万只鸭子。吴先生还发话：利润不准用到国外去！

于是，山边村人看到福州厦门公路旁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协昌饲料厂，听到厦门特区将矗立一幢几十层高的昌林大厦……

此情此景，要是显灵的仙公看了，也会吓一大跳的。

山边村人说，吴老板够风光的，既



光了宗，又耀了祖。

而花白了头发的吴庆星先生却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风光风光。他站得更高，想得更远——

他早在1988年仰恩学院成立之时就定下一条校规：学生每天清晨必须举行升旗仪式，列队唱国歌。他不止一次地对学生说，做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热爱自己国家的旗帜，一定要懂得唱国歌。

1990年7月，中央电视台派员来仰恩大学拍摄纪念片，吴老板只是让记者拍摄仰恩大学有关资料，自己就是不露面。后来，经记者和朋友们再三说服，才让记者拍上几个他本人的镜头。

有人曾这样问过吴老板，你用这么多的心血，投了这么多资，构筑集教育、科研、生产、商贸于一体的仰恩工程图的啥呀？依然爱动肝火的吴先生用他的山藤拐杖敲着故乡的红土地说：教育不行，咱们到了下个世纪还不行。我这是不让故乡输掉未来！

责任编辑 卢弘



溥仪“寓居”天津的七年间，是其思想意识发生巨变的重要阶段。本文以翔实的笔触记述了溥仪如何在封建帝王思想的支配下，不惜卖国求荣，开始自觉从事复辟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昭示人们：这样一个卖国投敌的大汉奸在解放后居然被改造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新人，说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 末代皇帝

王文锋

# 「寓居」天津始末



## 张彪愚忠 逊帝倚重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在北府暂住几天后，于同年12月18日跑进了日本公使馆。在这里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1925年2月23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决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箱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黑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箱几乎全是穿黑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团团包围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当夜溥仪等人直奔日租界内官岛街的张园。张园的主人张彪，清末曾任湖北省提督兼陆军第八镇统制官。武昌起义时，张彪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张园占地面积12000多平方米，修建精巧、环境幽雅、设景别致，垒石河山、池桥亭榭齐备。园中央的水亭颇具巧思，由亭柱内暗藏自来水管到顶，尖端有珠另配双龙，拧开水龙头推动球成“二龙吸珠”之状。园内的主体建筑“平远楼”，是一座三层壮观大楼，张彪于1917年建成。

溥仪突如其来，张彪受宠若惊，马上亲自去准备一切，在英商经营的惠罗公司购买上好的铜床三张和全套的外国被褥，又令家人赶制上百件床上用品。在津的遗老遗少也闻讯前来进奉各种用品。

张彪对于溥仪的到来，却极尽供奉之能，逢年过节，特别是溥仪的“万寿”之日，婉容的“千秋”之日，都要供入各种贡品。有新奇的国外表演到津，张彪都要专召作“御前”献技。为了确保溥仪的安全，张彪不许

园丁靠近平远楼。当时张彪虽已年近七旬，但为了表示对溥仪的忠心，还坚持每天清晨亲自打扫院子，整剪枯枝。

溥仪来到张园后，立即下了两道“谕旨”：第一，改北京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第二，任命郑孝胥、胡嗣瑗等人为驻天津顾问。军机处下设四个处，总务处由郑孝胥任事；庶务处由佟济煦任事；收支处由景方昶任事；交涉处由刘骥业任事。这些遗老遗少们，加之溥仪带来的随侍仆役们一起涌进了张园。园内的房舍无法容纳，张彪又筹资在园内右侧动工兴建了相连的木舍四间，专供军机处使用，又专辟一间做为候见室，竭力要把这里装扮成皇帝出巡时传旨转奏的“行在”之地。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整个平远楼的房间也不够溥仪使用。张彪为了使这位“蒙尘皇帝”增加起居空间，又在平远楼加筑了第四层，以便放置台球案子，钢琴、大餐桌等。为了防止建楼工程惊了“御驾”，每天开工晚，收工早，又不许发出大的响动，只许悄悄地慢慢进行，所以工程日期拖延了好长时间。

溥仪对于张彪的忠心，深加赞许，张彪病重之时，闻讯亲临探视，并令他的御医参与医治。张彪死后，溥仪特派宗室公爵前去祭奠，并赐祭一坛，赏盖“陀罗经被”，并颁给“心如金石”的匾额。出殡之日抬出24座黄色彩亭，都是溥仪所赏赐的物品。

溥仪自从来到天津之后，受到了日本极为特殊的保护，日本人在溥仪心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了，认为日本人是助其恢复祖业的最有力的力量。同时溥仪和美、英、法、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驻津司令官、总领事、领事等也都保持着频繁的人际往来。

## 幻想破灭·依靠列强

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1925年6月，张作霖在天津他的行馆派人去请溥仪，希望和他见一见。如果不是为了复辟大计去拉拢这个实力雄厚的大军阀，对这样的要求溥仪是无法容忍的，更谈不上“御驾”亲行了。溥仪降尊冒险第一次走出了日租界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不但在大门口亲自迎接溥仪，还跪在砖地上给他磕了头。这不但把溥仪从“降贵纡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而且使溥仪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这对溥仪的复辟野心是最好的安慰。从此开始，溥仪和奉系将领

之间也进行了紧张的联系，“我在天津的七年中，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溥仪到天津后不久，当时任直隶督办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即来拜访他，不但大骂冯玉祥“逼宫”，还特别表示对溥仪的同情和支持，手拍胸膛说：“到了天津，您便可一切放心，我将尽保护之责。”这固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些中国将军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但溥仪听的却十分受用，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特别是1926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而是盯在溥仪手中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一个叫刘凤池的失业小军阀，曾向溥仪建议让其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



溥仪寓居天津时所住的张园（现为天津日报社址）



天津生活与弟弟妹妹

表之类交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一些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希望。

东陵事件发生后，打破了溥仪依靠军阀政客实现复辟的幻想，从而加速溥仪靠外力图谋复辟的步伐。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1928年，军阀孙殿英将乾隆和慈禧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这件事给溥仪极大的刺激，认为这是一件和他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溥仪在张园摆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把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气氛之中。溥仪悲痛已极，冲着先祖的灵位发誓“祖莹被掘，此乃是我身为后世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溥仪的心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军阀、政客实不可用，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从以往的“依赖”和“利

用”，转向于“敌视”和“抛弃”。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溥仪与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天津领事、驻军司令官，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巴结，加紧“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卖国投敌道路。

在天津时期，溥仪十分信任郑孝胥，郑的思想、言行对溥仪有较大的影响。郑孝胥认为：复辟清王朝必须走“共管”的道路，也就是把帝国主义列强请到中国来，组成“共管中国委员会”，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共同掌握中国的政权。

在郑孝胥“共管”的思想影响下，溥仪起初也并没有把“图谋恢复”的希望单一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他曾一度将“借助外力”的幻想寄托于英帝国主义，和英国驻津历任司令官有过交往，彼此之间互相宴请。用溥仪的话来讲是“交流情感、增进了解”，每年的“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公祭“无名战士纪念碑”和阅兵式时，溥仪都应邀前往参加。英国王乔治五世的三皇子来中国时，还特意访问了溥仪，并表示“大英帝国把未来清王室的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英王的“关怀”和“鼓励”，使溥仪受宠若惊，感恩之余，无所相报，溥仪亲自在他的照片上签名，请英皇子转交英王，以表他的谢意。

在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的同时，他又与意大利驻津司令官取得联系，把闻名于世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

“政治谋略和才能”奉若神明。意大利驻津司令官离任回国之际，溥仪抓住这一谄媚的机会，亲笔书写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请其转交给墨索里尼，以表他的崇敬之意。

由于溥仪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频繁接触，美、英、法、德、意等国的驻津司令官，经常往来于张园，举行盛大的酒会、宴会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溥仪为“皇帝”或“陛下”。溥仪正是想通过这种浸透着肮脏政治交易的社交活动，取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植，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此时，西方各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失去了独占中国的可能，他们为了保住仅有的在华利益，对于溥仪的境遇，只是在表面上给予“关心”和“同情”，实际上却是“敬而远之”。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的野心，在加紧筹划军事侵略的同时，正在煞费苦心的寻找他们在中国实行殖民主义统治的代理人，他们早已把注意力集中在溥仪身上。从溥仪被赶出北京故宫，日本方面就表示了异常的“热心”。到了天津之后，一方面给予溥仪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严密监视溥仪的一切活动。日本人精心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场面，满足溥仪的复辟欲望。无论是日本的军人、外交官，还是政客，都对溥仪极其“关心”和“尊敬”。

溥仪参观日本侨民学校，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溥仪欢呼万岁。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天津的边缘，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特意来到张园对溥仪讲：“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溥仪在海河边游逛，日本海军将校列队向他致敬。日本人导演的这一切收到了成效，使溥仪感到日本人是从心里对他表示尊敬。

溥仪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邻邦，两国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上十分接近。他特别羡慕日本“忠君亲上”的“天皇制”，认为这是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国，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在制度上的根本保证。中国军阀混战的连绵不断，就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实行“帝制”。而日本正是复辟大清的第一“借用力量”，这样绝好的外援，不依靠它还能依靠谁呢？溥仪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选择，终于把“借助外力，恢复大

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

## 潜出天津 卖国求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溥仪这时已迁到租界内协昌里的“静园”，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借助日本的武装力量，实现“恢复祖业”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

日本方面此时在确定殖民统治代理人的心情更为迫切，已经确定了侵占东北后殖民统治的方式即“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同年的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请溥仪到他的司令部去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溥仪兴冲冲地前去会见了日本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和遗老罗振玉。上角谈了事变后东北的局势，并向溥仪提出请其去东北的意思。罗振玉拿出了照给溥仪的信，信中劝溥仪速去东北主持大计，罗振玉从旁极力怂恿溥仪速下决心，答应照给这一为他们设想的要求。香椎浩平也趁势劝溥仪去东北主持大计，如其愿意前往东北，日本可派军舰来接，可保万无一失。尽管溥仪有着即刻返回东北的强烈愿望，这又是他梦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又怎能不愿意去干呢？但此事关系到溥仪的前途命运，溥仪表示容他回去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1931年11月6日《天津益世报》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土肥原威迫溥仪赴辽，鼓惑日侨与华人寻衅。土肥原秘密来津，匿居日租界常盘旅馆，记者昨日分向各方调查，据可靠消息，土肥原确已来津数日，行踪诡秘，除少数日人外鲜有知者，闻其来津任务，系奉该国陆军省之命令，到津煽惑隐居津门之清废帝溥仪赴东北组织独立政府，并鼓动在津日侨，与华人寻衅，造成不撤兵之藉口，已与溥仪晤面数次；……用尽种种胁迫手段威吓，逼其前往有非去不可之事。”这篇报道基本属实。11月2日，土肥原确实前往“静园”与溥仪会面。土肥原为了实现溥仪前往东北的计划，施展出他的惯用伎俩，表现出异常的

恭顺，他满口“皇帝陛下”，请溥仪先赴东北，将要在东北建立独立自主的帝国，可由溥仪主持一切，并保证说：“日本会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一切都可由你自主，如果有任何外来力量胆敢对于这个新国家进行干涉，或是使用武力时，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积极援助，而和它作共同防御”。溥仪认为土肥原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完全相信了他所说的。

为了敦促溥仪按计划速离天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溥仪住宅发现炸弹，装于鲜果筐内，与复辟运动有关。”恐吓信、威胁的电话接踵而至。土肥原会见溥仪后，于11月8日晚亲自策划了“天津骚乱事件”。土肥原指使日本浪人和汉奸，在临近日本租界的中国管区制造事端，勾引中国驻津部队出动平息骚乱。借此时机，日本驻屯军也调动部队，占领了日本租界以外沿线，并全部实行戒严，土肥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告此事的目的：“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的一幕”。

溥仪会见土肥原后，便悄悄地做好了潜行前的准备。11月10日下午，溥仪唤来亲信的随侍李国雄吩咐道：“我今晚要走，晚上不让开车的佟公勇进车房，让他在车房外等着，按照我想的办法，我藏在汽车的后箱里，到时你把车后箱盖上。”

夜幕刚刚降临，溥仪从楼上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到了车房后，李国雄正准备扶溥仪上车，这位“皇上”却异常灵巧地自己跳上了车，钻进了车后箱里，紧跟着后面那个人也上来往里钻，李国雄这才看清，原来是另一名随侍祁继忠。两个人钻进狭小的汽车后箱内，大半截身子仍露在外面，溥仪见状十分着急，命令李国雄赶快盖好后箱盖，李国雄使出了全身力气，终于盖上了后箱盖。

李国雄关上后车箱盖后，马上让佟公勇进车房，把这辆“空车”开出去。这辆天蓝色的敞篷小汽车刚开出静园，早就等在那里的两辆黑色轿车便一前一后将装着溥仪的跑车夹在中间，直奔日本人经营的“敷岛料理店”，把司机佟公勇先轰到一边，打开后箱盖，这位昔日养尊处优已极的“皇帝陛下”面色铁青，非常狼狈地钻了出来。溥仪在痴心妄想着他即将坐

上的“皇帝宝座”，又对他此后的前途命运危惧不安的思绪中换上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日本军帽和军大衣，换乘日本军车到了约定的码头，同早已等在那里的郑孝胥等人一起，上了“比治山丸”号汽船，闯过了中国驻军哨卡，偷渡过海河，半夜时分抵达大沽港外，登上了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淡路丸”号日本商船，溥仪离开了他“寓居”七年的天津。（责任编辑：晓渡）

“日满议定书”签字后合影



1959年12月4日 晓渡特稿

流氓大亨杜月笙，是旧上海的闻名人物。他怎样从一文不名的小瘪三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的呢？读者将通过他的发迹史，了解到黑暗社会和腐朽制度曾经制造产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怪胎和毒瘤。虽然在全国解放以后不久，杜月笙就在香港病逝，关于他的那段历史陈述，却仍值得回顾和品味。

# 十里洋场的「怪胎」：杜月笙

乔还田

## 高桥镇的坏小子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由文士墨客另起雅号，生上加个竹字头，取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同时改名镛（因西方之乐谓镛）。不过，直至发迹之后，他随身携带的一枚金制小图章，上面刻的阳文篆字仍是“月生”。他于1888年8月12日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一个贫民家庭中。其父杜文卿在当地一家茶馆做“堂倌”，收入相当微薄。他的降生似乎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异常的喜悦，父母更没有做过希冀他日后显扬发达、光宗耀祖的梦，因为他出生时既不曾出现过所谓吉兆，杜家也未有过一个名宦、大贾。仅从不断香火而言，杜文卿把这个宝贝儿子视为掌上明珠。

这样的家庭自然不能给杜月笙带来锦衣玉食的少爷般生活。能填饱肚皮，止住他饥饿的哭声，母亲就心满意足了。幼时的营养不良，还给他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以至他成年之后常常自嘲地说，“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对于杜月笙来说，更不幸的是，在他来到人世间的第四和第六个年头，先后失去了母亲和父亲。母亲去世时还留下了一个刚满一岁的女孩，当他父亲支撑到精疲力竭时，只得忍痛割爱，把女儿送给了别人。失掉双亲的杜月笙只得由外祖母和舅父抚养。可是，舅父家的生活也不宽裕，杜月笙仅上了几个月的私塾便辍学了。

一个七八岁的幼童能干什么呢？辍学之后的杜月笙毫无目的地在镇上游荡，结交了一群游手好闲的少年。到13岁时杜月笙变成这群坏小子的头。他的胆子大的惊人。一次，在赌棚里耍钱的大人对他讲：“你也来个注吧？”“下注就下注！”杜月笙遂即把父母遗下的破布烂棉花、残缺不全的家具、锅盆碗筷、瓶瓶罐罐，凡是能换几文钱的，全部卖的精光。顿时，在亲友父

老心目中，他变成了高桥镇的败家子，无可救药的“小瘪三”，鄙视和漫骂纷纷向他抛来。

杜月笙的所作所为，使他舅父恼火到了极点。一次，当他把舅父给他贩卖大饼油条的钱输光，并且行窃时，舅父一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大门。随后，自以为是男子汉的杜月笙自来到上海滩，开始了流浪生活。

当时的上海滩已是冒险家的乐园。一些赌徒、骗子、扒手、乞丐也以上海为其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的理想场合。13岁的杜月笙当然也渴望在这里捞一把。

杜月笙流浪到上海滩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在十六铺。那里商号林立，水果、海鲜、山货等批发商号鳞次栉比。小街巷里，则满是小赌场、小烟馆、公开和秘密的妓院，以及吸烟、赏“花”的所谓花烟间。一些流氓、地痞、嫖客常常麇集于此寻欢作乐。杜月笙初到上海，仍以乞讨为生，不久，便结识了“宝大”水果行的人，就向他们要些将要扔掉的烂水果，再去码头停泊的水果船上捞些新鲜的，到小街巷或烟馆等处叫卖。虽然能挣几文钱，但生活照样饥一顿饱一顿，衣衫褴褛不必说，夏天常常赤膊短裤。这时，他得了两个诨名：“水果月生”，“蜡光月生”。

## 拜“麻皮金荣”为师

杜月笙在十六铺混了几年，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还参加了码头上的“八股党”和“十股党”。这些俗称小瘪三的人，或者一起欺骗初到上海的农民，或者偷盗码头上的行李，或者兜揽海员的私货。因常常能捞到一笔笔可观的外快，杜月笙还不时到赌场和妓院去过瘾。他先是蹲在马路边掷骰子、押单只，遂又进赌棚推牌九、搓麻将。当时，十六铺码头有个“大亨”叫陈世昌，他见杜月笙机灵、精明，就收为弟子。至此，杜月笙便和“清帮”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帮”原是明末清初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秘密结社，后演变成社会恶势力。它的帮规很严，主要有以下十条：一、不许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扒灰放龙（指不准



杜月笙控制的大烟馆“燕子窝”



杜月笙。1927年蒋介石利用杜手下的流氓爪牙们帮他清除在上海的共产党

王亚慎



吃里扒外，出卖帮里)；四、不准奸邪淫盗；五、不准江湖乱逆；六、不准引水带跳；七、不准扰乱帮规；八、不准以卑为尊；九、不准开闸放水；十、不准欺软凌弱。除十大帮规以外，还有一项更严格的规定：必须确守帮中秘密。任何人进了清帮，便得“上不传父兄，下不传妻儿”。即使在自家帮里，也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即所谓“师知其徒，徒识其师”。倘若彼此要联络，务必按秘本上规定的切口、动作、手势等种种暗号进行。据传闻，清帮辈份原来只有“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20个字，但到清末，因20个字已用完，遂又补添了大通悟学四个字。陈世昌为“通”字辈，杜月笙拜其为师，只能算是“悟”字辈。

有人说过，要是杜月笙一直在陈世昌手下做事，想必今生也不会有大的“出息”。这话有道理。因为陈世昌这个“大亨”毕竟是以“套签子福生”(用竹签套红绿线欺骗路上上当的一种赌博玩艺)闻名，和黄金荣等大亨相比，又要矮三分。但命运之神似乎注定要让杜月笙发迹。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杜月笙结识了比他大20岁的黄金荣，黄金荣也很赏识这个机灵的小伙子。于是杜月笙拜黄金荣为师——通过黄金荣的门槛，他也渐趋成为一个“大亨”、又一个“海上闻人”。

说到黄金荣，现今上海的一些老人仍不寒而栗。黄金荣原是苏州书店裱画出身，幼时出天花，留下一脸麻子，背地人称“麻皮金荣”。大约在1900年他流落到上海。由于他与谱拳术的丁顺华和有“黑皮子卿”之称的

程子卿气味相投，便结拜为兄弟，黄是老大，丁是老二，程是老三。24岁时，黄“考”入法租界捕房，遂利用郑家木桥一带的狐朋狗友，为捕房侦破一些盗窃、敲诈案件。因年轻力壮，心狠手辣，很快擢为探长，并在洋场取得“海上闻人”的雅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结交卢永祥、何丰林等，稍后认蒋介石、杨虎等为学生，于是更加出名。黄金荣利用其势力勾结法国领事承包花捐、赌捐，包卖鸦片烟，控制土行妓院，并设轮盘赌场，插足于娱乐场所，并进而开办大旅馆、大饭店、银行、交易所，成为腰缠万贯的上海大亨。杜月笙作为黄的徒弟，则更胜师傅一筹，以至能后来居上。

## 从“黄、张、杜”到“杜、黄、张”

杜月笙发迹之后曾对他的一位知己说过这样一段话：“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500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1000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罗。”

杜月笙这段由泥鳅而化鲤为龙的自喻，似乎是心里话。想当年，他为了向上爬，的确煞费心机。初进黄公馆的杜月笙，仿佛变了一个人。他沉



张啸林

默机警，事事留神，平时除了奉公差遣，经常足不出户。嫖赌两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竟然全部戒绝了。他后来形容自己当时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抱有战战兢兢的心情，怀着跃跃欲试的意志。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人心诚，做事巴结，头脑灵活，尽心承旨。没多久，黄金荣夸他“绝顶聪明”，并把他视为自己的智囊和亲信。由于杜月笙“成就多，表现好”(黄金荣的口头禅)，黄论功行赏，一次酬了他10万元，杜就此开始成为一位“大亨”。

当时，在黄金荣门下还有另一位得力助手张啸林。他开始时是杭州的一霸，后迁上海，把“洋场”作为巢穴。他和杜月笙一同出入于黄公馆，在上海滩青帮中逐渐形成了始为“黄、张、杜”，继变“黄、杜、张”，后为“杜、黄、张”的“三大亨”格局。

杜月笙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过他的老师，这自然与他自身的钻营分不开，但黄金荣的一次“过

失”，也为杜月笙飞黄腾达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那是1924年仲夏的一个夜晚，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看戏时给黄金荣的相好名伶露兰春喝了倒采。这下激怒了在场坐镇的黄金荣：“竟敢在老子头上动土！”于是，一声吆喝，一群徒弟徒孙把卢公子痛打了一顿。但卢公子不是好惹的。一两天过后，卢永祥通过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派了一批带枪的便衣冲进剧场，不但当场刮了黄金荣的耳光，还把他抢上了汽车，关进了护军使署的看守所。黄金荣整整被关了7天，释放后，因大失面子，只得“退归林下”。在营救黄金荣的过程中，杜月笙从中策划一切。他一方面稳定帮里因“老板”被抓后引起的纷乱情绪；另一方面用巨款贿赂何丰林及其部下，并向卢公子保证来日不予报复，这才把“肉票”赎出来。黄获释后，他与张啸林就渐趋能与黄平起平坐了。又由于杜比张工于心计，处处高出一筹，未久，便凌驾于黄、张之上。

## 走私鸦片

杜月笙突然发迹，据说有个重要“秘诀”，就是“成功”地经营鸦片生意，获取了暴利。他入“黄门”不久，黄金荣见他精明过人，就把法租界最大的一家土行承包给他。那时，杜不仅亲自运销毒品，而且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如1923年某日的《时报》就透露了一次杜半路劫夺“私土”的情况：“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即杜月笙）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2时许纠集党徒10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

当时，杜月笙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一是自己的机要秘书徐采臣，一是金廷荪。金、徐手下又有楼银川和吴世宝等，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由江轮运到上海的鸦片，遂用汽车送到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宝康里潮州、大埔人开设的土行，再由土行分销各处。金廷荪因贩鸦片发财，日后还为自己造了一座考究的大住宅。

自从黄金荣“退居林下”之后，法租界10家大的鸦片商，全由杜亲自控制起来。有了地位杜月笙再也用不着亲自出马经销鸦片，而只需坐地分赃便可腰缠万贯。那么，他是如何控制这10家大烟商呢？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出一大笔钱“孝敬”他以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他照例把10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谁也不敢讨价还价，只得如数“孝敬”。

做鸦片生意虽能带来大把大把的钞票，可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搞不好要入狱，甚至掉脑袋。杜月笙为什么敢有恃无恐地做这种买卖呢？秘密就在于他有政府要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作为后台。杜月笙与蒋家王朝的特殊交情始于1927年初春。那是蒋介石率北伐军抵沪不久，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大流氓就积极充当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打手，参加了“四一二”政变，协助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工潮，向工商金融界勒索巨款，制服资本家的反抗，俨然一支活跃于租界之内的反革命别动队。蒋介石则不遗余力地回赠流氓们体面的政治、社会地位。并誉其为“反共义士”；委任黄、张、杜为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党国要人降尊纡贵，频频出席他们的宴会……。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尽管鸦片毒害民众，但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取之不竭的财源，因此采取了一种明禁暗不禁的做法。更滑稽可笑的是，当政府迫于国际舆论，于1928年8月28日成立“全国禁烟委员会”时，竟请杜做了其中的一位委员。

既然政府能为杜月笙做鸦片生意开绿灯，甚至加官晋爵，杜月笙对南京财政上的帮助自然也很慷慨。据透露，他曾花费几万元，一架接一架地购买美国飞机捐献给政府，有一次，竟整整提供了一中队飞机。1936年，为

祝贺蒋介石50大寿，杜慷慨地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飞机上醒目地漆着：“上海禁烟局”字样。对于这事儿，上海英国人俱乐部里爱说笑话的人讥讽道：杜“终于找到一个办法让上海禁烟运动起飞了。”

有时，杜月笙也会跟政府的某些要员闹点矛盾。此刻，社会审时度势，必要时使出杀手锏。一次，他刚付给宋子文600万元就反悔了，要求退回，宋子文却不还给他现金，而给他政府债券。对此，杜月笙颇为不快，因为他明白这些债券是没有价值的。为了给宋一点颜色瞧瞧，他指示手下人进行了一起枪击宋的事件。193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以《子弹没有击中宋》为题，刊登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四名未遂的刺客在开枪。当烟雾消散时，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我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却一点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显然，刺客们得到指示，决不能击中宋，只要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就行了。

杜月笙从事鸦片走私，在国际上也是知名的。1934年，一位名叫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的女士，很想了解杜氏与走私鸦片烟及中国禁烟的关系，遂从欧洲远道而来，采访了杜月笙。据说，在杜月笙一生中，准许一个西方人采访，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次。10年以后，休斯女士以《鱼翅和小米》为题公开出版她那次专访杜月笙时写的日记。她是这样描述这位大亨的：“他是中国显然最有权势的人物，连政府也不得不尊重他的权势……杜月笙在中国从事鸦片生产，整船整船地进口伊朗鸦片，出资从事毒品加工，而中国的几乎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有一份利润。此外，他是势力强大的



国际贩毒集团的中国合伙人，而这个集团的活动已经开始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和拉丁美洲。”

休斯女士还具体描述那次专访的一些细节。她写道：她和艾梅、王贵松来到法租界爱亚多路143号。这是一座不大的相当讲究的红砖楼房，门口上方有一行金字：中汇银行。他们被领进一间考究的大会客厅，一群衣着讲究的中国商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谈话，另有12个带枪保镖站在客厅的各个地方。未久，当一个保镖宣布“杜月笙先生到”后，杜就出场了：“他身形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膊毫无目的地摆动着。身上穿着一袭弄脏了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一双邈邈的旧便鞋。长长的鸭蛋形的脑袋，剪得短短的头发，向后坡的前额，没有下巴颏，不过耳朵倒挺大，像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虫蛀的大黄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他拖着脚步走过来，不时无精打采地左右转动着头，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后面。……他把一只毫无生气的冰冷的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个沾满鸦片烟迹的两英寸长的灰爪子。”

因为杜是全国禁烟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休斯在采访中首先向杜提的问题是：有关中国禁烟方针。

据说，杜当时十分冷静地回答说：自己不是一位权威人士，仅仅是蒋委员长的禁烟委员会里的一名政府公务员。委员长作为禁烟委员会总监，是唯一的权威。杜接着概述了政府的方针：实行一种管理得当的垄断——对每一个吸毒者实行登记和配给，鸦片只卖给那些持有政府配给证的人，这是最好的控制手段，是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

在采访前，休斯听说海关查获了两批毒品，就此，她问道：“杜先生能向我说说这些毒品怎样处理的吗？”杜不假思索地回答：“查获的毒品都在官方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焚毁了。”当休斯提出异议指出查获的毒品送交了杜本人时，杜月笙马上愤怒了。他咆哮道：“我抗议！这是谎言！除了一部分以外，全部都销毁了，这一小部分，政府保存下来作为紧急储备。”说这话时，杜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茶几，吓得大厅各处的保镖们从盆栽的棕榈树

后面伸出头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 跻身工商界

杜月笙发财之后，有人劝他集资办一点工商业，列名实业界，这样，名望会变得“正派”，地位也能更加巩固。杜对这一建议，击节赞赏，随即张罗起来。他首先于1928年筹办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后又相继插足别的行当，诸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所办各项实业，“或为单创，或为合营。”1947年，他曾亲自填写了一份“履历表”，其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理事头衔者，有20余个。至于某些次要的，像一般中、小企业挂名董事、理事、监事等，连杜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个。那么，杜月笙是怎么当董事、理事、监事的呢？

话说1936年仲夏的一个晚上，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经纪人杨镜澄、王忠良、张松春、顾竹年及仓库主任黄炳权聚到一起，正为新近出现的业外巨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造成连日涨风，各经纪人对面粉涨价危机愁急万分；倘若再涨下去，他们都将破产。经过一番筹商，黄炳权于翌日清晨找到了大达轮船公司和扬州面粉厂经理杨管北。黄对杨坦率地说：“朱如山、钟可澄等常常出入杜公馆，你也是杜公馆的红客，倘能借重一言，用杜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数十万包，迫使当天跌到停板牌价，这样既可以压平涨风，解救许多经纪人的危急，还可以支持交易所，使之不受巨浪所倾覆。……所难者在于杜月笙是否愿被我们所利用。”杨管北意识到这一“良策”若能实现，对自己也有好处，即说：“此事大可做得。”两人同去杜公馆，没想到杜竟爽快地回答：“你们如果‘捏得准’，我也愿意帮忙。”后来，果然由于杜“帮忙”，朱如山、钟可澄与杨镜澄，王忠良等达成若干“协议”，面粉交易所才算渡过了危机。但正如杨管北所说的那样，“杜先生要么不踏进来，如果踏了进来，他是不愿居于人下的”。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经纪人当然不敢亏待这种人，作为“酬谢”，杜月笙遂被“选”为交易所的理事长。

据说，当杜接到当选理事长的公

函时，佯装推辞不就，并将原函退回。该交易所只得派了几位代表亲赴“杜公馆”敦促就职，杜经力劝才接受了这番好意。杜还当场表白：“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曲蟠（即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我一定帮忙。”杜月笙遂又提出两个条件：“一不到所办公，二不拿薪水。”后来事实证明，“不到所办公”确是真的，而“不拿薪水”，只是一种沽名钓誉的骗人把戏。

## 建“杜祠”

大概是为了荣宗耀祖吧，发迹之后的杜月笙于1931年在家乡浦东高桥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杜氏家祠。该祠五开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只张开血盆大口、盘弄绣球的狮子。一些老上海普遍认为，“杜祠落成典礼”是杜月笙生平最引起轰动的杰作，其场面只有清末大官僚大巨商盛宣怀的出丧及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可以“媲美”。

典礼活动从6月9日正式开始。事前，蒋介石除以总司令名义送了一方“孝思不匮”的大匾额外，还以主席的名义送了一幅祝词，并派私人代表杨虎到场宣读颂词。段祺瑞、吴佩孚、张学良、于右任、班禅喇嘛等也送了匾。张学良送的是“见义勇为”，吴佩孚送的是“武威世承”，于右任亲题“源远流长”。其他一些南京、上海的党、政、军、绅、商要人，则亲自前来参加典礼；外国人中，有法租界的总领事、领事、法捕房总巡、日本总领事等。

据当时报载，庆祝活动一共进行了三天。由于来宾太多，“每日所开酒席，恒在千桌以上，然仍有多数来宾无法插足。车辆不敷分配，致宾客多徒步来往于浦东及高桥间”。

典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天中演出的6台堂会戏，而且全是京剧。此次大会串，南北名角，荟萃一堂，男女老少，生旦净丑，应有尽有，可谓京剧界一次罕见的“群英会”。

在这次堂会演出中，还发生了一场张啸林挨一记耳光的“趣事”。

原来，在演出中，前排保留了一些“贵宾席”，供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专座。一次，有位身穿国民党军服，貌不惊人的来宾，大模大样地坐在贵宾席上。总招待张啸林发现后，便令其走开，因为在张看来，此人不配坐贵宾座。由于张的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难以容忍，遂抬手抽了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下可惹恼了“张老板”，只听一声呼啸，徒弟徒孙们动起手来。在纷乱中，杜月笙闻讯赶到，不禁大吃一惊，他一面把面红耳赤、杀气腾腾的张啸林叫开，一面连声向那位军人赔礼道歉，请他安坐看戏，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原来这位貌不出众的来宾是张学良将军的私人代表，而张学良其时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杜祠悬挂的匾额，依次为：蒋介石、张学良，尔后才是段祺瑞、吴佩孚等元老派的。一位权倾一时的将军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上看戏。张啸林有眼无珠，吃了一记耳光，只能自认倒霉。

## 组织“恒社”

大概因为吃够了幼时不能从学的苦头，平步青云后的杜月笙对文人墨客、知识分子格外敬重，也正是因为他能礼谦文士，向有“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洪宪要角“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能和他倾心结交。上海一些报人，像王松年、赵君豪、唐世昌、余哲文、姚苏凤、朱庭筠、张志韩等竟向他执弟子礼。和那些舞文弄墨的人相交，则使杜月笙进一步积累了识见，丰富了应付人的经验。

到1932年，杜月笙开始注重外貌上和作风上的改变。他感到对人须“谦虚有礼”一些。于是在衣着方面，短衫裤外面，加穿了长衫、马褂。过去一班同道弟兄，短裤，拖鞋、拷绸衫，粗声暴气，阔步乱闯的人们看到他变了样子，也跟着仿效，同样长袍马褂，佯装上流人的模样。杜月笙曾表示，要不是自己以身作则，这班朋友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即使到了大热天，杜月笙在会客室里也不脱长衫。

为了广结海内外各路“豪杰”、贤士，杜月笙的智囊人物陈群、刘春圃、钱新之等向“杜老板”出谋划策，由杜

的得力徒弟陆京士等于1932年11月发起，组建了一个团体——“恒社”，英文名曰“Constant Club”（永久俱乐部）。其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社名是由陈群取的。他引据自强不息如日月这有恒的典故，以“恒”字为社名。社徽系圆形，中间一个大筵，旁有斜月（寓“月筵”名字），周围十几个星星环绕，寓意“众星拱月”。

对于组织“恒社”的意义，陆京士还专门发表过一通议论：“窃以为国家民族存亡之关键，在于国民组织力之程度。……而年来国内各项组织，形式上似甚勃勃，但究其实际，都以适当之条件未备，未能发生真实雄厚之力量。所谓适当之条件者为何？曰有中心，有恒心而已。无中心，则彷徨无所适从，向心力不坚；无恒心则团结不久，离心力必大。唯有有中心之领袖及有朋恒心之分子者，始足以称为现代化、合理化之组织。”在组建恒社过程中，陆京士颇为卖力气，而杜月笙对陆京士确也最为信任。陈立夫曾对人谈，陆京士的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杜临死前，曾电召在台湾的陆到港面诀。当杜收到陆拟到港的电报，竟不尽慨叹地说：“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见面后，杜牢牢抓住陆的手说：“好了，好了，你终于来了。”陆京士是杜月笙临终前电召的唯一一人。

恒社社员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杜月笙初期的弟子，多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和赌徒。第二类是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这些人在租界里怕绑票，有时还想占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以进杜门寻求庇护。第三类人是自己虽在社会上有活动能力，但有时不能畅所欲为，入杜门旨在以展个人“宏图”。

当时入杜门也不是一件易事，还得找关系、“走后门”。首先要找和杜有交情的人向杜说妥，次一步通过杜的亲信安排。“入门”时，先用红帖子开明自己的祖宗三代，并写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的字句，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然后遵照约定日期备齐礼物，持往杜家行礼。最初要向杜叩头，后来改成三鞠躬，如有多人同时拜门，可集体鞠躬。若是“头面人物”入门，

“老师”还得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

恒社成立后的第二年，亦即“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做了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恒社中人，由于杜的关系，一部分参加了运输、慰问、医药、征募、救济等工作；另一部分人参加了特务头戴笠的军统组织，杜、戴之间原来早就有关系，因此特务流氓进一步勾结，遂组成南京军委会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据估计，恒社最初的社员只有几十人，以后发展到近2000人。对此，一些文人墨客慨叹颇多。曾当过黎元洪总统秘书长的饶汉祥专门撰赠杜月笙一幅楹联，而杜也毫不客气地把它悬挂在住宅第一进的大厅，文曰：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 被王亚樵看中弱点

杜月笙在十里洋场虽说是一霸，不仅一般百姓不敢惹，就是众多国民党要员也不敢怠慢，然而却有一个人，使他大伤脑筋，有时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这位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名叫王亚樵，因为他发现了杜月笙的致命弱点。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清末在合肥地区从事反清活动，因遭通缉，逃至上海。由于他秉性倔强，好打抱不平，与人交往极重义气，得了个“上海滩上的小孟尝”的雅号。他在上海组织的“安徽帮”有数万人，其核心组织“斧头党”由一批亡命之徒组成。到二三十年代，王亚樵也成为上海的一霸，其势力虽不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但对这三位“大亨”，他却不买账，敢于摸这些“老虎”的屁股。1930年前后，他与杜月笙围绕上海轮船招商局“江安”号的归属问题，进行了一次较量，结果他让杜月笙丢了面子。

那是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接收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督办。当时身为董事长的李鸿章长孙李国杰颇为不满。于是，这位祖籍也是安徽的官商，通过在沪的同籍名流李次山和关云农，找到王亚樵，请其将赵铁桥干掉；如能如愿，定把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的用人

权及营业收入归王所有。王亚樵听说李鸿章的后代受人排挤，况且又是老乡，而事成之后还能得到重金，遂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指使党徒将赵击毙。1932年，李实践诺言，将“江安”号交给王亚樵。但王手下找不出理想的经理人选，只好请卓志敏出山，卓是“江安”号的前任经理。王亚樵的这着棋遇到了麻烦，因为“江安”号的现任经理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他仗此关系，拒不交卸，并请杜月笙、张啸林为其撑腰。杜遂向李国杰转圜，改给“江华”号。但王亚樵不愿意，这样双方就僵持住了。

王亚樵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一天夜里，王亚樵派人把张啸林住宅后院墙炸了一个窟窿，以示警告。张啸林不免有点紧张，他岂肯为了这点“小事”送了性命。杜月笙也意识到这事很棘手，明确表示不再过问。后来，张延龄又以船上生财问题为借口，仍拒绝交卸。王亚樵继续施加压力，命令300多名手持小斧头的弟子，簇拥着卓志敏登上“江安”轮，强迫张延龄交卸。张见此势，吓得魂不附体，随即到杜宅告状，杜却厉声斥责张延龄，令其马上交卸。张无可奈何地把船交给了王亚樵。

事后，有人曾问王亚樵：“假如杜月笙和张啸林也采取同样的手段，码头岂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吗？”王却自信地回答：“绝对不会，事前我已想好了。要知道，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小老婆几个，洋房几幢，财产几百万。一个人有了这些东西，就没有勇气同人打明仗，这是他们的弱点所在。我已准备好，如果这次他仍不交卸，我就把‘江安’号给炸掉，大家都不要。我就不信他杜月笙能主宰上海滩上的一切，别人怕他，我偏要同他争一争。”

王亚樵的确看中了杜月笙的致命弱点。就在这一年，他又主动与杜月笙进行了另一次较量。结果，杜仍未敢动王亚樵一根毫毛，而且还托人疏解。

原来杜月笙有个门徒叫孙绍民的，在上海浦东私设了一个制造吗啡的地下工厂，因与一职员闹翻，意欲开除，又恐其泄露秘密，遂将那位职员毒死，杀人灭口。那职员被害前，已有蛛丝

马迹被家属发现，其家庭遂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结果，家属也遭暗害。此事被王亚樵知道后，异常气愤，乃写信给杜询问根由。杜装聋作哑不予答复。王亚樵马上再函杜月笙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此信一发，王已有杀杜之意。杜接此书，不免恐惧，因为他素知王亚樵说到做到。为了避遭劫难，杜立即请许世英设法疏解。许世英即派同乡王某找王亚樵调解杜事，并捎去致王亚樵的亲笔信，说明杜对王并无恶意。经过许世英从中斡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 与宣铁吾交恶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因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生。当时蒋氏父子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表现忠诚，升为侍卫长。在黄埔期间，宣铁吾与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成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抗战期间，宣任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宣与蒋经国观点一致，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点名让其任上海警察局长，后由于荣德生绑架案，浙沪警备司令、副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宣又于1946年7月1日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的第一次谈话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的这一炮，无疑是要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而首先受冲击的则是杜门的第二红人万墨林。

万墨林也是浦东人，幼年学过铜匠，因和杜月笙有点“边皮”亲，被收为“杜门”听差，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月笙装鸦片烟，遂得到杜的信任，被提拔为客厅管事，后又升为杜府的总账房。据说，万的记忆力特别强，凡到过“杜门”的，他能很快了解底细，杜要和任何“关系户”通电话，他不

用翻电话簿，一下就可接通。日伪时期，杜月笙避往香港，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蹶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人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当时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编了一套套滑稽戏词，在电台上猛烈抨击万墨林这个最大的“米蛀虫”。为此，万墨林的手下大打出手，把筱快乐的家砸了个稀巴烂，筱的妻子被打成重伤。

为了“杀鸡给猴看”，宣铁吾首先下手令将万墨林逮捕。同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对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明白宣铁吾有蒋经国作后台，而自己的莫逆之交戴笠已死，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主张必须以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个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而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此话一出，万墨林已有杀头的危险。有鉴于此，杜月笙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

杜月笙有个门徒陶建芳，既和宣铁吾熟悉，又对杜唯命是从，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滑头人物。杜月笙把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的事交给他。但陶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找宣的部下郑重为商量，说万墨林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郑觉得不好推辞，就让陶看望了万墨林。由于郑帮了忙，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又悄悄来到郑家，杜一面向郑道谢，一面装得一副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误会”。郑不敢贸然得罪这位大亨，建议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的关节，如果能拿

到病危证明，就能试行交保就医。郑当时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万一弄来证明，也可公事公办，不承担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郑内心明白，落得顺风推舟，就擅自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宣铁吾得悉后，大为震怒，他一面斥责郑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事到如今，宣铁吾也只得向报界公布一条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时隔不久，郑重为和宣铁吾又谈起此事，宣明言并不是要把万置于死地，只是想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

关于宣杜交恶，还有一段插曲可说。

1947年杜月笙60大寿时，又邀海内京剧界名角，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了两天以示祝贺。宣也是个京戏迷，只要有名角，非看不可。他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如此盛大的群英会，宣怎么肯放过。但当杜月笙给他发了最好的二排请柬时，他又碍于面子不肯去。由于实在不愿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宣另外在第六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的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没有一个认出“宣司令”。当时的中国大戏院是个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掉下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顿时全场目光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遭到宣的拒绝。

## 儿子下狱后的反击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安，物价无止境地上升，通货无限地膨胀。当时，法币的票面出现了500万元的赫赫大数，法币的发行额竟达到了天文数字；物价的指数爬上了700万倍的

高峰，这种恶性循环的波动，已经快把整个社会经济冲到了崩溃的边缘。随着这种情况的演变，社会两极的分化，日趋剧烈。财富加速地集中，贫困普遍地扩大。一方面少数豪门、巨贾利用经济的动乱，投机操纵，一转眼就落得千百万亿的赚账；一方面是多数固定收入的薪金阶层，实际所得不断地降低，片刻间收入大打折扣。多少人因最低生活无法维持而自杀。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种对比在纸醉金迷的上海表现得尤为严重。

就是在这种充满危机乱源的情势之下，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批准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其主要办法是停止法币的发行；改发金圆券，规定一圆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并规定同年9月30日以前，所有私人持有的法币、外币、黄金、白银，均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管制。因上海是经济管制中心之一，蒋介石遂派俞鸿钧为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蒋实主其事，俞仅是挂名而已。蒋经国在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离京赴沪。今日政府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

蒋经国赴上海时，还带了一批旧部下和学生，其中最得力的是俞季虞和高理文。俞被任为督导员驻守处的秘书，高是向外发言的秘书，两位“台柱”都是蒋的留俄同学。在随行人员中，还有数百名武装特务，这些人将组成逮捕“不法”之徒的“打虎大队”，由王升担任大队长。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办公。当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俞、高、王外，还有宣铁吾、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走马上任后，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这是蒋氏当时的一句名言。蒋经国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的中汇银行，由三少爷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来者不善，就拟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悉知，就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了杜维屏，将其扣押在警察局看守所内。杜维屏被

扣，马上震动了上海滩，街头巷尾，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当时各报以通栏标题加以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

对杜月笙来讲，从来是只有“捉”人，没有被人“捉”过。蒋经国的下马威，使他愤怒到了极点。杜维屏被捕后，“杜门”徒子徒孙建议“老师”给蒋经国点颜色看看，让这位“皇太子”知道上海滩不是新赣南。但杜月笙却不动声色，既不向主管方面求情，也不跟亲朋故旧诉苦，甚至一本正经地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他一个，又有何妨。”其实，久经沙场的杜月笙哪会就此罢休，他表面上不动于衷，暗中却在窥察着反击的机会。为此，他暗差小喽罗们搜集蒋氏姻亲、豪门权贵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情报，以便找到突破口。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把各业巨头召到浦东大楼，准备对杜月笙施加新的压力。他唯恐杜不到会，还特遣王新衡去杜宅“相邀”，杜月笙明知是“皇太子”摆的“鸿门宴”，却不便“拒邀”。会议一开始，蒋经国即正色道：“对这次币制改革，上海各界人士热烈赞助者很多，但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影响国计民生。本人此次进行经济检查，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蒋经国的话显然是讲给杜月笙听的。岂料他的话音刚落，杜即起立发言：“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在囤积的货色方面，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的亲友的物资登记查封，也希望蒋先生能一视同仁，把扬子囤货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服人心。”杜月笙还软中带硬地说：“倘若蒋先生吃不准，我可以陪你去检查。闲话一句，我身体有病，不能多坐了。”说完离座而去。杜的发言如一颗重磅炸弹，语惊四座，工商界的巨头们不禁暗中佩服这位大亨。杜既然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皇太子”自然也不会示弱，他立即表示，“扬子”如有犯法行为，决不宽恕。

## 中国历史上的娃娃皇帝

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10岁以下的娃娃当了皇帝的，就有29个。最早的娃娃皇帝是西汉的昭帝（前86—前74在位），最后一个就是中国末代皇帝宣统（1909—1911）。最小的是东汉的殇帝，生下来100多天就当皇帝了。二岁当皇帝的有东汉的冲帝和东晋的穆帝。三岁的有北魏的孝文帝和清朝的宣统。四岁的有清朝的光绪。五岁的有东晋的成帝、北魏的孝明帝、南宋的恭宗。六岁的有清朝的顺治和同治。七岁的有后周的恭帝和元朝的宁宗。八岁的有七个，他们是：西汉的昭帝、东汉的质帝、三国时的吴会稽王孙亮、北齐的幼主、北周的静帝、南宋的赵昀、清朝的康熙。九岁的有西汉的平帝、东魏的孝静帝、南宋的端宗、明代的英宗。十岁的有五个：东汉的和帝、三国时的魏废帝（齐王）、南朝的宋后废帝和宋顺帝、北宋的哲宗。（彬 辑）

## 古代年岁的别称

总角、垂髫：指童年。

束发：指青少年。及笄：指女子15岁。

待年：指女子成年待嫁，又称“待字”。

弱冠：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表示已成年。

而立：指30岁。

不惑：指40岁。

艾：指50岁。

花甲：指60岁。

古稀：指70岁。

皓首：指老年。又称“白首”。

黄发、鲐背：指长寿老人。

期颐：指百岁。

## 明清两代六部的职能

吏部 主管全国文职官吏的挑选、考查、任免、升降、调动、封勋，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劳动人事部的职能。

户部 主管国家户籍、田亩、货币、各种赋税、官员俸禄，大体相当

于现代的农业部、财政部。

礼部 主管朝廷主要典礼（如祭天地、祭祖先等）、科举考试、接待外国来宾，类似于现代的教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

兵部 主管全国武职官员、练兵、武器、驿站，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

刑部 主管国家司法、行政，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司法部。

工部 主管兴修水利、重要的土木建筑工程，大体相当于现代的水利部和建筑工程部。

各部的最高长官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部长；副长官称“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彬 辑）

## “尚方宝剑”小释

“尚方宝剑”就是“尚方”铸造的宝剑。“尚方”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及皇室衣食行住的衙门少府中的一个部门。从汉朝开始就有。在秦时叫小府。《后汉书》中有记载：“尚方令一个，六百石。掌上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可见，从皇宫里选来的剑，就叫“尚方宝剑”。（彬 辑）

顿时，“扬子囤货案”弄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纷纷嘲讽蒋氏家族的丑闻。

扬子公司原是一家“皇亲国戚”公司。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蒋经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后，这家公司毫不收敛，依旧大囤货物，进行投机。孔少爷凭着他是蒋介石的外甥，根本不把“打虎大队”看在眼里。一次，他在遭到检查时竟拔出手枪拒检，强行冲过防区，扬长而去。蒋听后也无可奈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杜月笙先发制人，把扬子公司囤货案推到蒋经国的面前，使他左右为难。他想，如果按兵不动，杜月笙等奸商恶霸、工商巨子岂肯善罢甘休？如果彻查扬子公司，又会受到来自家族内部的巨大压力。蒋经国权衡再三，还是下决心令手下到扬子去搜查。结果于9月29日、10月1日在扬子的三处仓库搜出西药、颜料、羊毛毯、钢精锅、玻璃、自行车、洋酒、化妆品、滴滴涕、细布等大量囤积货

物。当时的热门货“龙头细布”，扬子公司囤积了数万匹，而市面上却一寸也买不到。

蒋经国接到报告后颇为难堪，遂下令查封。“扬子”三仓库被封后，孔令侃开始并不惊慌。他一面对外宣称，这些货物早已登记；一面继续提取被封物资，以高价抛售。几天以后，蒋经国亲临孔宅，要求他以党国利益为重，作个表率。但孔令侃并不买账，结果不欢而散。临走时，蒋经国坚决表示要以法办事，决不留情。

为了防止蒋经国真的采取这一手，孔令侃立即向小姨妈宋美龄求援，哭诉蒋经国自刃手足的举止。宋美龄唯恐家丑外扬，两败俱伤，遂乘飞机往上海。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所记，那天南京官邸正在举行灯火辉煌的宴会，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然来了紧急电话，神采飞扬的宋美龄接完电话，立即离开宴席，匆匆而去。

宋美龄赴沪后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孔宅进行调解，不料双方各执一端，越闹越僵。孔令侃冒出这样一句

话：急了，狗也要跳墙。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听了，担心事情真的闹大，急忙给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拍去加急电报，催他立即南下，处理这件大事。蒋介石于10月8日深夜到达上海听了原委后，不禁埋怨起儿子来，认为他毕竟出道不久，怎么假戏真做，打“虎”打自己家族头上了。结果，扬子一案不了了之。杜月笙的三公子也早在此事了结之前出了狱。

不久，蒋家王朝由于其军事失败和政治腐败而土崩瓦解，杜月笙赖以发迹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也失去了。

1949年4月，他托病离沪到香港，1951年8月16日，因病结束了自己作威作福又作恶的一生。

（责任编辑 晓渡）

# 轰动台湾的 蒋纬国别墅藏枪案

于祖范

项庄舞剑，民进党借题做文章  
反对台独，蒋纬国态度不动摇



女佣李洪美

调查站展示的 60 支点二二口径靶枪

## 一、蒋纬国托人报 缴枪支且数量颇大，令人吃惊

1991年6月30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上午上班时间不长，台湾调查局台中市调查站的电话铃声大振。

“我是宜宁中学的董事长蒋信丞。我受蒋纬国先生之托，报缴一批枪械。”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句句令人震惊。

“是谁？是蒋纬国先生要报缴枪械！”受话者怀疑听错了，情不自禁地又反问了一声。

“对，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先生。”大概怕对方还有怀疑，蒋信丞便连同蒋纬国的头衔也报了出来。“这批枪械共 60 支，将分装在 6 个木箱内，由我押送，用小货车运到你站

报缴。”

枪送来了。根据程序，调查站先是对枪支进行了初步检查。经查，这批枪是属美国制造的点二二口径室内练习用的靶枪，有史帝文生公司制造和摩斯贝格父子公司制造的两种，枪龄估计都在二、三十年以上，而且每支枪上都附有一张“枪支送修登记卡”，卡上写着的送修单位是“三军联大”，枪上涂满了保养机油，且堆满了灰尘。由此可断定尘封已久，已无法看出枪管是否有膛线。

据蒋纬国说：这批枪械是他在 20 多年前委托美军购买，后来，美军便搜集了军中用过的 60 支旧靶枪给了他。他本打算，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设立一个靶场，以供军官娱乐休息时使用。由于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便暂时存放到了自己在宜宁中学的别墅里。对此，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进行了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上

了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后来由于职务忙碌，事隔多年，便将此事忘却了。

那么，这批枪支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蒋纬国身边的幕僚透露，这批枪械是蒋纬国的老佣人李洪美，因为阁楼地板塌陷，请来工友帮助修理时被偶然发现。之后，她便告诉了蒋信丞。蒋信丞获悉后才报告蒋纬国。至此，蒋纬国方从“忘却”之中回忆起有这么一批枪，但为什么会出现在宜宁中学他的别墅里，却怎么也记不得了。

想当初，这批枪因三军大学无空地盖娱乐室而派不上用场，蒋纬国便喊来一位参谋：

“把这批枪移送到宜宁中学去！”参谋敬礼转身欲走，蒋纬国又交代一句，“告诉学校，这批枪要给学生当军训教练枪使用。”

枪很快送到了宜宁中学，但却被校方发现这批枪不是军训用的制式枪，所以就婉言谢绝了。

宜宁中学不愿收，那这些枪放到哪里为好？

“这是一些旧靶枪，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放到蒋纬国先生在这所中学的别墅里吧。”就这样，在这位参谋的自作主张下，这批枪就悄悄地放置在蒋纬国的别墅里了。

这位参谋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因为他的擅作主张会在 20 多年后使其主人置有口难辩之地。他从来没有向蒋纬国汇报这批枪的最后结果。蒋纬国自然不会清楚这批枪是怎样闯入了他的别墅的。

## 二、中学里为何有蒋纬国的别墅？99 平方米的别墅，蒋纬国很少去住，由李洪美独自看管

蒋纬国怎么会有别墅在一所中学里？帮蒋纬国报缴枪支的蒋信丞何许人也？

台湾的《联合晚报》以《将军惹火上身》为题对此作了披露。

对朋友肝胆相照，对部属的照顾极为周到，这是不少人对蒋纬国的评价。过去，他在担任装甲兵的司令时，就相当照顾自己的部属。当时，蒋纬国并无私人住宅，一向住在军营中。后来，为了照顾部属进修和他们的子女求学，他便在台中市复兴路创设了一所职业高中，也就是今天的宜宁中学。

学校成立后，蒋纬国的部属魏璠培出任校长，蒋信丞则出任该校的董事长。

蒋信丞与蒋纬国有世交之情，扮演着犹如蒋纬国家臣的角色。

这所中学落成后，蒋纬国便在校园内盖了一栋近 99 平方米的白色别墅。作为下塌台中的住处。这栋房子的隔间分有厨房、佛堂、客厅以及卧房两间。另外还设有仓库，天花板上有阁楼，也是 60 支靶枪的藏身之处。

由于公务繁忙，蒋纬国很少到这所中学走动，只是来参加学校的开学或毕业典礼时，顺道到别墅中小憩一番。至于平时，则由女佣人李洪美负责看管。

## 三、是自动报缴还是被人检举后所为？台中地检署与调查站说法不一，市调站的说法也前后矛盾

60 支靶枪，是蒋纬国主动报缴？还是被人检举后无奈之举？这是直接关系到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关键，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但这个问题至今连台中的地检署和调查站的说法也大相径庭。

7 月 7 日，台中地检署将了解调



图为蒋纬国在宜宁中学校内别墅，箭头处为发生女佣李洪美命案的水塔  
查此案的担子放到了刘家芳检察官的肩上。由于这位检察官一直在台北受



蒋纬国被记者包围询问有关枪支之事，他表示：肇发者别有阴谋

训，对整个案件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便于7月8日特请市调站的副主任吴新生到地检署对案情做进一步说明。

两人略谈之后，刘检察官向人透露，蒋纬国将军在托人向台中调查站缴枪之前，已有人向市调站提出检举。如此说来，蒋纬国的“自动报缴”就难以成立，很可能是“被动报缴”。但在此以前，调查站却一直否认在受理蒋纬国报缴枪支之前接获任何检举。对刘家芳检察官的“有人先提出检举”之说，吴新生出面断然予以否认，表示自己从没有如此向检察官报告过。究竟有无检举人，一时很难明确，市调站只是将事情经过向检方做了报告，并没有指称先有人检举才处理枪支报缴案。

可是到了7月9日晚，吴新生的说法有了变化。他称，市调站于6月30日的前一、二天就接获检举，指出蒋纬国的别墅内有一批枪械，但却没有指明枪是何人所有。根据检举人的这一告发，市调站立即派员对此开展查证。就在查证过程中，受蒋纬国之托的蒋信丞于6月30日上午向市调站报缴了60支靶枪。至于究竟是“自动报缴”还是“被动报缴”，吴新生再次表示他说不准，应由检方去认定。

#### 四、祸不单会，与枪案事发的同时，蒋纬国的女佣人又突然死亡。对其死因众说纷纭

蒋纬国的女佣人死了！又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6月30日傍晚6时许，死者25岁的女儿到蒋纬国的别墅里去找母亲，发现房中无人，便去房外寻找，发现其母在水塔旁的地上已身亡，即向警方报了案。

身亡的女佣人名叫李洪美。这是位非常老实，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但却追随蒋纬国40多年的妇人。丈夫于5年前去世后，她的神经有些衰弱，感情也显得很脆弱，但对蒋纬国却始终十分忠心。

她为什么突然死了？而且是在枪案披露之时，是因为觉得对不起蒋纬

国而自尽？还是因厌世而自杀？或者是其他更复杂的缘故？蒋纬国的推论是：女佣的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蒋纬国说，向有关单位告发枪案者称是女佣人告知此情的，实际上这纯粹是一借口，是个阴谋。他怀疑的是有人知道有这批枪，就利用李洪美身体与心理上的弱点，威胁她，吓诈她，把她套进去。受了威胁感到走投无路的李洪美向蒋信丞报告后便去自杀。

如此说来，到底是誰去告密的呢？蒋纬国的一位幕僚透露，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一个与女佣人很接近的人。据他们了解，女佣人并不是在6月29日当天才发现这批枪的，也不是在发现枪之后就立刻告知蒋信丞的。而女佣人在29日前发现这批枪后，曾向那个告密者提及过此事。当这一案子被密告到调查局之后，女佣人为此感到非常不安，觉得太对不起将军，随即产生自杀念头。

对这个告密者，蒋纬国异常气愤地说：“使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太狠了，这是一个卑鄙的阴谋分子。”

死者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友人说：“笃信佛教的李洪美绝无可能因为宗教信仰而去厌世自杀。她是很信佛，但她心大都放在3个孩子身上。几天前，她还来与我商量女儿的婚事。现在她的3个孩子都未婚嫁，她怎么会放心而走呢？”

“在李洪美死亡的前一天下午，她曾来找过我。”死者的这位友人略加沉思后又说道：“那天我感到有些奇怪，看她似乎有什么心事。以前她来时都会和我讲很多话，可这次她来后却只陪着我女儿玩，很少言语。在这之前的几天，她曾对我说她很害怕，想搬到我这里来住段时间，我也表示愿意她搬过来，可她不知为何一直没搬过来。对了，我还听到她的女儿提过好像有人在威胁她”。

死者胸腔大量出血，无他杀嫌疑。这是检方调查后的结论。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及法医验尸后指出，李洪美的肋骨有数根呈垂直断裂，结论系自高处坠落导致胸腔破裂大量出血致死。法医根据李洪美左手腕上的一道类似菜刀切割的伤痕和厨房内染有血迹的菜叶，以及屋内没有打斗争扎的痕迹等种种迹象，再加上从厨房滴到水塔旁的血迹，检察官推测案发的过程为：

李洪美在厨房先是割腕自杀未遂，便跑到水塔旁，再由水塔顶端跳下身亡。

那么，死者的家人是怎样认定死因的呢？死者的女儿李秀凤心情沉痛地说：“当时由于天色已晚，自己的心情又悲又怕又乱，所以没有注意到母亲手腕上有没有伤痕。现在法医证实是自杀，我想可能是母亲上去清理水塔时不慎跌落致死。因此，我们对检方的结论没有什么意见。但外界有些人不知出自何种目的，一再把母亲的死因与枪案扯在一起，真让人难以理解”。

#### 五、军火乎？玩具乎？蒋纬国说：这些枪不是武器，只是些大人玩具

60支枪，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是一桩不小的案子。蒋纬国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7月上旬的一天，台湾《中国时报》的一位记者就此采访了蒋纬国先生。

问：立委叶菊兰指控你在别墅内私藏大批军火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这60支枪的确是我的，这些是点二二口径(Sub-Caliber)的枪，是用来室内练习休闲打靶用的，有效距离是一千英寸，在米制国家是25米。

这批枪是20多年前我托美军，起先要买，后来美军顾问团搜集了60把用过的枪支送我，我记得他们没有跟我算钱。

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房子，没有地方放这些枪，就把它运到台中宜宁中学的宿舍，放在那栋房子的天花板上、屋顶底下一个小阁楼里，和一些旧家具放在一起。本来我买这些枪是要给三军大学军、教职官休闲时练习打着玩的，但是那时哪有这么多空空的场地，三军大学连健身房、游泳池都没有，也没法兴建室内休闲靶场，所以这批枪就被搁在阁楼上，一次也没有用过。

而且我虽然有这些枪，可是并没有子弹。一般的子弹有两种，特种子弹打得远，有杀伤力是需要许可证明，但这种打靶用的枪，是使用普通短式子弹，射程25米以内，打远就没有准



头，而且这种枪是没有杀伤力的。

问：当初你拥有这批枪后为什么不向有关单位登记，立委指责你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而且说你“私藏军火”？

答：在我看来，这些枪等于玩具，没有登记的必要，不是武器，只是大人的玩具。所谓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要看对枪械如何定义，这些是不具杀伤力的枪支，只是练习打靶用的。

我认为这件事，是有人知道我有这些枪支，是有人刻意去渲染它，把它透露给立委，然后又揣摩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又是私藏军火，又是“兵变”，又和什么“湖口兵变”扯在一起。首先我要澄清，湖口根本没有兵变，只能叫“事件”，这件事也是有人刻意制造出来的。现在他们又把枪支和湖口事件连在一起，就是要外界把事情带到他们心中所想的方向，显然是有心人的阴谋！

问：宜宁中学校长已把这些枪交给台中调查站，这个处理秩序是你交代他这么做的吗？

答：宜宁中学的校长是在上个礼拜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家里存放什么东西，我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其实我早就忘记有这些枪了。然后我告诉他，把这些枪送到调查站，如果还是好的，就送给调查站的调查员做游戏用；如果坏了就报缴掉。

问：外传你曾打电话给台中市警察局王局长，希望把这个案子消掉？

答：不可能，我根本不认识王局长，而且没有这个必要，坦坦荡荡不需要隐瞒什么，而且我也没有不良企图，如果未来进入司法程序后，有关单位要我说明，我是正常百姓，如需要我一定会出面说明。

问：如果立委要你到立法院提出说明呢？

答：政府认为我可以去，我就去。

## 六、经试射鉴定，大部份枪具有杀伤力。蒋纬国说：即使如此，也构不成“私藏武器”

被蒋纬国称为“大人玩具”的60

支枪究竟有无杀伤力？台刑事警察局迅即组织人员进行试射鉴定。

按以往鉴识枪支的惯例，凡是属于制式步枪的军方枪支都是交由联勤兵工单位进行鉴定。可这次却要破例了，因为枪的主人蒋纬国曾任过联勤的总司令。为了避嫌，对蒋纬国报缴的60支枪的鉴定只好由刑事局亲自出马了。

鉴识开始。鉴识人员对枪支先是看外观又是查看准星、扳机等机械情况，然后逐一登记枪号，再装弹试射。试射的情况是，大部分枪支射出的子弹每平方厘米的力量达20焦耳以上，据此判定，蒋纬国报缴的靶枪大部分具有杀伤力，但威力不大，精度很差，有效的瞄准距离也只有25米。

“我以前收藏了很多武器，长长短短的各种口径都有，但都是轻武器，并不像叶菊兰所称拥有大量轻重武器，私藏大批军火。”对有人借题发挥，极欲给蒋纬国扣上“私藏大批军火”的帽子，蒋纬国打着手势很镇静地说：“我们总不能因为曾经有人用领带杀过人，所以看你打了一条领带，就说不想搞谋杀。一条绳子也有杀伤力啊，这批用来练习打固定靶、飞靶用的靶枪，即使认定有一定的杀伤力，也不能因此就说构成了‘私藏武器’”。

当一记者在提问时又一次提到蒋纬国的枪支具有杀伤力时，蒋纬国极为严肃地说：

“只要是枪，当然就会有杀伤力。但是枪锈了，坏了，没有子弹，还有没有杀伤力呢？今天即使是拳头、原子笔都有杀伤力。问题是有没有杀伤的意图，法律是追究这个的。你们不要在这种细节上抓住不放大做文章，而应在法律上多一些思考。”

## 七、此案的处理是否有“走后门”或受外力左右之嫌？市调站：无上级单位表示关切；市警局长：蒋纬国从未向其施加压力

此案能够公正处理吗？民进党有人借机在作文章，民众也议论颇多。

“调查处理此案是否有来自上层的授意？”

“蒋纬国是否向市警局施加过压力？”

“……”

“没有。”市调站出面说明：“我们接案后立即向调查局作了报告，局里的指示十分简单明了：一切依法处理。接下来便是我们依据法定程序处理此案。其间，包括调查局、国安局、国安会等单位，都未以任何方式对本案表示关切，包括蒋纬国在内的任何个人也都未对我们施加任何压力，更无所谓政治性因素介入其中”。

“市调站为什么在接报7天之后才正式公开此事，提出说明呢？”有人对此感到不解。

“情况是这样的。”市调站解释道，“查报枪械对调查站来说是家常便饭。调查站在接获每一桩报案之后，必须对枪械送鉴，以辨枪械是否有杀伤力。然后再将鉴定结果随同枪械一起移送到地检署进行侦查。因此在鉴定报告未完成之前，还不能算是完成了枪械的报缴手续，因此也就不会发布任何消息。否则，如果报缴的枪械经鉴定不具有杀伤力，对报缴的当事人就难免会造成伤害。”

据讲，市警局6月28日查获此案在按正常渠道向上呈报时，蒋纬国突然打电话给王局长，指称该批军火，是其担任司令时保存于别墅内的军品，他命令王局长立刻销案，并不得向外界披露案情。对叶菊兰的这一质询，台中市警局局长王锡田表示，根本无此事，不论在事前还是事后，蒋纬国将军都从未打电话给他，也从没有任何人就此案向其施加压力。

“此案能公开办案吗？”

“我们是会依法处理的”，台中地检处的刘家芳检察官说，“处理这个案子我们会像处理其他案件一样，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当然会公开办案的。”

## 八、醉翁之意，民进党扬言逼蒋下台，态度坚决；蒋纬国反“台独”立场绝不动摇。

一堆破烂不堪的过时靶枪，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为何却在台湾岛上弄得沸沸扬扬，越闹越大？原来是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民进党在中间作祟。

台湾的民进党自称为台独党。他们对一贯坚持反对台独的蒋纬国早就恨之入骨。1988年的行宪纪念大会上，蒋纬国曾在会场上怒斥民进党国代，高喊“把他们拖下去！”。为报这一箭之仇，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扬言要对蒋纬国的枪案追究到底，借此逼蒋下台。

立委叶菊兰先在7月3日在立法院指称：蒋纬国私藏大批军火枪械，并在东窗事发后逼死女佣，以达到杀人灭口之目的。之后又于7月6日提出了所谓10大疑点：

一、据她得到的消息，蒋纬国私藏的枪支是66支，为何调查局只收到蒋信丞报缴的60支？

二、为什么台中市调查站恰巧在叶菊兰提案的第二天发布蒋纬国托人报缴枪械？

三、谁敢担保蒋纬国不是在压力下，从军方的仓库中调出60支旧的练习靶枪，以鱼目混珠蒙混过关？

四、为何蒋家别墅藏有大批军火，而辖区的台中市警局20年来未闻风吹草动？

五、蒋信丞为什么要向台中市调查站报缴枪支？台中市的最高治安机关是台中市调查站还是台中市警局？是否调查局较能帮蒋家掩饰案情？

六、蒋纬国说“当局”知道他藏枪之事，“当局”是指谁？他又说曾向李元簇谈过这件事，李元簇涉入的程度有多深？

七、为什么6月30日上午蒋信丞报缴枪支，当天蒋家别墅的女佣李洪美就离奇暴死？为何死后至今已超过一个多礼拜，仍旧查不出死因？

八、台中市警局、地检署为何在李洪美死因不明之下，都一口咬定是自杀而排除他杀？

九、蒋纬国私藏军火被叶菊兰揭

发当时，赵振鹏立即向行政院长郝柏村报告，当天下午即对记者证实蒋纬国藏枪，但无杀伤力，是练习用枪，第二天蒋纬国也如此表示，是否预先套招以逃避刑责？

十、蒋纬国凭什么在警方未鉴定、检察官未起诉、法官未审判前，就表示“即使鉴定枪有杀伤力，也不算违法持有枪械”。

叶菊兰的10大疑点可谓绞尽脑汁，卢修一的言辞则更为露骨。

任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的卢修一赤裸裸地表示：我们将继续就叶菊兰的提案追究蒋纬国的法律责任，不置他死地，“到最后至少也要逼他下台”。至于女佣的死因以及调查局是否有吃案的情形，也要追究到底，抓住不放。

民进党的架势真可谓咄咄逼人，但蒋纬国毕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对民进党的醉翁之意似乎早已昭然若揭，在这场较量中虽处于被动阵位，但却好像并未大乱阵脚，对民进党的攻势没有表现出丝毫屈服之意。

有记者问：有民进党立委要求你负起枪案之责，同时也提案要求撤换你的职务，你的看法如何？

蒋纬国颇为镇静地回答：“这个案子的真相尚未大白，他们如此活动用意何在？居心何在？我想你们新闻界应该比我要清楚。对此我的态度是：除非是‘总统’要我走。”

“对枪械的来龙去脉，我愿意将事实的真象公诸于世。但我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绝不会因此案而有丝毫动摇。如果有人想借此作文章企图让我改变这一立场，那么，这一算盘显然是拨拉错了”。

## 九、此案如何了结，人们猜测各异，拭目以待

审理此案将主要依据什么？应该是台湾的《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这一条例的第4条规定，所谓枪炮包括所有可发射金属或子弹，具有杀伤力的各式枪炮。第7条规定，未经许可无故持有枪炮者，处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说，判持枪者是否负有刑责，除了是否有杀伤力之外，持枪者是否“未经许可，无故持有”，也是一项必要的认定标准。

警政署1990年7月18日还颁布了一项实施自动报缴枪械免除刑责的规定，终止期限是1990年的10月17日。

蒋纬国别墅藏枪案将会怎么了结呢？

台北地检署的一名检察官表示：本案属于个案，必须由承办检察官依法去认定，如果查明无“犯罪故意”，可依刑事诉讼法第252条第10项“犯罪嫌疑不足者”处分不起诉。

中兴大学法研所所长黄东熊则认为：秘书长曾表示“事情已过20几年，忘记了”，依其身份、地位来分析应是“合理可信的事”。检察官如相信其证词，依法可免除其刑。但他必须要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以消除大家的疑虑。倘若他能够鼓励军中的同僚将领如有类似情况赶快主动报缴，则可平息这一事件的风波。

一名警界人士在对此案进行几番研究后指出，据市调站所发布的消息可以确定这样两个事实：一、该批枪械既然是蒋信丞受蒋纬国之托而主动报缴的，那么即可断定这批枪支是属蒋纬国所有。二、市调站宣称，这批枪是蒋纬国托人“主动报缴”的。从这个“主动报缴”中可以证实，这批枪并非公有，而系私人所有，因此才需要报缴。基于这两个事实，这批枪如果经鉴定具有杀伤力，又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中所管制规范的枪支，再加之“主动报缴”已超过了免除刑责的最终期限，因此，已很难享受免除刑责的优待。

此案结局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晓渡）

## 好人定会有好报

我从六七岁学戏练功，上台演个小角色，都自信决不落后，多么大的演员我也不怕，多么大的场面也不休台。记得小时唱戏摔破了一把小茶壶，那茶壶本是自己的，自己的也不行，当小工去，拼命干活挣钱，好再买一个赔自己。后来长大了，跟着母亲闯荡江湖，流浪唱戏。那时有句话叫做“去搭班如投胎”。我自信：是骡子是马，上台见真假。我可说是唱了一辈子的戏，并自信是用良心唱戏，对得起观众。

10岁，我到了北京。到是到了，不能进城里大剧场，因为那时候的中和戏院、吉祥戏院、长安戏院，都是京班大戏著名演员的场子。评剧也有三个团能轮上，唯有我这个小人物的不许进去唱。不许就不许，我就在城外天桥小戏院子搭台，自信能把城里的观众吸引到城外来看我的戏。记得当时有位主事的说：“包在我身上，我介绍你进城里大剧场，再组织观众看包场……”我想：“唱戏凭本事。是观众花钱排队买票，要的就是自愿、着迷。组织包场看我的戏，你能组织一辈子吗？”

我刻苦练功，一心练成真本事，在北京演出个样儿来。

那时，前门大街家家门上有大喇叭放唱段，一条街大都放“刘巧儿自己找婆家……”围满了听唱的，其中劳动人民占多数。这也是因为我赶上了宣传婚姻法的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城里的几处大剧场经理纷纷约我去演出。一个人有自信、不骄傲、不摆架子、尊重人、谦虚可亲，是人缘，也是根本，我团结了一群人，合作了40多年。

做为演员我从来不忘妒人；做为妻子我从来不忘妒丈夫和女朋友交往。我认为，我如怀疑和忌妒，就是对自己失去了自信……，那就不是我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苦买不起新布，总是穿着补补缝缝的破旧衣服。七、八岁那年，当时已经唱红了姐姐，看我将她伺候好，就给我买了一块花布让我做条裤子。我把这块布拿在手上看看比比，可高兴了。可是家里的人谁也不给我做。大姑母是全家的巧手，看着我：“小凤，你干吗老是拿着这块布比划？”我说：“看看做条裤子够不够长短……”大姑母一副看不起的样子对我狠狠地说：“拙笨的闺女是蠢驴，拿着新布你做不成衣！”说完，大姑母甩着双手走开了。我心里想，有了新布我就要穿上，不给做我自己做。中式裤子虽好做，可谁给剪裁呀？母亲抱着孩子去串门时，我关上门，脱下裤子，比着自己剪。那时只穿一条裤子，不像现在有内裤，我用一条裤子围住身子，坐在坑上剪裁，剪好了，赶忙穿上裤子，再拿起针线缝。可是，缝了一个白天也没有缝好，晚上又坐在路口电线杆子下边借着路灯的光亮接着缝，最后，总算做好了。我高兴地穿上新裤子在大姑母面前走来走去，大姑母说：“呀！小凤这丫头片子还真行啊！新裤穿上了！来来……”大姑母拉着我让我转了一个圈，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歪歪扭扭的针脚，可不行啊！”我自信地对大姑母说：“是不行，这不是头一回吗？告诉您，我这

# 新凤霞： 短文二题



还是拆了又缝的……先前我给缝成一条腿朝上，一条腿朝下了！反正现在我自己会缝了，不单缝裤子，还要学着缝件褂子呢。”大姑母撇着嘴说：“看不透！你这小丫头能动剪子穿针做褂子？”我自信能成，对着大姑母就说了出来：“我能成！”果然，后来我学成了一手好活计。大姑母夸我说：“小凤这丫头，上炕一把剪子能裁会做，下炕一把铲子煎炒烹炸。小丫头有股敢干能成的劲头！”

一个人走顺路，直线上升不一定是好事。没有一点压力，什么事都让人家给你铺平了路才走，养成依赖性绝没有好处。我从小就是在艰苦的路上，摔打，靠自己努力奋斗在坎坷道上滚爬过来的！记得一次在胡同里摔倒了，有人来拉我，我不愿意，一定要自己爬起来。但他非要拉，我虽被拉起来了，可又趴下自己再爬起来。从小我就养成了这股倔劲，稍大一点便走南闯北，十四、五岁当上主演，带着一班人唱戏，靠刻苦练功不断提高演技争得了观众。我的自信是靠玩艺儿，重心不重金！艰苦的路走到五十年代……应当说是成家立业了，可是想不到，艰难的日子又开始了，而且要比当年的饥饿寒冷劳碌奔波还难熬！丈夫被错打成右派，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台上唱戏，台下劳改，但我始终坚信这是暂时的，因此，挺过来了。

自信使我度过了反右派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当时，丈夫被送到遥远的北大荒，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走后，老的老，小的小，全部负担就压在了我的身上！天塌下一般，精神支柱、经济支柱一下子全没有了。我只剩下了“自信”，就因为有了“自信”，我才能够把这个家撑起来。撑起了这个家，妻子、孩子、老人就散不了。幸福能握在我的手里，我自信好人定会有好报！

三年自然灾害，农业欠收。老人孩子要生活，受冤离家的丈夫在北大荒受罪，我不能让他揪着心。我拿定主意坚持守住这个家，绝不让这个家沾上一点点污泥。终于，灾难这去了。丈夫回来了。一家团聚了。也证实了“自信”对我来说是战胜困难的根本。

## 长发真情出异彩

女同志最珍惜自己的长头发，这在咱中国女孩子中是很普遍的。几十年演戏生活，我没有剪过短发，都是留长辫子，因为我需要用头发创造人物形象，塑造性格和渲染舞台气氛。我塑造舞台的人物形象中，除古装戏梳大头之外，大多是用自己的头发，在拍摄电影“张五可”时，也是用的自己的头发。只有少数现代戏需要短发，那时，我就用头套。而演现代戏和近代戏，我都用自己的头发。1949年排演《祥林嫂》时就是用自己的头发梳的头。为了设计形象，梳头时用一个头针虚扎，为的是全副进入高潮时那个独具个性的亮相。这个可怜的祥林嫂一直生活在压抑愁苦之中，被踩在社会最底层，先后失去了两个丈夫和唯一的儿子，成了一个孤独无助的女人。最后一场戏，她把所有的钱都捐了门坎，本想求个吉利，谁知却被鲁四爷赶出了家门。这时，一生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祥林嫂，终于不再容忍了。她像发了

疯，心都要爆炸了！什么也不顾，抓起板斧要劈断门坎。

祥林嫂，勇敢地拿起板斧去劈门坎，要挣脱封建重压，这是觉醒后的反抗！拼命！为了创造祥林嫂这一场的形象，我设计的动作是“祥林嫂先是站在台口前，心里在激烈的斗争，痛苦地视向观众，两眼定神，决定了！猛的转身跑到台后，抓起沉重的板斧，急转身跑回前场站住，用一个小云手动作举起板斧亮相。这个动作在转身低头拿板斧时，一手抓斧，一手拨下虚扎的在头发中的卡针，猛的跑回前场，将长发甩开，手举斧高过头，披散在左脸边，观众被这大跨度的动作和深含的潜台词带入忘我的境界。一出戏一点点笑声彩声都没有，一直静静的。可是这一个亮相动作后，台下：“哗……！”地响起了满堂彩声。这不是给演员叫好，而是为祥林嫂助威。物极必反，懦弱的祥林嫂豁出命了！这个转身、抓斧、举斧、站住、亮相的动作，既有：“快如风、站如松”的戏威，又有极富个性化的甩头发动作，如果用假发套是出不来这种效果的。

祥林嫂这出戏从初排到文革前的十几年中，每逢“三八”妇女节都要演出。“第二个用头发造气氛的戏是《杨三姐告状》。杨三姐在《闯官堂》一场戏中，跟害死她二姐的仇人高占英见面，这是个急如风一般的上场，一个亮相，我用了个甩辫子的动作，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一个圈儿，辫梢正好用嘴咬住。化妆师在给我梳辫子时，扎辫根很有技巧。稍高一点，显出杨三姐的倔强性格，同时也便于甩辫子亮相的动作。一甩绕在脖子上正好一圈。这个辫子跟刘巧儿的辫子梳法完全不一样。

高占英害死了杨二姐之后，假意去看望杨母时和杨三姐吵起嘴来，三姐指出：“就是你害死我二姐的！”于是，高走，三姐追、杨母拦。最后杨母抓住三姐的辫子，母女两个倒退着走搓步退回来。这个动作扮演杨母的赵丽蓉同志跟我一起练了很久。杨母抓住三姐的辫子，三姐却退步不愿回屋；杨母和三姐一个外转身进了屋，母亲举手要打三姐，被三姐强行扶坐在椅子上。唱：“两眼不住泪滴嗒……”这一连串的动作和顶板唱：“楼上楼”，母亲说，三姐唱，一气呵成，句句有彩声。白话节奏和唱的节奏化为一体。最后母亲推三姐说：“去吧！”台下又是彩声一片！这场戏唱下来，我们两个满脸、满身都是汗。六十年代天津中国大戏院杨经理说：“这戏老人看了过瘾，青年人看了上瘾、激动人心啊！”现在都用假辫子，这个动作不能用了，一抓头套掉下来起反效果。

还有一出用头发造气氛的戏是《阮文追》。阮氏娟见丈夫被强人抓走，便追赶上去，强人抓住她的头发用力一推。在饰演阮氏娟时，我请化妆师为我把头发梳好后只用一个插头针。演强人的张柳江同志跟我在排戏时练好了，一抓插头针头发立即散下来。阮氏娟又追，强人抓住阮氏娟头发，我跪着走一段跪搓步，然后被抓起头发，提身摔一个屁股坐子。强人走了，氏娟哭喊着、甩发、走一个圆场，然后昏倒。这场戏非常火炽，演出结束后，我的头发一把把掉下来。张柳江同志知道我平时保护头发，爱头发，抱歉说：“凤霞我抓的太猛了，太紧了把？再演的话，我不……”我说：“没关系，我爱头发

## 在六大古都建都的朝代

西安 公元前11世纪,西周首先在此建都,称为镐京。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定都此地,取名长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也定都长安。

洛阳 这里最早是西周的东都,叫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正式成为东周的都城。战国时期改称洛阳。以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迁都在此40年)都在这里建都。最后定都洛阳的是五代十国中的后唐。

开封 最早是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叫大梁。唐朝改称汴州。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定都在此。接着,后晋、后汉、后周都相继在这里建都,同时改称东京,又称开封府。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继续以开封为都城,这是开封历史上的极盛时代。

杭州 五代十国时是吴越的都城。以后,成为南宋的首都,称为临安府。杭州作为都城前后232年时间,是六大古都中最短的。

南京 最初是三国时东吴的国都,称为建业。不久是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的国都,叫做建康。由此,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以后,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在此建都割据,称为金陵。宋元璋建立明朝,定都这里,改为应天。太平天国洪秀全也建都于此,叫做天京。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北京 战国时,这里是燕国的都城,叫做蓟城。辽朝改称燕京。金朝于公元1153年迁都至此,称为中都。

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于此,改称大都,扩建后成为十三世纪最光辉的城市。明成祖于公元1421年将都城由南京迁至此地,方改称北京。清朝也以北京为国都。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北京为首都。

## 《儒林外史》主题有什么深意?

一、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形象大约一百个。大多数读书人形象都是厄运的受害者。一部《儒林外史》写的是儒林的痛史,而不是儒林的丑史。这是小说主题的基本倾向。作者把讽刺的锋芒,通过现象,指向本质;指向厄运的本身及其制造者。

二、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中,陆续出现了文人的典型形象。但都是单个的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全面描写一个时代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道路的作品,《儒林外史》是唯一的一部。以往的作品常常把怀才不遇写成个人遭际问题。《儒林外史》第一次用完整的形象体系,把人才的败坏作为全社会性的危机问题提了出来。这是主题深刻性的又一重要标志。

三、《儒林外史》用什么思想作为批判的武器?其中,有正统的儒家思想,如“仁政”等。最值得重视的是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如在杜少卿形象中表现出个性解放的要求和平等观念。人才的社会危机,常常是社会制度的危机的一种征兆。《儒林外史》通过一系列读书人的典型形象,反映了一代文人的厄运,也就透露了这个社会的不再有发展的前景。这就是说,《儒林外史》比《红楼梦》略早一些,就通过特定的题材,透露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将是不可挽回的了。(彬 辑)

## 李白身世之谜

唐代大诗人李白身世这个千古之谜,有了新的考证。兰州大学的张书城认为,李白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第25代孙,属于西汉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

张书城的考证认为,由于李广的嫡孙、汉骑都尉李陵于公元前98年败降了北方少数民族匈奴,李氏家族对此引为耻辱。李陵的母、妻、兄弟、子女均被汉朝诛杀,因此中原再无后人。李陵在匈奴和单于的女儿成婚,以后“子孙代居北狄”,大约经过了十代一百多年。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李陵后裔随匈奴10万余被并入鲜卑部,并为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北魏立功。北周时期,李陵后裔李贤被授予大将军。后来北周外戚汉族的杨坚代周建立隋朝,李贤之弟李穆以手握“天下精兵”之权,支持隋文帝统一祖国,被拜为太师。隋炀帝时,因杨帝嫉恨李氏“门族强盛”,捏造李浑(李穆之子)、李敏(李贤之孙)等反叛,诛杀33人。其余不论男女老少并徙岭外(葱岭以西),其中的一人流落到了碎叶,在那里延续了五代。到了第六代,李白诞生了。

李白生逢李唐王朝,当时是以关陇士大夫为核心的汉人执政,联宗之风甚盛,李白只承认远祖李广,否认与李陵等人的关系,甚至杜撰自己是西凉王李皓九世孙,主要是为了达到保身的目的。

张书城潜心研究李白家世的源流,多年来遍搜汉至唐史籍中李氏家族发展的蛛丝马迹,联系浮沉际遇,阐述隐显因果,勾勒出了李白家世源流上下700多年。(彬 辑)

是为了演戏。一个演员虚假造作是最可怕的创作态度!只要真实,不虚假;一个人吃点苦不算什么。”

运用头发创造人物形象在我的表演剧目中有很多例子。但现在我的学生们却大都演不出,她们不能运用我所创造的头发动作,因为她们都是短发、烫发,在台上只能带头套。带头套就不能用头发功,因为辫子有掉下来的危险。再说40多岁的人了,留长发已不起劲了,还是习惯用假头套吧。

我的长发留了30多年,完全是为了演戏。由于配合了剧情的发展,这个精心设计的辫子功,头发功,创造

舞台效果的高潮,赢得观众的满堂的喝彩。这便是观众给我的最大的安慰,使我的心里充满温暖。十年文革,坏事做尽,在那个打砸抢横行的时代,一天,有个不知名的好心人给我打来电话,关照我千万剪掉辫子再去剧院上班,否则不知会遭遇什么灾难。那天早晨,我狠心剪下跟随我将近40年的长发,然后去剧院上班,果然在门口见到造反派举着剪刀,瞪着恶狼似的眼睛站在大门前,见我剪掉了头发,才大发慈悲没有找我的麻烦。

从这天起我的头发在跟随我大半生的演剧生活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第一章：神秘的世界女公民

### 1. 北京的“地球村”

站在古观象台遥遥东望，建国门外，俨然一派现代都市景象。雍容华贵的长富宫大厦，雄浑伟岸的国际大厦，清灵俊逸的赛特大厦，富丽堂皇的国贸大厦……再往东北，还有亮马河大厦，京广大厦，京城、发展、丽都，以及正在拔地而起的燕莎……参差错落、鳞次栉比且气象万千的那些非凡的广厦，都有一个不久前中国人还十分陌生的共同名字——写字楼。而进出其间的，则是数以千计的老外们。

他们在那些每平方米月租金高达50美金以上的写字楼里安营扎寨，为的是代表数以万计的世界级大亨的跨国公司的利益。

——这里通常要有5个时区的概念：北京时间、莫斯科时间、伦敦

时间、纽约时间、东京时间；

——这里通用5种货币：美元、英镑、法郎、日元、德国马克；

——这里，曾给连绵5个世纪、是明清24位皇帝故都的北京，带来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异国情调。这里，也无疑是共和国最富于国际化的区域。

1979年，当欧洲的著名银行，英国米特兰银行英明而果断地重新踏上已经阔别了30年之久的北京大地时，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但是，风起云涌的30多个国家的上千个世界级大亨们仍然步其后尘蜂拥而至。最大的集团，浩浩荡荡拉起上百人的队伍，最小的商社也并不寂寞，一个人，一部传真，就可以代表一个或几个国家大小数十个财团。

他们不是企业，而是国外法人派出机构，是为国际大托拉斯集团负责贸易的先期联络，是由此而派生的国际金融业中的贸易托付行或议付行，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副产品——环球旅游公司、民间社会团体和外资合资企业的驻京办事处……

也是1979年，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在京城东二环路一座灰色二层小楼上成立了，她成为北京第一家、也是中国最大的一家为外商服务的“母亲”。目前，其子舰的服务，已从单纯向外国商社提供经过训练的中国雇员，发展到十余个方向和门类。年创外汇雄居北京市非贸易创汇第三位。

北京的建国门外，有一片被外国人称为“地球村”的伟岸建筑群。出入其间的是数以千计的老外，同时，也有许多衣着笔挺举止潇洒的中国姑娘和小伙儿。在局外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实再令人羡慕，但是，如果侧身其间，就会体会到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追求与欢乐、困惑与艰辛……

# 京城大厦里的 白领小姐

刘昕

获首届国际秘书节最佳女秘书的李晓晖



还是1979年，一位叫王琦的中国女性，进入了外国商人的世界，成为社会主义公民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政府派出”第一人。弹指十数年，王琦们已经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庞大集合。

她们，与洋厦、洋人一道，成为北京城中最富有色彩的景观之一。

听一位中国女雇员告诉我，不久前，一位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比利时商人曾对她感慨：

“这里（指建国门至三元立桥一线），不是中国。中国在前门、在天桥……”

“那，您认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她问。

“这里是地——球——村。”比利时商人幽默地回答。



## 2. 陌生的新世界

中国的企事业单位，一般不太喜欢任用女性；典型的看法是：女人麻烦比较多……这当然主要指生理上的麻烦。即使女大学生、女研究生这些天之骄子们也不得不为毕业后的出路无着而奔波、感叹。

但外国老板们似乎偏爱独辟蹊径。

美国的IBM公司副总裁认为，在国际市场的某些领域，“甚至81%定贷决策是女性参与决定的”。因此，忽视女性就等于放弃可以开发的市场，而用女性来影响决策，往往比男性更容易奏效。

“女性比较容易讨人喜欢。”香港雅美印务的老板对我讲解得更有透明度：“往往先生们翻来覆去谈不成的项目，小姐一去，立刻成交，就是稍稍吃一点亏也做得成。”并非有什么秘不可示的窍门，仅仅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对女性较少的防范，而且愿意与之合作并助其成功的男性文化氛围……

因此，在一些世界闻名的大跨国公司，女雇员的人数往往高达40%。而北京的外国商社自然也就成了女强人的天下，利用性别做工作，在商社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已经产生出30几位奎恩——中国女王（外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全权代表）。

我去“参见”过这些奎恩，以及那些想做奎恩的女性，因为我搞不

懂，在这人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人性的竞争都极端白热化的天地里，指挥她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据我所知，由于人员的高速度膨胀，外企打掉了1987年以后进入外企成为外商雇员者的“大锅饭”——她们的档案被存放在北京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她们丧失了国家干部或正式职工的“固定编制”。也就是说，对于1987年以后进入外企的职工来说，要端“洋”饭碗，就得彻底放弃“铁饭碗”。铁饭碗是什么？是住房，是退休金，是医疗保险，是安全感和安定感……那么，1987年以后进入商社的奎恩们，心中奏响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是否增添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因素呢？

难道，主宰她们的仅仅是金钱？

## 3. 神秘的女王们

### A. 选择珍视自己

她发结盘得很高，着淡妆，穿一条蓝地白花的手工扎染连衣裙，朴素中透着高雅。她是女“酋长”——部门经理，是日本某大商社的第一位中国女雇员，也是第一位中国女经理。

S女士可以说是个弄潮儿，也是幸运者。

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动，人们飞鸟投林似的竞考电大、业大的时候，已经干了10年的钳工的她，被做为技术骨干，送到某大学脱产进修外

语。二十五、六岁的初中生学外语，真够她吃力的，但领导说将来要引进外国新设备，各种人才都要储备。于是，她没有品尝她的同龄人半工半读的紧张和窘迫，平平安安地得到了一张大专文凭。

但是，当她从大学回到了钳工车间，做为“人才”被“储备”起来的时候，她忽然感到了某种惶惑，她是从大学生的角度重新审视她所从事的工作的，“还干钳工，外语不就白学了吗？”26年来，她第一次自己做出决策，“得换个能用得上外语的工作。”但工厂里没有她的位置，逼得她向外寻找。

八十年代初，只学了一年外语的她，顺利地考入了这家世界一流的日本大公司驻中国的商社。

她以她10年钳工般的忠诚和本份兢兢业业地工作，她也以她被压抑了10年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学习。由于她的勤勉和进取，终于木秀于林——在外国商社工作10年间，外国老板送她出国进修4次，并在她满36岁的时候，送给了她一份她做梦不曾想过的礼物——任命她为那家大商社的总务副经理。这也是日本国在中国5百多家商社中的第一位中国女经理。

S女士自出生已习惯于被他人安排命运，取得大学文凭使她萌生了改变命运的冲动。但是，选择直接为外国人做事，却不是人人都具备这样的勇气。但是，她的缺点就是太珍视自

己，太珍视自己作为一名钳工而学了一年的外语。窗子已经打开，又岂能再封闭？于是，正因为她的缺点，使她恰巧被“上帝”选中。

### B. 向往脱颖而出

如果说S女士进入外企前，对外国商社还一无所知，A小姐就可以被称做知之甚多了。A小姐相当聪慧，凡是跟她接触过的人都这样说。在领取了中国地理学硕士学位后，她并不千方百计地往国家机关和研究所挤，而是轻而易举地考入了外企。

她的眼镜片太厚，形象不算姣好，但是她那口流利的英语和对周围事物合情入理的分析及果断的判断力，使她新入商社，就获老板青睐，被派代表公司赴美国参加一个大型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去法国公司本部汇报有关工作。

事有凑巧，在会议结束后，她准备登机时，航空公司方面因超额预订，希望她能改乘第二天的航班，并答应为补偿她损失的时间，退给她500美元。500美元对中国人来讲不是小数，而且她的在美国攻读博士的男友也希望她滞留下来，办妥在美留学的手续。但她婉言谢绝了。反复与机场交涉，终于按时登机。事后她对我说，为500美元对派我出来的中国和外国公司失信，是近视眼；为继续获得学位，而放弃已有的基础也是近视眼。她觉得外国商社的条件很好。有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有著书立说的机会，杰出者不但能获得高额奖金，而且可以享受出国旅游休假的乐趣。如果是佼佼者，在商社很容易出头。而被公司派往第三国工作，可比自己只身到国外，以一个亚洲移民的身份去竞争，而步入同等层次要容易实现得多。

对于学非所用，她倒不是十分在意，她认为硕士只代表了她的知识覆盖面，所从事的工作不能被所学局限。她还说，在商社工作的经历对她的一生不会没有意义。

实事求是地讲，在外国商社，像A小姐这样高瞻远瞩的女性我遇见得并不多，但随着进入商社的研究生、留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更多的人开始在暗暗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 C. 进行曲线出国

到外企去，于出国有利，这几乎

是人所共知的。

据外企有关人士透露，从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外商派中国雇员去国外参加培训或贸易洽谈共4953人次。平均每天都有两三个中国雇员迈出国门。

由于外国商社国际间联络频繁，为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国家为中国雇员也提供了最便当的出入境手续。一般来说，在国营企事业单位须办半年的出国护照和签证，在“外企”，只要一个星期就足够了。这也使一些在使馆屡次签证不能通过的个人，瞄准了这一“曲线”出国的宝地。某小姐想出国深造，但由于她没有托福成绩，而且为她提供经济担保的美国人财力雄厚且又年青未婚。使馆学生处签证官认定她有“移民倾向”，尽管她再三出示仍在北京的爱人与孩子的照片，也无济于事。三次签证均未通过。无奈，她考入了“外企”的一家美国商社，在第一次出国洽谈生意时“失踪”了。也有一些学子拿了“托福”分，到“外企”来是想找“经济担保”的，一旦客户中有人承诺，便立刻辞职……

虽然假商社之便而谋个人出国之利的，在中国雇员中仅是极少数，但毕竟是一个存在。

最常见的还是堂堂正正地嫁出国门。

爱情没有国籍。在外国商社工作，与外国人共事，发生感情碰撞是无可非议的。所以，一般外企姑娘的涉外婚姻多是有感情基础的。近1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外企”姑娘外嫁的大约有30余人。每年虽占北京市涉外婚姻的比例不算大，但在一个总数才1800百人的女雇员队伍中，也颇有影响力了。

Z小姐在谈到她的女友L小姐的国际婚姻时说：我不反对嫁给老外，只是我觉得她的倾向性太明显。她很善交际，每次有什么国际会议或活动，她总是很专一的与一位老外聊天，而不是人人都应酬。所以，往往会议或活动结束后，他就成为她很熟的朋友。这当然对做业务有利，但更有利的是可以一步步地不断扩大“视野”，谨慎地进行意中人的选择。她到商社干了3年，也选了3年，终于谈上了一个如意外国郎君结婚出国了。

临走时，她告诉我，大学时，她谈对象也是如醉如痴的，但都没有像这次恋爱那样产生强烈的幸福的感受……她劝我也为自己留个心眼。

### D. 享受现代生活

外国商社本身是国际间大交流的产物，因此，也使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们头脑里的幸福图景有了极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变化。

C小姐自从进入商社，就告别了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她的代步工具是出租车。虽然，她的老板规定，与业务无关的车费一律不能报销，而且，她的抽屉里至今还锁着一厚沓老板认为是“私”车而不予报销的出租车发票。但宁愿自己掏钱，她也要打“的”上下班。倒不是摆“谱”，而是她曾向羡慕她的大学同学和邻居们“宣布”过，“在商社都是乘出租车上下班……”因此，再乘公共汽车她“不习惯”了，觉得“跌份儿”。为了保持一种“层次”和自尊，她“学”会了把老板的一些业务巧妙地安排到上下班时顺路去做。

J小姐是八十年代初进商社的。那时候老板不给“饭补”，但允许她可以在商社所在的大饭店免费享受一顿工间餐和一顿午餐，以记帐的形式，统一打在办公室费用里。于是，她渐渐改变了生活习惯：上午10点，她准时按铃，叫侍者给她送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加奶。下午2点，她才到饭店餐厅去，看看在数个不同风味的餐厅中，哪个餐厅的哪种名菜她还没有品尝过。如果她的男朋友正好有闲暇，那么，她就会约他共进午餐，在一起愉快地消磨一个钟头。晚饭要看睡觉的时间，10点之前就免了，10点之后她会自己加点夜宵，吃点剩稀饭或者方便面，她说她吃饭店都吃腻了。

M小姐称自己是最不忘本的人，因为她常常进行“忆苦思甜”：

刚进商社时我那个土，冬天还穿棉袄，眼镜一圈一圈的。现在，冬天不穿棉袄，平时不戴眼镜，也习惯了。

那天，我买了件180元钱的睡衣回家，我妈的眼珠都快瞪出来了，“你看咱家院里屋里泥里泥巴的，哪有你穿这玩艺儿的地方！”我一想也是，平时我尽量泡在商社里，哪有回家穿睡衣的功夫？



我小时候就爱唱歌，别人都说我嗓子好，该好好练练，可哪有机会！理想归理想，能实现理想的人总归没有碰到什么干什么的人多。谁知，进了“外企”，机会来了——我有能力自己去“卡拉OK”。去年，我整整“唱”了一年，后来在北京地区的一次外语“卡拉OK”演唱比赛中还获了奖。我觉得，这才叫丰富的业余生活。现在，我自我感觉良好，日子过得也更有滋味了。今年我又迷上了打网球。这过去只在外国电影里看到过，我从未梦想过自己也能穿上那一身洁白的网球衫。可在，没梦到过的也成了现实……

自从我进了外企，我妹妹也玩命学开了外语。我的那些进了大机关的同学们也纷纷找上门来，让我介绍她们进外企。

我问她们怎也看上外企了？她们说：“都在北京，数你活得潇洒，越比活得越没劲儿了。”我说你们才觉悟呀！一人就算活80岁，有40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还剩40年，小的时候你不懂事；长大了在学校听教师的，在单位听领导的，在公司听老板的，自己随心所欲能有几年？还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呀！在国营单位挣的那点钱，紧巴巴的刚够吃饭，干什么不到外企来，干什么不让自己也享受享受舒舒服服……

为什么要进外企？其实每个人进外企的动机都不尽相同；这里办事效率高，生活节奏快；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里鼓励个性和主动性，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这里拿钱多，活得自在；这里办公条件好，环境优美、气派；或者，什么也没想，想多累……这一切都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在她们心灵上的投影，隐藏其后的只能是社会竞争的出现，增加了生活的活力，人们，特别是女人们，发现了更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天地和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更好生活前景的可能。

只不过，这种选择的自由只是个人成功的条件，并不是成功本身。当人们选择了外企，选择了竞争，选择了富有，选择了做一名有多层含意的世界公民的时候，她们并不知道，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和一个痛苦的过程。

## 第二章：联合大陆上的板块碰撞

### 1. 大河改道——现代生活新秩序

进入日本三菱商社的新职员，第一件事就是背熟一册大16开8页厚的《新职员须知》。我翻看这个有着近80条细款的职员须知，一种异国情调迎面而来。它不同于我们国营企业里的职工须知和岗位责任制，我们的须知多讲工作的分工，讲“为了”，广而泛之，宏观控制，多有阳刚之气。相比之下，三菱商社的职工须知，讲的多是举止，细密绵长，大有阴柔之风。例如：“在走廊上”一节写到：

禁止在走廊上闲谈。

禁止疾走要慢慢地走。

禁止边走边看书。

禁止靠在墙上。

见到客人或自己的上级要微笑着点头招呼并让路……

“接待客人”一节则要求：

客人来了，无论正在干什么，都要立刻站起来稍微的进行问候。

不要忘了笑脸。

不要根据服装区别对待客人。

必须经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

据我了解，多年来，在美国《幸福》杂志评选的美国前100家公司中一直名列榜首的IBM公司，除了对其雇员有严格的行为规范，还有一条没有形成书面文字，却像刻在钢板上一样有效的衣着规范：“公司职员（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冬天穿深色制服，夏天则要求白色衬衫配一条典雅的领带……”

像是要印证这一切，排在世界10大银行之列的英国西敏寺银行北京办事处的一位小姐告诉我，她原本不知道老外对举止和着装有那么多的

规定，因为是冬天，去银行上班的第一天，她穿了条牛仔褲，可刚进办公室就迎来了英国老板的责问：“你是来上班吗？”惊慌中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还是一位女同事飞快地塞给了她一条备用的西裝裙，她才恍然大悟，“上班第一天，我上裝是卡通毛衣，下套别人的又肥又大的西裝裙，脚上蹬着旅游鞋，要多蠢有多蠢了……”更叫她难堪的是，第一次陪同老板去长城饭店会客，刚进门厅，老板就示意她留下，然后对大堂的一个女服务员说：“请教她化妆。”就一个人会客去了……

各个外国商社对中国雇员的要求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个外国商人都在以他们的文明度，来审视并改造着在他们身边工作着的中国人的生活细节。

对于女雇员来说，往往在共同的新秩序下，又加上了外国人对本国女性要求的规范。

#### A 日本老板的茶道

“F桑，你负责刷碗。”这是F小姐进入一家日本商社后，老板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所谓“刷碗”，就是每天下班前刷洗商社每个人的茶杯，而第二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所有人沏上一杯新茶。

日本人喝茶的习惯是向中国学习的，可日本人的“茶道”，“茶文化”却要比中国人严格得多。比如：“刷碗”要由女性来做，而且必须每天都做。商社里的男性可以负责“刷碗”的女性为自己倒茶，而女性却没有这个权力。

F小姐听说，她的前任被解聘，就与“刷碗”有关。“刷碗”本是女工的活，F小姐的前任认为自己是老板秘书，干这活降低了身份，于是，3个月的试用期一过，她就毅然主动减去了给7名中国雇员刷碗的工作量，仅仅为商社里的3位“外国人”服务。可是，7名中国雇员享受这一“日本习惯”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于是，在F小姐的前任采取主动的第一天，7个中国人就像约好了似的，联合行动，早上8点半上班，9点了，7个人没有一人伏案工作——大家在等茶水，“碗”里还有昨天的茶根，不会有人自己洗刷后注上新茶水。而没有新茶水，就像机器没有注上油，怎么能开始工作

呢?9点过一刻,日本老板终于搞清了“异常”的原因,“啪啪”地拍着桌子,命令“一视同仁”。

F小姐有了前车之鉴,“碗”涮得格外留神。以至任何一个中国雇员喊:“F桑,请给我倒茶。”她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

在她整整刷了一年碗之后,老板才用每月200元的价格,雇了个专刷碗的女工,替下了F小姐。老板说得很有道理:为别人服务并不贬低人格,女人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好,还能为客户服务吗?

### B 欧洲绅士的派头

“守时,在商社绝对重要。”C小姐说,“在商社,不守时被看做是工作松懈和缺乏基本礼貌,会受到老板严厉的惩罚。”C小姐并不是故弄玄虚,因为她就受到过老板的惩罚。

C小姐是某商社的司机。有一次,老板在北京饭店开会,由于天热,等待时间又很长,把车泊好后,她不知不觉睡着了。因此,当老板开完会走出饭店时,她没能像惯常那样,立刻把车开动,迎上前去,而是让老板在停车场找了好半天。老板用手指叩动玻璃,将她叫醒后,二话没说,打着手势,请她出来。她莫名其妙地钻出了驾驶室,刚一站稳,老板就一猫腰钻进了汽车,只说了声“到G国大使馆找我”,开着车就走了。幸好,G国大使馆离北京饭店还不算远。等C小姐满头大汗地赶到G国大使馆门口时,老板开着车几乎一秒不差地从门里滑到了她的跟前,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笑着打开了车门,“怎么样,清醒了?”老板一边说一边甚至很体贴地递上了一条干毛巾。C小姐当然一点脾气没有,而且从此就“清醒”了。她不但天天不差分毫地迎候老板,而且把老板常去的几个场所的大致行车时间把握了个八九不离十。因为老板绝对准时出席各种洽谈或会议。所谓准时,包括不等候,当然绝不能迟到。

在C小姐的笔记本上,清晰地记载着老板对中国雇员的一次“训话”:  
“我不能容忍恶劣的态度或松懈的工作……我要求准时开会,要求每个参加者准时到会,我要求回复我的电话,答复我的备忘录并按要求准时

送到。做不到这些人,就个人而言,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到底能干什么……”

### C.《驻在情报》究竟向中国人说了些什么?

在北京的各国商社中,属日本商社的队伍最为庞大,共有5百多家,3千人之众。在这3千人的日本村落里,自1987年起,发行着一份月报,叫《北京驻在情报》。内容以向日本人提供服务信息和驻地新闻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12月、1990年1月、2月,《北京驻在情报》接连三期,在第四版,以“北京办事处(365天)广告牌”为题,用大半版的篇幅转载了某商社记事牌上登出的“中国雇员注意事项”。

粗观这些“注意事项”,都属一些生活细节,例如:“使用公司电话注意事项”;“使用公司会议室注意事项”;“使用办公用品注意事项”;“使用复印机和冰箱注意事项”……甚至包括“使用厕所注意事项”。

下面仅抄录“使用厕所注意事项”——

厕所是公共场所,厕所卫生的重要性,关系到公司的名誉,因此,再三强调如下:

1. 洗手后,不要用手纸擦手。一定要用(转动)手巾,用毕一定要将手巾整理好。
2. 厕所手纸以外的异物不要丢到坐便器中。
3. 不要将茶叶倒入洗手池。不要在洗手池洗杯子等用具。
4. 不要将香皂和手纸带走。
5. 不要将报纸带入厕所内。
6. 关好厕所门后再解手。

把“怎样使用厕所”,登在报纸上,这在中国的新闻界是闻所未闻的事。不过,据日本商人说,开始他们也不想登报纸,“使用厕所”不上大雅之堂,在公司会议上强调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无奈厕所问题和吐痰问题一样,是中国人的痼习,强调几次,改进不大。于是,他们写成条幅,张贴在厕所里。可是,谁想,才隔半日,条幅或失踪,或被反钉在墙上,哭笑不得的老板们才想起登报……。登报果然有效,1990年5月,作为中国雇员的派出机构外企人事部费国强经理读过这些报道后,约见了《驻在情

报》的主编根箭芳纪先生,以《驻在情报》为线索,就雇员管理问题,诚恳地与外商交换了意见。并在此后与日商建立了经常性交换意见的渠道。事隔一年,《驻在情报》上所谈中国雇员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杜绝了,所以,“365天广告牌”只登了三期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不但日本人注意小事情,英国人、美国人……外国人似乎都一下子对当中国雇员的“家庭教师”大感兴趣。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怎样着装、怎样化妆、怎样打电话、怎样赴约、直至怎样使用公共厕所……

为什么呢?老外们究竟要向中国人说些什么?

《北京驻在情报》的主编,出生在中国,并与中国人打了20年交道的根箭先生对我说:“我们是在强调一个教育度的问题,按中国的讲法,就是素质,中国雇员必须提高基本文明素质。”

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付总裁巴克·罗杰斯则对目的说得更具体:“如果你不能及时地给人回电话或回信,最后失约而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或是在约会中迟到而把客人冷落在一边。你的行为说明什么呢?你是说,嗨,用户先生,你对我和我的公司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如果我是用户,我绝不会与你做生意。”

观察了很久,也和老外们谈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外国商社中,一切利他的原则,和建立在尊重他人这一宗旨上的现代生活新秩序或者文明、教育度,至少含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公司的形象,以及公司的利益。老外们也很坦率,他们说:“我们在中国的一切,都是直奔面包上的黄油去的。”

## 2. 悲惨世界——关于人种的思考

### A. 老实人被炒鱿鱼

B小姐进商社面试的那天,接待她的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男子,白胖的中等身材,配上他那细细的眼,淡淡的眉,和挂在脸上的永不疲倦的微笑,使人感到他是那种很有缘,合作精神很强的人。和外国老

板而谈结束后，中年男子告诉她，通常老外进人得向总部海外部申请，他请B小姐留下电话，以便有了消息，马上通知她……B小姐暗想，难得能碰上这么体量新手的“师傅”，如果能进这家商社，就太幸运了。

可是，B小姐幸运地进入这家商社后，却只看见了“师傅”匆匆离去的一个背影。B小姐蒙在鼓里，还向其他雇员打听“师傅”呢。“公司里那位总笑眯眯的师傅是不是人挺不错，我觉得他办事特别妥贴。”“还妥贴呢！”雇员们告诉她，“你就是坐他的办公桌，他叫老板炒了。”“为什么？”B小姐一惊，不知怎么的，心里惴惴不安起来“不为什么。听说他8个月做了50个单的业务，每次都是老板给当保姆，老板腻透了。”

时间一长，B小姐才了解到，“师傅”高中毕业，有十几年的专业工作经验。但是，他工作认真，却分不清主次，效率十分低；人也老实到没有一丝一毫灵活性的地步。老板对他有一句评语：“没长脑子。”

炒他的原因非常简单。老板让他去给一位客户送货，给了他地点和人名。他去了，但老板指定的那个外国客户恰好不在。忠于职守的他，没有把货交给在那里值班的中国人，而是又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结果，老板为没有按期履行合同，亲自送货上门，并再三道歉。

老板说：“我并没有说货必须由我指定的这个外国人亲自查收才可以。难道连人不在怎么处理货物这么简单的问题，都需要请示老板吗？再说，我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为什么信任你的同胞呢？”

B小姐思忖，如果这事摊到自己头上，自己又会怎么处理呢……她虽然没有拜成师傅，但她坐在师傅的办公桌前办公本身，天天都在给她上进入外国商社的必修课——在商社工作“长脑子”最重要。你要清楚你的工作目的是什么。你无需请示，也没有人交待你，检查你，告诉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只会有人通知你是留下来继续干，还是把办公桌让给别人。

## B. 学会独闯天下

P小姐工作的商社是家专业公司，但也兼顾其它。P小姐进入商社

时，老板就交待了一句：“你搞旅游。”就完事了。至于旅游市场、资源开发、旅游线路、客源组织什么的，一句话也没提。P小姐虽然是旅游学院毕业的，但在她的脑子里，她学旅游就是搞导游，其它的事有“冒号”呢！所以，她天天悠哉游哉地等着外国“冒号”派任务。可等了两个星期，老板不仅一点没动静，反而问她，“怎么，工作计划还拿不出来？”P小姐才幡然醒悟：敢情一个旅行社的工作都交她一个人来完成了！当下急得欲哭无泪。

后来，国外公司本部来了电传：“据悉北京要搞一个全国大型农业机械展览会，公司本部已组织了150人的大型农业观光团。”要求P小姐迅速具体了解展事，并且明确指示：“请商议，联系12美元一天住宿标准的三星级饭店。”

P小姐刚大学毕业，对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一无所知，又不能打电传向国外总部询问：“你们从哪听到的小道消息？”只能顺藤摸瓜似的跑展览馆，闯国家各大部委机关。三天时间，主办单位终于筛出来了。P小姐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给国外总部回了第一份电传。可总部却回电道：“这些我们已经了解，请抓紧联系饭店。”

P小姐几个电话打出去，就忍不住骂娘了：“这不是有意折腾我吗！展事你们已经了解了，仍害得我瞎跑一气，饭店根本没有12美元的标准，却硬要我去碰钉子！”可北京办事处的外国老板却一副誓死效忠的样子，“没有商议的余地，16美元是你们国家排价，这个谁都知道，公司派你去谈12美元，是我们公司与其它公司竞争的最有利条件，否则还要你做什么？”

P小姐只好硬着头皮在北京23家三星级饭店中跑开了马拉松。

平时，P小姐在地摊买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与小商贩们讨价还价，这回她是代表外国公司，去和自己的同胞讨价还价了，个中的感觉，难以言传。开始，她谈一次，崩一次，就哭一场。谈得多了，被拒绝的次数多了，哭的次数多了，脸反倒冷了，心也硬了。辞职报告就揣在兜里，“23家谈一遍，我不行，你们另请高明。”P小姐想。想

开了，谈判的时候倒也从容了。“我们了解国家的统一价格，不是想逼你们违反国家价格犯错误，可以说是为了双方的利益，你们考虑一下，看我们是否可以坐下来……”P小姐对某饭店经理说，“如果比较为难，我们也不勉强，毕竟是150人的大团，我想这生意应该说还是值得做的。”P小姐坐了一会儿，看看经理仍一言不发，便站起身来告辞了，但当她已经走到谈判间的门口时，忽听饭店经理在身后说：“好，冒一次险，14美元一天。”P小姐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刻转过身来握住了经理的手。谈判以13.5美元成交，双方当下签了合同。抱着第一份合同文本，P小姐几乎是一路哭回商社的。她说：“我第一次相信了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任何事情也都是可能办得到的，首要的是自己不能畏惧挑战……”

进入外国商社工作的中国女性，几乎都是像P小姐那样背负着重大责任，摸索着开始的，没有人对你搞传、帮、带，你也别想依赖任何人。就好像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滑进了深水里，你必须全力以赴地自救，并在自救的过程中学会游泳。

## C. 领受侮辱的勇气

25岁的Z小姐是美国某集团公司在北京公开招聘时，从近千名应考者中筛选出来的3名中国雇员中的唯一女性。公司总经理在面试时对她说了：“因为你是近千名应试者中唯一信心十足的自我推荐者，你给部门经理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你对公司的业务一窍不通，但是，我们欣赏你的自信和主动。我们愿意向你提供重头学习的机会。”

话虽这么说，老板决不会让你以旁观者的身份重头学起，所谓机会，不过是容忍你暂时的失败罢了。Z小姐到公司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去和一家法国公司谈合同了。Z小姐是公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对与人打交道并不怵头，但她实在不了解公司的业务，什么成本核算，什么利润，什么报价单，她在法国公司那里搞了个稀里糊涂，只好对法国人实情相告，“我昨天才到公司上班，对我们公司的报价还不十分了解，今天下班前，我一定给你准确的报价，可以吗？”从法国公司出来，她就转开了北京的大小书

店，“签合同”的程序，“公证的方法”，“定单的处理”，“供贷的申请”……她开了一大堆书单，却没有买到一本可供参考的相关的书。

“只有去问总经理了。”Z小姐想。因为她知道，她的前任因6个月只完成了公司20%的利润，被炒掉了，而部门经理刚刚出国，这项业务的具体要求，只有总经理知道。总经理很忙，直到快下班时，仍在主持一个会议。Z小姐觉得不能再等了，一咬牙闯进了会议室。“我只问一个问题，”Z小姐说，“××业务如何进行成本核算？”没想到这个曾许愿愿意为Z小姐提供学习机会的老外，一句很轻视的话脱口而出：“你怎么这么愚蠢？连起码常识都不懂！”当着—屋子的黄头发和黑头发，Z小姐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但她还是一字一顿地对老板说：“我是很愚蠢，但这是暂时的。不然我就不会有勇气来当面领受你的侮辱！”“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告诉你，请你先出去。”老板察觉到自己说话有些粗鲁，语言缓和了些。“我不能出去，”Z小姐斩钉截铁地说，“因为我聪明地记得，公司的宗旨是‘用户至上’，而不是个人的自尊心第一，用户还在等我回电话，你必须现在就教会我如何回答！”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老板的脸色变得温和了。“你是正确的，你很勇敢。”老板说，他转向大家，“勇敢的人终会有所作为。”……

虽然自这次“冲突”之后，老板说过以后Z小姐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问他，但是，倔强的Z小姐却下定决心不再“愚蠢”了。她把过去发生过的业务单据和文件档案翻出来，像破译密码一样地归类、分析规律，把有代表性的个案抄出来，列成表格，以便一目了然地了解业务报价和利润尺度。为了对成本心中有数，她用下班后的时间主动去结交别的公司的同行，了解行情，并到工厂打夜班跟班作业，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当徒工，熟悉机器性能，把握生产流程。为了对销售渠道第一手材料了如指掌，她利用一切机会拜访用户、结交朋友、扩大业务……没有人知道她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付出了多少心力交瘁的努力！

女孩子的羞怯、矜持、虚荣都在

她摆脱“愚蠢”的决心面前纷纷让步了。她说，依赖别人的判断力，有时是出于无知，有时却是因为习惯，但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缺乏独自迎接挑战的勇气和行动的能力。要想让外国人从心里看得起你，你就必须先自己站起来，走出一条路……

Z小姐不愧是千里挑一的中国女性，仅仅半年的时间，她不但迅速熟悉了业务，而且使业务量不断扩大，利润直线上升。美国总经理在给她加薪、并提升她为高级业务代表时说：“北京的姑娘，在我所到过的世界都市中，最聪明自尊心最强。”

### 3. 基因变异—— 陈腐的现代病

在商社，外来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无疑已经成为人们无可非议的行为标准。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那些外来的可以影响精神文化的优秀的东西丝毫不接受，而单单把金钱获得和物质财富享受的欲望无限地膨胀了起来。

#### A. 两万美元的佣金

在国际贸易中，许多跨国公司都允许他的销售人员按业务合同从纯利中提取个人佣金。据说，国际惯例，贸易佣金为3%，代理佣金为5%。这本来是一种促销方式，但在商社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它往往成为吞噬一些人道德和信义的陷阱。

现在在北京的外国商社一共有1300多家，大都是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较有实力的大跨国公司的派出机构。那么，那些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以及正在试探中国市场的公司势必要在这1300多家公司中寻找代理商。

代理商可以是公司代理，也可以是一个人代理。但个人代理通常被各国商社所排斥，这就是外国商社绝对不允许从事第二职业之所指。

但是，在凡有不允许的地方，就都有人越过雷池，E女士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个“越境”者。

E女士是从秘书、业务员、副代表、代表一步一步提升起来的，她干业务很干练，但协调人的关系，她实再头疼。于是，她向国外总部申请了一个代表助理的名额，进了一个朋友

向她推荐的留法硕士生。留法硕士果然能干，人不但圆滑，很会处事，而且在法国认识人多，神通广大，来了不久就谈成了一笔业务，商社里的其它雇员都对他肃然起敬。E女士也为找了个好搭档而高兴。

去年年底，E女士给大家发完第13个月工资后，想给国外总部写份报告，申请一个年终奖，但从全年营业额中拿出多大比例做个人奖励基金合适，她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搭档商量。谁想搭档一口否定了她的想法，端出了一个使E女士惊心动魄的计划。

“我劝您别搞什么年终奖，”搭档说，“中国人一竞争就乱，就勾心斗角，您想要有凝聚力，就得搞家长制外加‘小金库’，路子我已经给您趟好了，搞国外代理，一项业务一个代理一年搞两万美元的佣金没问题。咱们合伙把老外瞒住了，佣金大家分，准保咱这儿比哪儿都红火。”

搭档看E女士沉思不语，又说，“干这事风险不算大，大不了老板炒咱们的鱿鱼，在来您这儿之前，我就顺手牵羊地干过……”

E女士这会儿真的犹豫了，她倒不是犹豫为这两万美金的佣金值不值得冒险，而是犹豫要不要辞退这位朋友的朋友。

事后，E女士对我说：“做个人代理的事我自己就碰到过，有家美国公司找上门来要我做他们的代理，佣金远远超过两万，我如果答应下来，没有人会知道。可是我自己偷偷做了，提心吊胆的滋味好受吗？全商社一起做，仍然得提心吊胆，因为雇员们随时可以告发我，而且会因为我违反公司纪律而不尊重我。还有，难道外国公司的信任就没有钱重要吗？给外国人干活，自尊自爱，道德和信义就都丧失了意义了吗？我觉得职业道德到哪里都得讲，一个人没有眼光，满脑子都是捞一笔就走的想法，长久不了。”

当我问起她的那个搭档现在的情况时，她很坦然地告诉我：“早就炒掉了。我不同意合伙后，他就自己偷着干，这事瞒不住人。虽然他帮过我很大的忙，但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带坏风气。”

#### B. 宰老外算是个问题吗

但是，并不人人都像E女士那样在金钱面前头脑清醒。

某商社复印机的砂鼓坏了。通达中国人情事故的外国老板在商社里“发动群众”：“复印机坏了，卖掉。钱，大家分。”

G小姐家有亲戚在某复印机维修部工作，于是G小姐就把这活揽了下来。

东西通常买的时候都很贵，可要卖就不值钱了，所以要卖个好价，绝对是门学问。

G小姐的亲戚告诉她，她们商社的这台理光5590，牌子不算是最好的，市场价6万来块。而换一个砂鼓2千元左右。如果修好后卖到信托商店去，顶多给你几个千块钱，最后能拿回去两千块左右算是正常情况。但是，个人可就白忙了。如果卖给复印个体户，就得费点劲，但个人进个千二八百块钱轻而易举……

G小姐虽然不缺钱花，但她想，如果钱毫不费劲地送上门来，又有几个人能拒绝呢。于是与亲戚商定，卖了钱除去“成本”，五五分成。

G小姐的亲戚果然有本事，不出两个星期，复印机以3万元，卖给一个东直门外的复印个体户，除去修理成本，净挣2万8千元。两人按商定，交给商社5千元，剩下的各自揣了腰包。

G小姐本以为这件事干得很漂亮，没想到不懂行情的外国老板原本胃口很大，才拿回去5千块，老板凭直觉感到上当受骗了，“6万元买的，5千元卖出，不合算嘛！我们不卖了，要回来，修理修理再用。”

可G小姐临危不惧，有的是办法，她挨个要通了北京城里所有信托商店的电话，请老板亲自问问行情。老板光听电话里的行情，当然不得服气。再说已经向全体雇员许诺，总得兑现。但是5千块钱分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老板只好把分钱，改为全体雇员在全聚德烤鸭店聚了一次餐。

本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可是，人要是有了宰老外的钱不算什么问题的想法，漏子总会捅出来。G小姐后来因为给老外代买机票，私分回扣，和几个“哥们”分赃不均，闹翻了，“哥们”打了小报告，终于事发，

被外国老板算了“老账”。

## 第三章：关于彼岸的传奇故事

### 1. 外国的月夜——失业与罢工

1988年夏，美国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被K饭店查封。据说，原因竟是该办事处拖欠K饭店房租6个月未交，饭店忍无可忍，将其办事处查封，办公用品折价处理，以补损失……

当时，正准备动身去德国留学的原该公司副代表，我的朋友J女士得知此事后，立刻击掌欢呼，“又叫中国人长见识了！”她说。

J女士是1986年由该公司老板私聘进入商社的。因为没有通过外企，她的工资由美国老板直接付酬，定为每月500外汇券，车旅费全部报销，每日还可以在饭店免费享受一顿工作餐。

J女士回忆时说：“我当时第一步就走错了。因为是私下交易，没有参照系，工资被老板压得很低，又不好说出口。唯一得以安慰的是，通过外企拿到手的也基本是这个数，可我在原单位告的是长病假，干得不适应了，我随时可以回原单位去捡我翻译的老本行。没想到，正是这一点，成为老板拿住我和日后报复我的把柄。”

1987年春，她接受了代理某德国公司与全国妇联合资建中档专线旅游饭店的谈判任务。J女士与全国妇联有关方面做了先期联络和洽谈后，便在北京接待了德国某公司的总裁，并陪同总裁在北京、杭州、黄山等准备修建旅游饭店的具体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德国人很满意，回北京后，与全国妇联有关方面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临飞德国前，为感谢J女士出色的翻译与帮助，付给了J女士1000元外汇券，并嘱J女士将投资意向书中文本翻译成英文本后发往德国。

但是，好事多磨。德国人刚一走，全国妇联在与地方政府的交涉中严重受挫——杭州、黄山两地风景区楼堂馆所的建设要报批中央，旅游专线

饭店计划搁浅了。

J女士立刻把北京的最新动态用传真报告了在香港遥控的老板。

并在给德国人寄文件时，也通报了这一情况。

没想到这下可闯了大祸。

美国老板认为J女士接受了德国人的薪金，出卖了本公司的情报，做为惩罚，停发了J女士当月的工资，并要求J女士“设法扭转”德国人的印象。

J女士一边内疚，一边疑惑：怎么设法？总不能编造谎言吧！

可是，从德国拍来的传真上分析，老板已经向德国方面否认了J女士的通报……

但是，J女士还没有想出“扭转”德国人“印象”的办法，全国妇联方面的“印象”突然扭转了——他们经过国家经贸部查询得知，美国公司为他们联系的这家德国公司并不是实业公司，不具备投资能力，仅仅是个中间商，要得到外方投资还要通过这家德国公司去贷款或找股份公司……全国妇联方面觉得风险很大，希望与德国公司进一步谈判。

可是，当J女士再次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老板时，老板却指示她，不要让中国人与德国人接触，你先谈……

至此，J女士彻底明白了，老板是要把这件事尽可能长地拖下去，以赚取德国人的代理佣金（从J女士开始第一次谈判的那个月起，德国人就开始按月向北京代表处支付2000美元的传真电话费，其它款项J女士就一无所知了）。

J女士早就觉得她的老板是个洋混子，至少在她任北京办事处副代表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因为老板如果要买中国的东西，通常会把价格压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比如买天津产的单放机。中国市场价是30至200人民币，老板指示J女士，如果3美元就成交。

而卖给中国的东西，不是价码高得吓人，就是批量大得惊人，叫你无法问津。比如向某省推销美国化肥，老板一张口就是880万吨，超过我国全年化肥生产总吨位，叫你没有一家单位能够吃得下……

而且，老板指挥J女士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拖”发工资。因为他知道，

工资是张王牌，为得到工资，J女士不得不用尽浑身解数……

这次，他又故计重演，连续3个月没有付给J女士工资，命令她与全国妇联周旋。

J女士觉得忍无可忍，给美国老板拍了份传真去，宣布：罢工。

J女士知道，她是在罢美国大老板的工。而且，这个美国大老板据说出任过尼克松时期的白宫中国事务顾问，他汉语说得极好，还有一个中国名字，J女士也亲耳聆听过他对胡耀邦御职后中国政局的看法，确信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且，虽然他经常拖欠J女士的工资，北京办事处也从未有过什么具体业务，但老板每次来北京都派头十足，以大律师自居，住在北京最豪华的长城饭店里，出手相当阔绰……

J女士白天罢工，晚上还是忍不住要偷偷到商社去，看看有没有关于她的电传。她推测老板现在不能炒她，因为在找到新的接替人之前炒了她，德国人与全国妇联的谈判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老板不愿意在所有的人面前失信。那么，为什么可以对她失信呢？难道因为她是私聘的就没有尊严吗？

可是，罢工持续了一个星期，老板只来了一条传真：您要的东西会给您的，请迅速上班。还有一条传真是德国来的：请确认全国妇联方面工作进展事宜。

J女士觉得这样罢工下去，她势孤力单，对美国老板来说几乎不起作用，而且，她的命运仍握在美国老板的手中，拖的时间越长，老板找人的余地越大，她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与其回头继续为老板充当索要“买路钱”的角色，不如让德国公司再直接与全国妇联洽谈一次，如果谈成了，她也算为国家尽了微薄之力，鱿鱼也“炒”得其所；如果谈不成，甩了老板这个中间商，让美国佬见识见识“中国工人阶级”，3个月的薪金扣得也就不冤枉了。

J女士是位既敢想敢做，又思维严密的女性，她想到了寻求保护，也想到了退身之路。她知道她不是外企派出的职工，外企无法保护她，可她想到了妇联，想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德国方面，也不但同意付给她

2000美元的风险费用，而且允诺了在她赴德留学期间，向她提供在该公司就职的机会。

美国老板得到德国人将赴北京谈判的通报后，疑窦丛生，直飞柏林（因为J女士在罢工，他无法与J女士联系）。德国人当面向他出示了J女士自北京拍来的传真——两个老外摊牌了。

恼羞成怒的美国老板回到香港后立即办了两件事：第一件，命令J女士“立刻离开办公室”；第二件，在中国日报上刊登了J女士“因损害公司利益即日起被美国M公司开除”的广告。他要掐断J女士在中国生存下去的后路，可是，那早已是棋慢一招……

也许是精明的美国老板发现了他已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注视之下，新的中国雇员进入北京办事处不久，他就在北京销声匿迹了。就像他的公司在中国莫名其妙地生存了两年，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一样。不过采取的仍然是具有他个人性格特征的办法——欠帐不付，而使他成为中国人的笑谈。

德国人与全国妇联终于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达成协议，但J女士却按计划成行了。

临行前，J女士对我说：“在美国公司两年的人生经历超过我曾经度过的30年，它使我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外部的世界的确很精彩，但是精彩的世界几乎处处都是陷阱，最安全的还是将行为纳入正常轨道——依靠外企，生你养你的祖国母亲……”

当西方文化和经济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把中国纳入世界运行同步轨道的时候，高度发达的西方商业社会里某些集团和个人的诈骗和丑恶行径也会在中国大地上偶然曝光，它虽不能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帮助的外国各大跨国公司的整体形象蒙受耻辱，但足以使天真、善良的人们清醒起来，成熟起来。也使站在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在外国商社工作的大多数中国女雇员们，在外来文化的紧逼下，急剧地生长起强烈的民族感情。

## 2. 悲愤交集的升腾—— 自爱与自尊

### A. 临时外国小老板

一般来说，中国雇员在外国商社可以承担各种工作，但主管商社财务几乎是禁区，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商社的财权都是由外国老板亲自把握，决不向中国人放权。这可以做多种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对中国人缺乏信任。只是这种缺乏信任，在某些商社严重到损伤中国雇员自尊心的程度。

某外国商社老板回国休假，为维持他不在北京期间商社工作正常运转，必须指定一个临时负责人，并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但是，他没有把钥匙交给平时协助他处理办公室帐目的中国雇员M女士，而是一个电话约来了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的本国21岁的留学生N先生。他向N先生交接完毕后，对M女士说：“我回国休假期间，公司来往帐目由N先生全权负责，必须有N先生的签字，所有票据才能生效，你们有事向N先生请示……”M女士觉得，N先生不但对商社全面的业务情况了解不多，而且中国话也没有学利落，让这样一个大孩子管理商社和指挥6位中国雇员，简直跟开玩笑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使M女士强烈地感到她是被雇佣者，今后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于是M女士对老板说：“N先生上大学读书，我找他不方便，您是不是可以在临走之前，提前支下月我应向外企缴纳的1800元薪金？”M女士的意思，是想告诉老板，“你如此不信任我，我也决不会为你全力以赴了。”可是，老板一点没有听出M女士的话中之话。仍然按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你的薪金也由N先生到时候一起支付，我不在期间，临时负责人加薪……”

N先生与老板素昧平生是5个月前经人介绍进入她们商社打工的临时工。薪金每月原来是经M女士经手支付的：按每小时25元外汇券记帐。一般N先生总是每周来商社打工两个下午，月薪800元外汇券左右。除此之外，老板允许他来打工时乘坐出租车。M女士曾从商社角度出发，提

醒老板：“N先生每月的出租车费要报1000多元，是否可以给他改成使用工交月票或改乘公司包车呢？”老板当时皱着眉头看了她好一会儿，好象判定她的提议完全是从商社利益出发后，才通知包车司机，以后接送N先生……

老板回国休假了，被加了薪的N先生仍然一周来商社两个下午，丝毫没有因当上了小老板而受宠若惊，而商社的中国雇员也只能为M女士愤愤不平。

### B. 辞职风波

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添了个新年互赠挂历的习惯，而外国商社也入乡随俗，一到年底就展开了“挂历大战”——增雇包车以便挨家挨户地向他们的客户或潜在客户送挂历。由于商社往往互为客户，所以送进来的挂历不比送出去的挂历少多少。对于送进来的挂历，一般是由雇员们自行消化——送给他们的“关系户”或亲属。但对于中国雇员较多的外国商社，“自行”容易苦乐不均，为了大家皆大欢喜，对挂历的分配就有很多约定俗成。

某外国商社规定，但凡送进来的挂历，不允许任何人据为己有，由外国老板统一分配。

今年，在送入商社的上百本挂历中，有4本特别精美。精美不仅仅在于挂历的画面上印制的是都是梵高、雷诺阿、犹如等世界级大师在近年的油画拍卖市场上价值连城的那些名画，并标有最新拍卖时间和价格，而且精美在纸张，在挂历的整个装璜……自挂历送到商社，就不停地被人翻看，人人都赞叹，这本挂历绝了！谁都希望得到其中的一份。

可是，刚刚过了一天，4本挂历都不易而飞。一位约了朋友来欣赏挂历的外国雇员确信挂历失踪后，在商社里用汉语大骂：“太不像话了！中国人都是贼！”

“凭什么说中国人是贼？”坐在这位外国雇员对面的中国雇员K小姐最先从座位上站起来，但立刻有人按住了她，“算了，算了，何必那么认真，几本挂历嘛！大家背着点，别跟他一般见识……”息事宁人者说。

“中国人就是贼！办公室里丢东西，逃不出办公室里的中国人！”老



见中国人自己都嘴软，就更确信不疑了。

本来平时对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视已经麻木了的一些中国雇员们终于也坐不住了，“你说办公室里那位中国雇员是贼？你能指出来吗？指不出来，我们联名到法院告你诬陷罪！”“你们比我们多几个臭钱就自以为是优等民族了是不是？告诉你，我们不稀罕你们的臭钱，你如果不向全体雇员当面道歉，我就辞职！”“对！辞职！”“辞职！”在场的几十个中国雇员都一起喊了起来。最后连商社临时雇用的司机们也参加了进来。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中国雇员们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先天、自发的向心力。大家都觉得，中国人的名誉

不能容忍这种伤害。大家推举了K小姐和另外一位雇员去和商社老板谈判；或者全体中国雇员辞职，或者开除那位辱骂了中国人的外国雇员。

外国老板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当着全体中国雇员的面，把那位外国雇员骂得狗血喷头，然后极为严肃地用汉语说：“我代表我国人民诚恳地向中国人民道歉。”并郑重其事地一一向他的中国雇员们鞠躬，恳请他们收回辞职报告。

当那位外国雇员在一周内离开中国后，辞职风波也终于平息了。但积淀在中国雇员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自爱的激情，却长久地冲撞着她们的内心。中国人是通过西方的枪炮战舰的历史回忆来认识西方世界的，

#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 王安石

星明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病逝，20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继位。

神宗青春年少，雄心勃发。他不愿因循守旧，积极寻找有志于改革的人材，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还在他当太子的时候，常听他的老师韩维讲论经义，每到精彩处，赵顼禁不住连连拍手叫好。这时，韩维总是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我的发挥，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由此，赵顼一直想见见这位博今通古、很有见地的王安石，只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的一天，神宗破格降诏：特召翰林学士王安石入殿，商讨国家大政。按惯例，皇帝不会单独召见翰林学士。所以，这一不寻常的召见，立即惊动了满朝文武。

坐在高高龙椅上的神宗皇帝，见信步走来的王安石气宇轩昂，仪态不凡，心中甚喜。神宗向他表示要以唐太宗为榜样，王安石则鼓励神宗要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圣贤。神宗喜形于色地对王安石说：“先生素有治国良策，我早已知晓，请先生赐教治理国家应从何处入手？”

王安石应声答道：“依臣之见，应该把选择治国之术放在首位。”

神宗思忖了一下说：“治国之术不明确，那就难以谈论治国，这当然对，不过，你的意思是……”

王安石见神宗态度恳切，就直言奏道：“依臣看来，建立法度，改变风俗，抑制豪强兼并这三件事，要尽快着手进行。”

神宗听后，心悦诚服，连连点头说：“先生所言，正合我意，请先生尽力辅我变革新。”

召见之后，王安石又遵神宗的旨

意，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折。文中对那些累世相承的“仰畏天，俯畏人”的因循守旧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大胆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迈名言。最后，在文中明确指出：“百年以来，由于朝廷理财无术，才使得民不富，国不强。皇上要变法图强，就应从改革时弊入手，今天真是皇上大有作为的时候啊！”

王安石的观点正合神宗心意。神宗高兴地对王安石说：“只有先生才能辅我推行新法，我一定要把管理国家的大事交给先生。”从此，王安石经常出入皇上左右，君臣相知，如鱼得水。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相。

神宗对王安石的亲近和重用；引起了朝庭内的守旧派大臣富弼、司马光等的惶恐不安。他们在神宗面前百般诋毁王安石。有的说：“王安石做个翰林学士还差不多，根本就不配做宰相。”又有的说：“王安石不能当宰相。他当宰相，祖宗的法令变得一塌糊涂，天下必然大乱。”司马光圆滑地说：“有人反映王安石奸巧邪恶，我看有些过份，但说他不懂事理，为人执拗，这都是事实啊！”神宗已觉察这些人的阴暗心理，仍耐心地开导他们说：“王安石不喜欢做官，不追求享受，这也算得上是贤人了。”

王安石当然知道这些守旧派大臣对自己的仇恨和反对，他并不在乎。他真正担心的是怕神宗受舆论干扰而发生动摇。神宗似乎窥视到了王安石的心理，坚定地对王安石说：“尽管别人不能真正理解你，但我是深深知道你的抱负、学识和为人的。我需要你的辅佐，正像唐太宗得到魏徵、刘备得

这段痛苦的历史，使中西方之间互相了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使必将朝着成为世界公民方向发展而去的中国雇员永远铭记她的民族尊严。

### 并非尾声

当我对国外商社的女雇员的访问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国家刚刚评选出的1990年全国十

大出口创汇企业和十大高营业额企业的名单，名列榜首的是我在采访期间已经熟悉的安太堡煤矿，于是，我又联想到正在建设中的大亚湾核电站、鲁布革水电站、姚孟火力电站以及已给每个北京人带来方便的北京30万门程控电话……这一切，都是在外国商社北京代表处进行先期联络和洽谈而后建立的，可是，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还凝聚了中国女雇员的汗水甚至泪水。忽然想到了这点，便

一下子觉得关于她们的那些个人的向往与失落、痛苦与艰难、冲突与困惑都变得微不足道起来了——我们正走向世界！尽管环顾四方，大地茫茫，没有现成的道路，没有醒目的路标，方位要靠自己判断，价值也要由自己衡量；尽管在这风雨长途中，有人迷失，有人落水，但更多的人则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交错中，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

（责任编辑 晓渡）



到诸葛亮一样。”神宗的信赖使王安石倍受感动，他满怀激情地对神宗说：“唐太宗、刘备又算得了什么呢！皇上您能成为尧、舜，您的左右一定会有稷和契这样的贤人充当助手。”王安石早就怀有像古代稷、契一样来辅佐圣君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现在，他感到施展伟大抱负的时机已经降临了。

王安石执政后，便设置了三司条例司，着手整理财政。熙宁二年七月，颁布了第一道新法令——均输法。接着，又分别颁布了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方田等法。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北宋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变法革新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实行了多项改革，而且都是以法令的形式公布的。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也就是通过变法来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的小地主负担太重，没有力量交纳更多的税金。王安石从实际出发，稍稍减轻了他们的纳税负担，同时，他又要求那些脑满肠肥的大地主、大商人向国家多交纳税金。朝廷中的一些官僚、贵族、皇亲国戚多数本人就是大地主，有些人还直接经商或和大商人有密切关系。王安石敢于在老虎口里拔牙，岂能不触怒他们？

一天，神宗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共商“国用不足”的对策。

当时的北方旱灾频繁，严重地影响了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国用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了。加上辽和西夏又派使者催逼宋朝交银纳绢，给他们“进贡”，否则就要兴师“问罪。”因此，财政危机不解决，不仅国内政局不稳，还将招致夷狄犯界。

神宗焦虑异常地对群臣说：“北方大旱，国库空虚，前景令人担忧，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希望多出好主意，看看如何度过这难关。”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时，王安石刚要上前陈述己见，却见司马光晃动着肥胖的身躯，抢先奏道：“皇上，现在财政困难，我看紧缩开支倒是个好办法。”原来司马光怕王安石提出理财变革的主张被皇上采纳，这必然会触及豪强兼并势力的利益。所以才抢先一步，想先发制人。王安石当然知道司马光的

用意，他毫不示弱地驳斥说：“讲什么靠紧缩开支来解决，这是舍本求末，别有用心。国库空虚的根源在于朝廷缺乏理财的官员。现在首先要做的是选择人才，整理财政。”

司马光唯恐王安石占了上风，气急败坏地嚷道：“当朝理财的官员都是忠于职守，为国效劳的人，管理财政也颇有经验，王大人所讲的人才又是什么样的人才呢？”王安石理直气壮、直言不讳地说：“什么样的人才？就是能挫败豪强、抑制兼并、奖励农耕，进行合理赋税而又能使国家财政充盈的人才。”他的话像刀子一样直扎司马光的心窝。司马光恶狠狠地指着王安石对神宗说：“皇上，我看王安石说的这种人才，实际上就是搜敛民财的人才。要用这种人，必然要与民争利。那时，天下就会大乱了”。

面对着司马光的恶毒攻击，王安石非常气愤，他用犀利的眼光紧盯着司马光，慷慨陈词：“朝廷起用新的人才管理财政，既不加重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又能使国库充盈，怎么说这是搜敛民财呢？我看司马光是血口喷人，别有用心。”听了王安石这番话，神宗觉得很有道理，不禁频频点头。司马光顿时不顾斯文地喊叫起来：“皇上，天下所生财物是不变的，不在民，便在官，王安石讲不增加税赋而使国库充足，实际上是要阴夺民利，这比明着增加税赋还要厉害呀，这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皇上万万不可轻信！”

神宗曾相信过司马光的理财谬论，表示要“为天下守财”。王安石怕神宗再被司马光的谬论所动摇，而使富国强兵的想法成为泡影，急忙直谏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说着又给神宗打了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个人关起门来和儿子做买卖，即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还是富不起来啊！”接着，王安石又提出“理财以农为先”的主张，并强调要“寓兵于农”，将强兵足食结合起来。

王安石的忠言直谏使神宗豁然开朗，他嘲笑地对司马光说：“你这个司马老儿真稀奇，如果天地间财物总是一样多的话，我们还要尽什么人事，搞什么生产呢？你说桑弘羊不好，我看

这样的人才还不好找呢！”

一场理财的论战，惊动了满朝文武，也粉碎了守旧派的阴谋诡计。神宗决定采纳王安石的建议。大殿里顿时活跃起来，支持王安石的大臣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则无地自容。

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虽屡遭阻碍，但他矢志不移。新法推行10年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到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连年丰收，全国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新春将临，汴梁城内热气腾腾。王安石和三司条例司的几名官员一起来到繁华的街市。店铺里货物琳琅满目，街道上人群摩肩接踵。只见一小伙子推着一辆小车，车上装满了各类年货，车后随一长者。王安石上前施礼问道：“请问老人家，为何办这么多年货啊？”那长者乐乐呵呵地还礼道：“先生有所不知，只因朝廷实行了青苗、免役、农田水利等法，使我们农户免除了豪强巨贾的重利盘剥，保证了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大有发展，所以逢年过节比以前宽裕多了。”王安石听后甚喜，却又故意问道：“新法真有这么好吗？我听说有人说新法有百弊而无一利呢！”长者听了顿时涨红了脸，勃然大怒道：“这是睁眼说瞎话，事实胜于雄辩，你们都看到了，切不要跟着别人胡说八道啊！”王安石一行见老者和那小伙子气冲冲地推着小车走了。他们则顺着中州路边走，边议论着汴梁城的新景象，心中十分快慰。前面，又见一伙人围在一起谈论着什么。近前，见一健壮的中年男子激动地说：“如果不是市易法抑制了那些垄断势力，哪有我们这些小商、小贩的好日子过呀？”王安石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在颂扬新法。

在这一年一度除旧迎新的佳节，面对着新法带来的新景象，王安石心潮澎湃，回府后展纸调墨，挥毫写下了一首优美的七言绝句：

### 元 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曛曛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特邀编辑：副教授 葛杏春）

# 同治初年的一场喋血政变

周源

1861年8月22日，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内哀声四起。原来，清代的第七个皇帝因病不治“龙驭上宾”，撒手人寰。前一日，弥留之际的咸丰帝，在病榻上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及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揽朝政，辅佐皇太子载淳为帝。同时，咸丰帝发交皇后、皇太子“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与八大臣共掌大权，以保存爱新觉罗氏家天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然而，咸丰帝的尸骨未寒，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猝然爆发。慈禧太后（即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咸丰帝死后，由贵妃尊为皇太后，加“慈禧”徽号）、慈安太后（即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咸丰帝死后尊为皇太后，加“慈安”徽号），联合恭亲王奕訢等王大臣在北京发动政变，将肃顺、载垣、端华等所谓“三奸”处死，其中载垣、端华“加恩赐令”自尽，将“首恶”肃顺押赴菜市口问斩。其余景寿等五人系“随声附和”肃顺等，从宽予以革职或遣戍处分。这次政变史称“北京政变”，因发生于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

肃顺出身皇族宗室，又是先帝宠信的重臣，为什么遭到两太后、奕訢等如此残酷的处置，以致身首异处、暴尸刑场呢？

肃顺是满州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为郑亲王端华之弟。咸丰初年，肃顺被荐举“入内廷供奉”，他机敏善谋，勇于任事，很快就得到咸丰帝的赏识重用，升迁甚速。载垣、端华也是受到咸丰帝信赖的天子近臣，但他俩才具平常，中贵为亲王地位在肃顺之上，但遇事往往以肃顺为主谋。三人相互附合，结为一党，加上依附于他们的朝臣，隐然形成一个最能影响咸丰帝决策取向的权力集团，肃顺本人因此成为清廷权力中枢的核心人物。

咸丰帝与他的列祖列宗比较，“运气”最糟，在位的11年中，“内忧”、

外患接踵而至，没有一刻的安宁。即位之初，南方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太平天国即定都南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清政府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肃顺以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出那些“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的满州贵族和腐败不堪的满州八旗军，已不能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因而主张破除有清一代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之见，大胆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放手让他们组建和掌握地方武装，以扑灭农民起义的燎原烈火。咸丰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崛起后，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支撑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帮助清政府度过了难关。

与此同时，肃顺有感于咸丰朝沿袭前朝积弊，吏治败坏，官风颓靡，力图有所振作。为此，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官风。1858年，大学士柏葭奉派任顺天乡试（北京考区）的正主考官。其家人趁机营私舞弊，事情败露后，柏葭因“失察”之罪获咎。本来，此类科场流弊历朝历代皆有，远非罕见。但肃顺以“取士大典，关系甚重”为由，不肯轻易放过。他说服咸丰帝，将柏葭等人正法，副主考官等十余名考试大员革职流放。次年，肃顺检查财政时，发现宝钞处所属“宝”字五号局欠款与官钱总局的帐面不符，遂究治不舍，查出主管局员与商人因缘为奸侵吞巨款的大案，并予以严厉惩处。因此案而被查抄家产的官员和商人各有数十家，数百人银铛入狱，几乎无处容纳。肃顺求治心切，屡兴大狱，“科场”案、“钞票”案震动朝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整饬吏治官风、强化国家机器功能的作用，不愧是颇有作为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但是，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凭藉皇帝的信任擅自作威作福，专横跋扈，办案中不仅处置苛猛，量刑过重，殃及无辜，而且

借机锻炼周纳，打击异己，又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紧张，许多朝臣因此“怨毒繁兴”，对肃顺及其一党愤恨不满，埋下了倒肃的隐患。

“内乱”未平，外患又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政府趁火打劫，利用武力要挟和外交文化讹诈，于1858年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将黑龙江北岸6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并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中俄“共管”。1859年、1860年，肃顺两次代表清政府与沙俄代表交涉，据理力争，断然拒绝承认非法的《璦琿条约》，这也是值得肯定的爱国表现。

1860年，英法联军挑起了新的侵华战争，咸丰帝及肃顺等王公大臣昧于中外形势，举止失措，时战时和，酿成军事上的惨败。9月21日，侵略军兵临北京城下。次日，咸丰帝带领肃顺、载垣、端华等亲信大臣仓皇出奔热河。

岁末，留京办理“和局”的恭亲王奕訢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随后，奕訢与留京官员纷纷吁请咸丰帝回銮。咸丰帝被迫吞下《北京条约》的苦果，对洋人深存疑忌，他死抱着“天朝体制”，对外国公使驻京及面递国书尤其难以接受。另外，咸丰帝与奕訢素存芥蒂，对奕訢在京表现颇有猜疑，故迟迟不肯回京，并禁止奕訢来热河问疾请安。奕訢与留守北京的大部分朝臣对热河方面颇为不满，认为是肃顺一伙心术不正的权奸包围控制咸丰帝，阻止回銮请安，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独揽大权。

咸丰死时，遗命将奕訢等近支亲王排除于顾命大臣之外，更激起奕訢及大多数留京官员的强烈不满，普遍认为肃顺一伙从中作了手脚，以西太后“垂帘听政”取代八大臣“赞襄政务”的呼声十分强烈。

此时，热河方面也不平静。两太（下接41页）



# 黄帝陵重修规划设计

(综合方案)

- ① 庙前区
- ② 墓门
- ③ 龙驭台
- ④ 坛



炎 黃  
春 秋



「洋插队」记事  
笑星李金斗

末代皇帝寓居天津始末  
同治初年的一场喋血政变

共和国定都北京初记

郭沫若的异国之恋

